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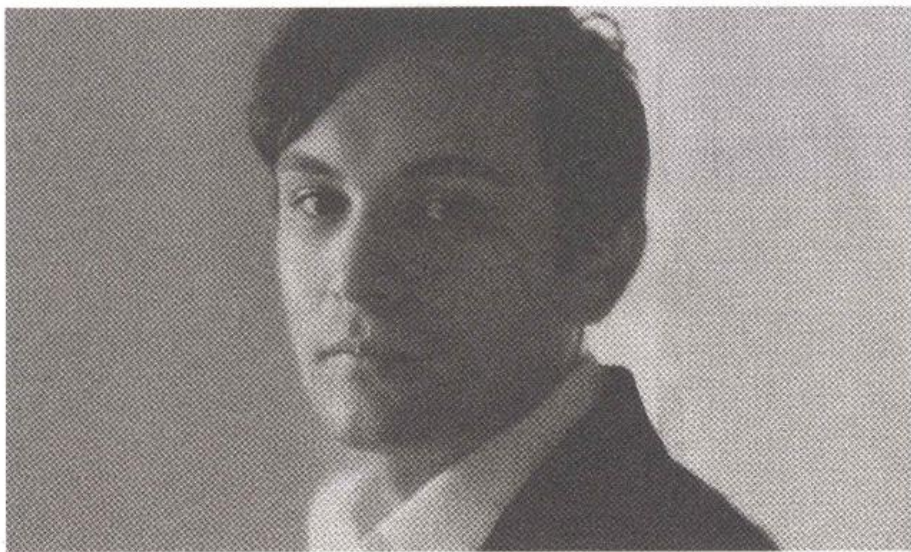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REDEFINE THE SHORT STORY, REDEFINE YOUR REALITY.

Short Classics



恋爱者的秘密生活

[英] 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炜 译



《爱，始于冬季》作者 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得主
献给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的爱之寓言

西蒙·范·布伊 短篇小说处女作



THE SECRET LIVES OF PEOPLE IN LOVE

Simon Van Booy

《恋爱者的秘密生活》是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的首部短篇小说集，首次出版于二〇〇七年。书中共收录十八个故事，以美国西部、纽约、巴黎、罗马和雅典等地为背景，讲述不同的主人公在面对死亡、悲剧、孤独、救赎和奇迹时的深刻体验。作者用极度简洁的笔触和触动人心的细节，讲述置身于“爱”的人们所付出的辛劳、经历的失落，以及他们从对自身生命叙事的回忆和重构中所获得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THE SECRET LIVES OF PEOPLE IN LOVE

Simon Van Booy

恋爱者的秘密生活

[英] 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23 - 3094

Simon Van Booy

THE SECRET LIVES OF PEOPLE IN LOVE

Copyright © Simon Van Booy, 200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4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者的秘密生活 / (英) 西蒙·范·布伊著;
李露, 卫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8294-7

I. ①恋… II. ①西… ②李… ③卫…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5899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爱娟 骆玉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印刷 凸版艺彩(东莞)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11 千字
版次 202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8294-7
定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精选

你称呼我 玫瑰

说着玫瑰

但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名

我就会稀疏我的枝叶 让你能立刻

看见我

——保尔·克洛岱尔,《百扇帖》

“……在一个被抛弃的世界里，我们就只能被抛弃与被拒绝，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也不会去梦想，在另外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所选择的一切，能同时茂盛地生长。”

——珍妮·法兰姆,《喀尔巴阡山》

目录

001	小鸟
014	草莓的香气
018	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
031	不一样的鞋子
037	他们躲在哪里是一个谜
054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061	黑暗中的绽放
074	遥远的船
083	最好的礼物
090	雪落下又消失
098	岩石上的牧羊人
107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116	死于星期地震的法国艺术家
120	苹果
137	日常生活
144	假如
152	得到和你失去的一样多
165	安静却不停坠落的城市

小 鸟

醒来后，我满十五岁了。每长大一岁，都像是在过去的年岁之外披上一件新的衣服，有时候，我会把手伸进装着过去的口袋，把以前的事掏出来看一看。

米夏刚才从店里回了家，他说，我们晚上出去庆祝下吧——去看场电影或者去伏尔泰大街的麦当劳吃点好吃的。米夏是我的父亲，但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在巴黎长大，在监狱里学会了认字。以前大概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现在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我不确定如果没有了我，他是否还能受得了。

我们住在巴黎。我想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吧，不过，我到底出生在哪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每个人都说我长得像个中国人，但是米夏说，我比法国面包还要更法国。

一下子中午就过去了，但对于我的“生日”来说，现在仍然还是早晨。我一个人走在“艺术桥”上。这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桥，一

群衣饰鲜艳花哨的美国游客正坐在桥上喝酒。我刚满十五岁，还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我总是能一眼就分辨出，周围人群中谁和谁正在相爱。

一个男人正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妻子过桥。他们肯定深爱着对方。轮椅只依靠后排的两只轮子在桥面上滚动，因为丈夫把轮椅向后倾斜靠向自己，好像只有通过这样的倚靠，他才能从她的身体里面吸收到些什么。我希望那个男人能够见到此刻妻子脸上的幸福表情。他们看上去像是东欧人。因为虽然他们穿着考究，但衣物的款式早已经过时了。我猜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巴黎来。我还能猜得到，待会儿那个男人会用全身的力气将女人从轮椅中小心地抱起来，一直抱进灰扑扑的旅馆房间，房间里挂着的是被风吹得飘了起来的皱巴巴的窗帘。我甚至能清晰地知道她在他臂弯里的样子。他会把她轻轻地放在床的中央，好像那里曾经是一条舒缓的河一样。

一个肮脏的乞丐正蹲坐在那群美国游客中间，用蹩脚英语说着笑话乞讨。那乞丐对眼前女孩光洁的大腿毫无兴趣，只盯着瓶底剩下的残酒和盘子里奶酪的残渣。那些美国人看上去脾气都很好，听完笑话都善意地假装开心地笑着；我想，美好生活的关键，应该就是像这样温柔地忽略那些事实的真相，然后我们就能始终怀有随时都能重生的希望吧。

“艺术桥”是木头做的，从桥面木板的缝隙，能看见桥底穿行

而过的小船。有时候还可以看到船上一瞬间闪起的光芒，那是游客拍照时亮起的闪光灯，当然很多时候那些游客只是举着相机朝四周毫无目的地拍——我也喜欢这样乱拍，虽然我自己没有相机——但如果我能有架相机的话，我肯定会毫无目的地拿它来四处乱拍的。除了这样，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留下当下正时刻发生着的我们生活的痕迹吗？

米夏的小店在红灯区的皮嘉勒广场。店外挂着鲜艳的霓虹灯——用闪烁的箭头写着“性感”这个词。从我有记忆以来，米夏就有了这个小店。我不能到他的店里去，但我有时会偷偷走到那里的街角去瞅一眼坐在柜台里的米夏。他喜欢坐在那儿读乔治·卡普罗尼，一个早就死了的诗人的诗。米夏说，读他的诗，能感觉语言像鸟儿一般在他的身旁飞翔，在他的耳边鸣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见米夏的脸，可能会被吓得逃到马路对面去，因为他的脸上有一条狰狞的伤疤，从嘴角一直到脸颊。他一直说这是他在密西西比跟鳄鱼搏斗时留下来的，尽管我现在都十五岁了，可也只能这么相信他。

米夏有个叫李昂的朋友，喝醉的时候会来我们家过夜，因为他老婆不让醉酒的他进家门——不过他总是会跟我们解释说，他回不了家只是因为他不想去打搅妻子的美梦。有天晚上，正好米夏在浴室，李昂就给我讲起了米夏伤疤的来历。

“在你跟米夏一起生活以前，”他喘着粗气说，“他的小店外面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斗殴。米夏冲了出去，想要制止他们。”他停下，从衬衣口袋里面掏出装着白兰地的小酒瓶。我们俩都抿了一口，然后他拉着我的耳朵贴近他的嘴巴，穿过一阵白兰地的迷雾。“他想把一个挨打的妓女救出来，可警察来得太晚了，最后那群白痴只好把米夏抓了起来——因为那女的把自己给噎死了……”这时候，我们听见门厅里传来了米夏的脚步声，于是这个故事再也没有了结局，就这么消失在之后大人们醉酒的蛮荒之中。

如果知道李昂跟我说了这么多事，米夏一定会把他扔出去，因为他总是希望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一直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以后能进入索邦大学，巴黎资格最老的学校；然后我会离开这里，只在圣诞节的时候回来看看他，带上从蒙田大道或香榭丽舍大道最昂贵的商店里买回来的礼物。“买完礼物都不用你自己包装，”米夏有一次还感叹了一下，“因为商店里面的女孩儿们会非常乐意地在那儿帮你弄好一切！”

现在，我在我最喜欢的巴黎圣母院附近闲逛，因为它待在属于自己的小岛上。我喜欢看见游客们惊叹于石头建筑那种盘旋而上的美丽。我总是会联想起婚礼的蛋糕，它们因为做得太过精美反而让人无法下嘴——不过，饥饿的鸽子总是能知道事实的真相，数不清

的鸽子用它们肮脏的白色爪子像水滴一般降落在大理石地上，用它们小小的脆弱的尖嘴寻觅着食物。

有时候游客们会走进圣母院为某事而祈祷。在我小的时候，米夏总是会跪在我的床边，在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为我向上帝祈祷，提到我的时候他总是把我称呼为“花生”，所以我不确定上帝到底知不知道他祝福的“小花生”到底是谁——不过，如果那里真有一个上帝，他大概能知道任何事情，也应该知道我的真名不叫“花生”吧。

我在巴黎圣母院的台阶上抽完一根烟，看着一个意大利女孩在男友面前摆着各种姿势拍照，之后我去了亚丁公园。记事以来，每个星期天米夏都会带我到这里玩。有一次我还在草地上睡着了，米夏就趁我睡着的时候在我的口袋里装满了鲜花。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我需要盘点一下我的生活。我想我是愿意去上大学的，以后我还要送给米夏一辆红色的敞篷车，想起这些在亚丁公园度过的日子，我想为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做一些事情。或许这是生命中我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天空多云而阴沉，公园里的花全都已经盛开了。

这些脆弱瘦小的花瓣竟然能展现出这么多令人炫目的色彩，真是令人惊叹。

米夏的店卖的是录像带，现在还有 DVD，都是些半裸的女人跟人做爱的内容。米夏说，有时候做爱跟爱情其实完全无关，他从来不把这些黄色光碟带回家；他总是说，那些在皮嘉勒广场发生的事情，就让它们永远留在皮嘉勒。在我站在街角看着米夏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妓女走过来问我是否要做生意。我会告诉她们我有个朋友也干她们这一行，然后她们就会对我笑，递烟给我抽。我确实跟很多妓女成了朋友，其中关系最好的那个是桑琴，她说她年纪大得足够做我的祖母了。她总是穿着闪闪亮的紧身漆皮短裙，上衣的布料少得几乎什么也遮不住。我不能总是跟她站在一块儿，因为这会影响她的生意。她有一双漂亮的长腿，皮肤就好像皮革一样，可她好像对自己的长相一点也不在意。她认识米夏，她说米夏曾经跟她们中的一个女孩谈过恋爱，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没在一起。十二岁以后我想搞清楚那个跟米夏谈过恋爱的女孩的名字，希望还能有机会让米夏和她重新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桑琴，可她用双手捧住我的头，温柔地告诉我说，那个女孩已经死了，这就是结局。

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女孩的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米夏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密切的女朋友。所以那女孩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桑琴偶尔会送我本书做礼物，如果在工作，她就会托她的妓女朋友把书转交给我。最近她送给我的书，名字就叫作《种下希望并收获幸福的男人》。

在我的十五岁生日的这个多云阴沉的午后，我看见米夏正坐在他的柜台那儿看书。如果知道我跑到这里来，他一定会非常生气，并且用一整天不跟我说话或是其他的方式来让我知道他在生气。他不会再有任何兴致出去玩儿，不管今天是不是我的生日。所以我得小心地躲在人群的阴影背后，看着他。米夏正在读诗。在那些卡普罗尼的诗集上，他在图书的空白书边上也写下了自己写的小诗。曾经有一回，在那个愚蠢的时刻，我执意要翻开书看看米夏写的诗，米夏急忙从我手里把书夺走，结果把书都给撕坏了。我俩都感到非常难过。

米夏告诉我，他的这些诗并不打算留给我——它们是一群群小鸟，只愿与其他的小鸟为伴。当我问起他这些诗是留给谁的，他的眼里流出了一颗孤独的泪，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却因为伤疤改变了轨迹。

米夏每天四点会结束工作回到家。那时他会希望看见我正在家里老老实实在地看电视，等着他回来一起出门庆祝。他说到了晚上我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可时间真的很难熬。我猜他给我买了双新的运动跑鞋做礼物，因为在用吸尘器打扫房间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只耐克鞋盒。我没打开盒子。我也喜欢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天存钱。他在餐柜

的下面放了一个存钱的酒瓶。如果米夏的厨房里传出瓶子打碎的声音，邻居们就会知道，有人又要过生日了。邻居们都喜欢米夏，尽管每个人都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他脸上的伤疤和他曾经蹲过监狱的事实。

我们住在巴黎的第二区。这个街区像蛇蜕下的皮一样将巴黎市中心给缠绕起来。桑琴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她的门道口等客人，也许她现在已经找到了一单生意吧。米夏嘴里叼着一支烟，正在招呼来买片子的顾客。他深吸一口烟，脑袋往后一仰，一阵香烟的雾气被吐了出来。

我开始慢慢地走回家，我很喜欢经过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那段路。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蓬皮杜中心，你会以为它还在建造中，但其实那就是它的风格，你可以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看见里面的构造。我最喜欢看见游客在它透明的身体里沿着固定的线路游走，就像一队队的蚂蚁兵。蓬皮杜中心外有一个面包车大小的金杯。可没有人想过在里面种点什么，所以大概它放在那里就是为了展示。

虽然米夏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但其实他也不是很确定。没人知道我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米夏和我的相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米夏说，在他遇见我以前，他是一个大坏蛋，后来是我改变了一切。在他出狱的那一天，他说，他坐上了地铁，那时候我肯定已经有三岁了——或者这只是他那么认为而已。他说，一切都发生在

电光火石的那一瞬间，地铁车厢的门关上了，而我就站在那里盯着他看。他说，我的父母被关在了门外，他们在站台上拼命地敲打着地铁的玻璃门，大声哭喊着。他说，我一定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进了车厢，在他们发现我之前车门关上了。我经常问他我父母的长相，这时米夏的表情总是很悲伤。他说，他们是他见过的最高贵体面的人。他说，我的母亲就像某个亚洲国家的公主，穿着最上等的皮草大衣，涂着嘴唇好像都着了火般的红色唇膏。

米夏说，我的母亲有一头漆黑的长发，头发垂落在脸庞的四周，仿佛是因为母亲的美丽而不敢太过贴近。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高大的美国人，穿着那种手工制作的最昂贵的西装。米夏说，他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因为英俊所以往往会让人忽略他的强壮。他说，他们在哭泣，像小孩一样猛烈地敲打着地铁的车门；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有人这么痛苦过。

米夏说地铁开走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停地哭，所以他只好一直坐在地铁上，直到终点站。没有人来管我，所以他把我带回了家。我总是哭个不停，一整年里像老天下雨那样动不动就哭。他说，我搞得邻居们一群群地过来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一点后，我很生气米夏没能找到我的父母，我想可能他们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地方，他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直到他们能找回我，他们唯一的儿子。米夏告诉我说，他曾经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吃不睡地去找他

们，最后他发现他们都死了，在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线上他们遭遇了飞机失事。我的钱包里，有一张阿根廷的地图，那是我从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撕下来的。有时我会用手指在地图上的城市间画出一条条航线，猜测他们乘坐的飞机到底是从哪儿掉落了下来。

九岁的时候，米夏给过我另外一个选择，我可以去某家孤儿院里生活，不过他也跟我详细说明了他是怎样从一家孤儿院里长大的，以及他在那里的生活过得一点也不快乐。

我喜欢坐地铁，虽然地铁里阿尔及利亚帮的男孩们有时会朝我吐唾沫。当地铁缓缓驶进米夏发现我的那个站台时，我总会疯狂地朝着四处看。我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不去寻找他们。米夏说他们是他见过的最善良最温柔的那种人，而我长大以后也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可有一次桑琴的一个妓女朋友说我长得像一个叫安妮·李的女人，桑琴扇了她一巴掌让她闭了嘴。或许，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去问问桑琴，这个叫安妮·李的女人到底是谁。

我们在第二区的公寓房间非常简单。所有公寓房的窗子都围绕着天井的院子打开着。透过窗里的灯光，我能看见人们的生活一一在眼前打开。每个人的生活都好像一出慢动作的动画，我看着邻居们争吵、梳洗、做爱和烤肉。我还看见有个人过得很不幸福，因为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电话铃响，有时他还会拿起话筒听一听，

以确认它是否还在正常工作。但是电话铃从未在他等待的时候响起过。米夏说是因为他的老婆离开了他，他说如果我在祷告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祝福的话，我可以为他祈祷一下。

我听见米夏把钥匙插进了门锁。

“生日快乐，我的小花生！”这是他进门后的第一句话。他在我的脸上亲了两下，让我准备好出门。我关上电视，去门后找我那双肮脏的运动鞋。它们不在那儿。米夏用火柴点燃香烟。

“到我床底下看看去吧。”他说。

我遵命，然后我在他的卧室里叫嚷了起来，他知道我找到了我的新鞋子。米夏想知道鞋子是否合脚，我穿上新鞋。我喜欢新鞋的这种皮革的味道。

晚上我想去吃美式汉堡包——那种我的亲生父亲以前可能会做的汉堡包。或者我们还可以去看一部美国大片。《黑超特警 2》正在全巴黎的影院热映。我把音响打开听着音乐，看见了镜子里面自己的脸。厨房传来打碎瓶子的声音，一些邻居从打开的窗户向我们祝贺。

米夏敲敲我的门，他的脑袋从门缝探入。

“好了吗，布莱德？”他问。我说好了，我们出发吧。

薄暮之下，我挽着米夏的手走在大街上。巴黎永远都不会沉入黑夜，因为当自然光渐渐黯淡消沉，街灯就会一一亮起，让你无

法远离它们的映照——街灯通常都很美——挂在高高的黑色灯柱上，每一盏街灯都由两只相爱着的散发着温暖光线的白色灯球所组成，统辖着属于它们的一小段的街道。有时候，它们会同时闪烁起来，忽明忽暗，好像在告诉人们，只要在一起它们就能阻挡住黑暗。

我很清楚米夏其实很想像以前那样牵着我的手，但是我现在的年纪已经够大了，用不着大人牵了，所以他只好抽着烟跟我说，无论生命中我作何决定，我的想法都会得到充分的尊重。

我想米夏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说，诗歌总是来源于日常的生活，它们是上帝赋予的恩赐。可能著名的诗人米夏将来就会葬在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百年后，人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参观他的墓园。在他的墓碑前他们也会留下自己写的诗，向他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因为他诗中的那些小鸟，在黑暗的时刻给他们带去了动人的歌声。

米夏买了两张电影票，用的是酒瓶里存下的零钱。卖票的女孩一点也不介意收到的全是零碎的硬币，女孩的左眼睛有点斜视，没有清点完硬币她就把电影票扔给了我们。我们走过她的售票亭时，她在研究米夏脸上的伤疤。米夏把手里的票递给检票员，那人把票撕成了两半。米夏要我保存好票根，所以，我打开钱包想把票给放

进去，这时，我夹在钱包里的那张阿根廷地图掉了出来。米夏一把捡起了它，拿在手上看了看，却没有把它打开。我赶紧把地图抢了过来又塞回了钱包里。

“啊，这里头是花生的小鸟啊。”他笑了起来。

我们找到了黑暗中的座位，消失在了电影的光影之中。

草莓的香气

巴黎，在声名狼藉的瓦格拉蒂大道上，伯纳德医院八楼的病房里，九号床的病人除了草莓什么也不要，已经有好几天了。在那个星期二的下午，大雨下得好像有无数的小手小脚在敲打着窗户，那是病房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当大多数病人在药物带来的睡眠中渐渐失去意识时，皮埃尔-伊夫却清醒地躺在那里。他心里很明白，自己正在慢慢死去。在他的床边，放着整整一碗他够不着也摸不到的草莓。而每当他看着草莓并幻想草莓的甜蜜滋味时，他就会回想起她并颤栗起来。草莓满满地堆在一个沉重的黄色大碗里。

皮埃尔-伊夫深深地呼吸着，试图把肺里所有草莓的香气全部排出去。他想象着楼下的街道，一辆辆充满香烟雾气的出租车正在交通信号灯之间横冲直撞。在一个被成百上千只鸽子占据的广场上摔倒后，皮埃尔-伊夫开始度过在医院的第一个夜晚。而关于她的回忆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不住地荡漾。

她出现的时刻，就像一束光线，透过屋顶上的裂缝照进阁楼，把飞舞的灰尘化为点点星光。那是他一直渴望记住的她的样子——从河对岸静静地、迷人而又懵懂地凝视着他的样子。而不是后来在梦中反复浮现的她临终时候的模样。他本可以带她去美国的，现在，他知道了。

他看着雨滴如何跟距离最近的另一滴汇聚在一起，然后被自身的重量拉开，沿着一条直线从玻璃窗上滑落。甚至，在她的家人全都被杀害之后，他依然什么都没有做——哪怕任何一点小事也没有做。

如果没有回忆，他想，人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皮埃尔-伊夫飘浮在回忆中，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到现在了——无法回到这个雨天这个病房——但他还希冀着至少能回到那个花园。花园环抱着那座小屋，像草莓成熟时节的夏天一样悸动着。

暮色开始在病房里荡漾，整个世界松开了缆绳滑入夜幕的阴影。他回忆起他曾告诉过他，她的叔叔是如何教她骑车冲下台阶的，她还曾经在自行车手把上捆扎着的篮子里放满了鲜花。她还曾对他谈起，那个夏天，他俩所经历过的那个最热的夏天。他们曾经一度逃出巴黎这闷热、缓慢的脉动，去她祖母拥有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小屋。那种就像自己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小屋。厚厚的常春藤蜿

蜒地爬满了整面石墙，未经修剪的玫瑰花恣意向上生长，一直长到二楼的窗户那么高。

卢瓦尔河静静地向西绵延半公里，在隐入远处田地零星稻草堆背后的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一湾金色。

那个下午，就在丝绒般缓缓流淌的卢瓦尔河畔，他们发现了一片绿茵，他们在一簇簇野花丛中铺开了毯子。皮埃尔-伊夫回想着，那时她在大谈着她的少女时代。她说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曾经真的相信，假如她踩进一个污泥坑，就能许下一个成真的愿望。在战后漫长的悲伤岁月中，皮埃尔-伊夫从没忘记过这一切，他总是在暴雨中收起雨伞，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崎岖的归家路上放声痛哭。

此时，当整个医院已沉浸到最深的夜色中，他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一种要让自己的思绪从那片草地离开有责任，并以此来再度见证她最后的时刻和随之而来的麻木感觉。虽然那些战靴的脚步声又开始回荡，那种烧灼的战争气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还是突然清楚地闻到了一种甜蜜的气息，像久久不散的酒香缠绵在他的周围。声名狼藉的瓦格拉蒂大道的画面，当年弹痕累累的景象，突然消散、褪尽。在他睡着的时候，她也睡着了，她的长发披散在他胸前——就像在那栋小屋后的花园里一样。

他注视着她的呼吸起伏，感受着她的重量倚靠在自己身上。在

这种神秘而微妙的美好诱惑下，当天空中舒卷的流云渐渐笼罩在花园之上，他拈起一颗草莓，把它轻轻放在了她的鼻子下面。她睁开眼睛，一口咬了下去。他感到突如其来的一阵依恋，于是紧紧地拥住了她。

皮埃尔-伊夫和那些花朵一样，被暴风雨吞没，然后消逝了。第二天拂晓，他停止了呼吸。一名一直照看他的、刚刚新婚的护士从沉重的黄色大碗中拾起一颗草莓，放在了他的唇间。与此同时，在一间俯视着塞纳河的阴郁沉闷的办公室里，护士的丈夫正在思念着她，思念着她阅读的时候手肘在草地上压出来的那个小小的凹坑……

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

我在沙滩上，半靠着浮板，半坐在沙子里。那些用毛巾和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搭起小帐篷的人群，环绕在我的身边。

天气相当炎热，不过还好有一股凉爽的风从北边吹过来。我穿着游泳衣，坐在从停车场的小摊上买来的泡沫浮板上。我的肥肉垂下来，就像它们想从我身上逃走一样。我应该锻炼身体了，就算不为了缩减肚子的尺寸，也得为了我的心脏。

在美国，尽管海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海浪，面对泛起白色泡沫的海浪的高声嘲笑。

所有的海洋都是同一个。因为每个海洋都跟其他的海拉着手。虽然在布鲁克林我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还有一个叫蜜娜的女朋友，可我的一部分灵魂还是留在了俄罗斯。我希望我能最后一次勇敢地面对大海——就到我胸口那么高的大海——那样的话我才能跟自己重新结合起来。

我是一个人到海边来的。蜜娜还以为我在上班。对于很久以

前发生的那件事，她只知道一半。我猜其实我也只知道这故事的一半，因为我现在还活着，没有被困在海床上的那只金属盒子里。说老实话，自从发生那个意外以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过好觉。我常常梦见他们都还活着，就在那片海的下面，然后，我的大脑就开始幻想出各种魔术般的奇妙方式，去营救他们。

一对年轻夫妇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那年轻的男人拿着一块冲浪板，他往远处眺望着，点着头。

“这风吹的，天有点凉。”他说——也许他是在跟我说话，要知道我的英语不是那么灵光。我挤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向他挥挥手，这是在我无话可说时用来避免冒犯别人好意的一种方式。对美国人你必须得这么干，他们都很友善，有时候未免有点太友善了。不过，这是他们文化中很可爱的一个缺陷。我喜欢这里的夏天，可我的皮肤有些太过苍白，所以这里的人总是会盯着我看。蜜娜说，我应该抹上一种防太阳紫外线的膏，免得被晒伤或者得皮肤癌。但是，我总是没办法对这类并非迫在眉睫的危险产生任何恐惧感。蜜娜说我是个固执的猪，有时她是对的，但我在努力尝试改变。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那些梦才是真实的记忆，而我跟蜜娜在一起是天堂里的生活。也许现在的我在天堂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夫妇摆出了一些椅子，他们的几个朋友也来了。他们看上去迥然相异，但又相亲相爱。看得出来，能到这里

来，他们高兴极了。其中一个肩膀上有蝴蝶文身的女孩迫不及待地跑向大海。她直接就冲进了浪花里，浪头像墙一样倒下，淹没了她的身体。年轻人中有几个人开始对我微笑，我也回他们以微笑。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在这么美好的一天里就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块泡沫浮板上。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厌恶我的苍白和肥胖。我很高兴他们在我的附近。他们分散了我的注意力，让我暂时看不见那些从海浪中伸出来的向我不停挥舞着的朋友的手。我的朋友们并不是在叫我一起离去，而是在挥手跟我告别。

如果你能想象出那些光秃秃的山脉和干涸晴朗的蓝天，你就能知道，从俄罗斯我出生的那个房间里望出去能看到的风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父亲在一家生产门板的工厂工作，我们住的房子背靠大山，大门俯瞰着像树叶那么绿的、深邃而宁静的大海。明朗的夏日清晨，父亲和我驾船出海，在船行了差不多一英里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天有多高，海就有多深——所以千万别掉下去，乖孩子。”

我们的船划得越远，海水的颜色就越深。父亲向我解释说为什么那些被我们的网拉上来的鱼会像闪电一样冲破水面——那是因为，它们从来都没见过光。想象一下那种在彻头彻尾的黑暗中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被猛然扯出了自己的世界，来到一个美丽而冷酷、

以前从未想到会真的存在的风景里。

我小的时候，俄罗斯跟现在并不一样。我一直以为我也会在父亲干活的那家工厂里工作到老。你也许不相信，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那工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那里总是有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门”在阳光下排列着，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卡车。

那时我常常在想，每扇门应该都会通向一个不同的村庄和一种不同的人生。我好奇的是，父亲制作的那些门，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内，会有多少灵魂穿过它们。后来，到了青春期，我开始想象——成双成对的情人关上了门，然后在洒满月光的房间里做爱。

我那时很为我父亲的工作自豪，因为那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美国的一个沙滩上，跟我现在所处的沙滩没什么不同。在梦中，我在滚烫的沙子上睡着了，我在梦中醒来时，周围的人都被我父亲制作的门取代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形——没有人、只有一千扇门的沙滩，一千扇门的框架就这样站在那里。

当莫斯科的政府改朝换代的时候，工厂倒闭了。我父亲离开了人世，而我加入了俄罗斯海军。

我会向我的女友蜜娜求婚。她出生在佛罗里达。她喜欢听有关我父亲的故事，因为她自己的父亲乏善可陈。我想她会答应我的，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想当然，因为有时候我对她很冷淡，而且我觉得

很难向她解释清楚我心里真实的感受。但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人当中，她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

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下海了，女孩子们正看着他们。拍打海岸的浪花有衣柜那么大，我能看出来有一些年轻人已经被吓到了。女孩子们也很害怕，但一切并不会因此而停下。

在海军服役的最初五年里，我接受了如何从潜水艇发射出导弹的训练。每次导弹发射的时候，整个潜水艇都会颤动不已，非常激动人心。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一切都需要完美的同步，不然导弹就不能击中预定的目标。在发射导弹的日子里，我们谁也不敢把伏特加偷偷带到发射室去。

那段日子还挺带劲儿的。我还记得跟伙伴们一起流连于各个港口的美好经历。那里总有大把的女孩儿，她们喜欢海军制服多过喜欢我们本人。那时的我是如此年轻，跟我现在痴肥的模样完全扯不到一块儿。当我们的潜水艇退役的时候，我们都很伤心。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对它已经有了喜爱之情。

我是在皇后区做酒保的时候认识蜜娜的。她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我在的那个酒吧给人庆生。她们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她们特别友善的美国女孩儿，听到她们的笑声让我觉得非常愉快。那晚，我被炒了鱿鱼。因为蜜娜的朋友闹出了点小插曲，但是我完全不在意，因为蜜娜把她的电话号码写在纸上给了我，还用她的大眼睛深深地看

着我。

很奇怪，有些我认识的俄罗斯人一点都不喜欢美国人，可是他们却选择生活在这里。我觉得他们的痛苦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而不是环境造成的，如果他们回到俄罗斯，一样会找到各种可以抱怨的东西。

那晚蜜娜和她的朋友们喝了越来越多的红酒，变得越来越吵，有人还把一个杯子从桌子上撞了下去。可她们看上去那么快活，所以我一点也不在意——她们让我想起了过往的那些漫长的夜晚，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漫漫长夜，那时，K159 潜水艇还是俄罗斯海军的骄傲。

蜜娜她们并不是当晚唯一喝多了的人，当她们开始点咖啡和巧克力的时候，酒吧里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开始用俄语说些关于蜜娜和她朋友的污言秽语。我走到吧台后面去洗杯子并试图忘掉他说了些什么，男人喝醉了都会变成猪猡。

酒吧空了下来，我回到吧台，开始收拾东西。蜜娜的一个朋友想点最后一杯酒，我请她喝了一杯，因为我喜欢她们这群人，希望她们还会再来。

蜜娜的朋友端起酒转身想回到自己的桌子上，吧台边那个一直在嘟囔的醉汉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差点把酒洒了出来。他用俄语说着恶心的下流话，脸上却带着微笑，所以那女孩还以为他是在表

示友好。她也微笑并容忍着他的醉态，可我却难以相信一个男人能对着女士说出这种话来。我把两杯喝的重重地撂在吧台上，用俄语告诉那个男人他得让她走。他愚蠢地看着我，好像想说点什么但又想不起来该说什么似的。

醉汉把我放在吧台上的酒打飞。女孩想把自己端着酒的胳膊抽回，他却抢过了酒杯，把里面的酒倒在了她的裙子上。

这男人很可怕，可别忘了，我在俄罗斯海军待过十多年。我一把捏住醉汉的脖子把他拖出了酒吧。我还记得收拾他的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怜悯之情。不过，在我回到酒吧，看到那女孩在哭泣时，怜悯就完全消失了。

那男人在街上大喊大叫了一阵，然后离开了。他是酒吧老板的朋友，所以十分钟后我的老板亲自打电话来解雇了我。老板在电话里嚷着说我是个可耻的罪犯，我点了一支烟，看着那群人里最漂亮的那个姑娘走近吧台，她跟我说，谢谢你。她在一个火柴盒上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刚开始我有点踌躇要不要接过来，因为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碰到过很多被暴力吸引的女孩，结果表明她们都有点疯疯癫癫的。可这时，她正用又大又深的双眸沉沉地凝视着我，让我觉得，不管怎样我都得收好她的号码。

酒吧里的侍者是两个南美人，平时我跟他们处得挺好。他们整理好混乱的吧台，拍了拍我的背，告诉我说如果是他们也会像我

这么对付那个家伙的。酒吧里没走的家伙们假装没注意发生过什么事，他们彼此小声交谈着。之前他们也曾为那些下流话哄笑过，这会儿大概是觉得羞愧了。

曾经我是个打架的好手，曾经我还是个英勇的海军战士，可现在的我却居然没有任何的勇气，能让坐在沙滩上的自己拿起身下的这块廉价的泡沫浮板走进海里去。我觉得非常渴，头也开始疼了。那些年轻人全都安全地冲完浪回来了，我使出浑身的劲让自己不要在这里、在所有人的面前开始抽泣。

所有的年轻人都平安地回来了，女孩们正在用毛巾把他们裹起来。

当年，就在我们的潜水艇接到退役命令的几个个月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它拖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弄沉它。那时的我们军心涣散，只想着让这件事快点过去，这样我们好重新开始做其他的事。艇长说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不管我们被调到哪里，都会作为一个集体一起被调过去。其他几个单位的兄弟已经被调到车臣战场上。我们听到了关于作战双方的各种非常恐怖的传言，可我们还是尽力保持乐观：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包括我在内，我们的潜水艇上驾驶舰艇和发射导弹的一共有八个人。在正式执行巡航任务时，会有一百来个其他单位的水兵加入我们，但平时，我们八个人就能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单独搞定这艘

潜水艇。以前在把潜水艇开去进行维修保养时，每个人都会带点威士忌或者伏特加上艇，这样在路上我们就能大喝一顿。对此事艇长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是少数几个能独立操纵潜水艇并进行短途航行的海军单位之一。搞维修那哥们过去经常说我们是“骨干机组”。

所以，我清楚地记得意外发生的那个早晨，记得如此清楚，以至于我对自己当时无法阻止意外的发生总有一种荒唐的奇怪感觉。那天，天空湛蓝，海风凛冽，好几英里之外的海面都清晰可见。天气冷得要冻死人。早餐我们吃了鱼。在等待命令的时候，我们全都挤在一起抽烟聊天。

迪米特里——我最好的朋友——告诉大家他想结婚的念头，我们都觉得他疯了。几百码外的拖船上，几个穿着黄色工装裤的人冲着我们挥手，他们是来把我们拖到海面指定位置的，等潜水艇沉了以后，他们还会用拖船把我们送回来。按照程序，我们应该在潜水艇被拖过去的过程中驾驶它，然后在他们拆卸牵引绳之前爬进拖船。虽然当班的时候严禁喝酒，可我们还是在背包里藏了几瓶伏特加，这样我们就能在我们的老伙计沉入它海底的坟墓时敬它一杯。

我们排好队让长官视察，艇长说：“我们需要一个人到拖船上去帮忙搞定牵引绳。”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是这样说的。

我站在队伍的最后，所以他指着我说：“就是你，下水，有条小船会送你去拖船。”

我遵命，尽管心里有点苦涩的失望，因为我被剥夺了参加最后一次巡航的机会，还有告别的痛饮机会。

拖船上的兵跟我们一样都是硬碴。我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递烟给我，我远远地看着伙伴们爬进了潜水艇。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当潜水艇的舱门关上时，我感觉到了一阵刺痛从我的脊椎底部传上来，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是我看着醉得一塌糊涂的父亲划着船驶向大海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启航四个小时后，拖船突然猛地向前冲了一下。当时我正站在船头，看着船艏切开漆黑冰冷的海水。拖船突然摆动，我摔倒在一堆绳子里，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胳膊折断了两处。我听到船尾传来叫嚷声，我赶紧冲了过去。我向大海望去，却只能看见一截断了的牵引绳在海面上漂浮着。几分钟的混乱之后，船长命令我们全部坐下，我们束手无策，那时 K-159 潜水艇至少已经在海面以下一英里的地方，而且还在继续下沉。

我永远不会忘记拖船上那些人的脸，我们一起抽烟默默等着上级的指令。他们看着我，那神情我以前从来没在别的男人脸上看到过，那是小时候半夜惊醒，父亲拿着蜡烛来到我床边时眼里的那种温柔。

我永远不会忘记坐在拖船上等待时感觉到的那种可怕的耻辱，那时我最亲近的朋友们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沉向大海深处。

他们像是感觉到了我有跳入大海的冲动，两个人走了过来，坐在了我的两旁。他们递给我伏特加，一句话都没有说。

等待命令的时候，船长一直试着用电台跟外面联络，但不知道为什么通讯设备失灵，能收到的只有静电产生的干扰声。后来有时一个人晚上开车，我便会开下公路，把车停进空旷的停车场，然后把收音机调到静电干扰的声音。

报纸上说那是个很简单的悲剧事故，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用来拖潜水艇的缆绳断了，而已经报废的潜水艇没有重新升上水面的动力。

英国人差不多立刻就派了人过来帮忙援救，但是一场风暴让一切营救的努力都变成了不可能。任何人都说不上来他们最后还活了多久。那里只有彻底的黑暗和彻骨的寒冷。最糟糕的是，他们都知道不可能有人去营救他们了。

我想知道，他们那时都在想什么。我知道他们一定会谈到我，并且会很高兴我没待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我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曾偷偷地希望自己才是站在队尾、被挑出来去拖船上帮忙的那个人。我打赌，迪米特里，我最好的朋友，一定在感谢上帝饶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一直把女朋友的照片带在身边，而且我敢打赌当他停

止呼吸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把那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

我经常在蜜娜睡着的时候清醒地躺在那里，祈祷迪米特里能给我一个他一切都好的信号，也许就像父亲和我从黑暗的海里网上来的鱼跳出水面那样，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崭新的明亮的地方重生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喝光了那些伏特加，我想那会让他们暖和一点。在迪米特里的葬礼上，他的女朋友和我，还有他的父母，选了一些他私人的物品与他的照片合葬在一起。整个海军荣誉葬礼的过程中，他的母亲一直凝视着我。我知道她为什么看着我，因为我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葬礼结束后，我告诉迪米特里的女朋友，他在生命最后那个早晨告诉我们他要向她求婚。她打了我一耳光，从此再也没有跟我说话。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希望我能被宽恕。

蜜娜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在俄罗斯离世的事情，但她并不知道整个故事的真实面貌。或许有一天，我会告诉她一切，如果那时她紧紧抱住我并开始感谢上帝，我就会毫无疑问地我应该跟她结婚，在那一刻我就会向她求婚。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美满，不管是在皇后区还是在长岛。

我要把我的泡沫浮板拿到海水里去，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我的同志们，而是为了蜜娜。我想要在那些浪尖上再滑行一次，我希望大海能把我永不停止的爱带给静静躺在那里的他们。我

希望大海能告诉他们我也找到了我想与之结婚的女人，所以我不得不跟他们说再见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能跟他们在一起——用牢牢记住我们在一起的好日子的方式——至少在我有生之年。

最最重要的，我想要去相信，我被选出来去拖船上帮忙，这并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意外。我希望我能相信，事情会发生总是有原因的。我想要相信这个，比任何事情都更想去相信，因为如果那只是一个偶然，那么上帝肯定在他造完整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死了。

不一样的鞋子

当他来到那座老矿的入口时，时间已经过了午夜。雨已经停了。搅拌机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边。他的额头上盖满了黑色船锚一般的头发，雨水顺着一绺绺的头发流下来。

自从肯塔基州因内战而分裂，艾德蒙森县的土地上就再没有开过矿了。矿山入口是一堆歪歪扭扭的钢架，上面爬满了常春藤，乱糟糟的一团。破破烂烂的煤车和轨道锈结在一起。

空气厚重而潮湿。他呼出的一团团白色水汽消逝在黑暗中。碎玻璃像坠落的星星那样在他的鞋底下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他那满是窟窿的鞋子，还是多年前她从商店的货架上使劲拽下来的。

“多帅啊你！”多年前在那个商店里她是那么说的。当时他撇着O形腿漫不经心地戳在镜子前，斜眼瞟着自己一站三道弯地踏在那双鞋里。

“你穿着那鞋子真是帅啊。”他们开着卡车一路颠簸着回家时，她又这么说了一遍。这已经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他绕过储煤箱，穿过附在锡罐上矿工鬼魂们的窃窃私语，走进了辽远的黑暗中。他记得床底下她收藏的那些照片，都是些她祖辈的肖像，色调温暖而斑斓：威尔士唱诗班，穿长袍留胡须的男人，脑袋从白色亚麻布下伸出来的女人们，铅灰色天空下被煤染黑的面颊，镇上的第一辆车，大门口的煤气灯。

他跨过一堵倒塌的墙。一直走到脚下的碎石和玻璃碴变成了一丛丛野草，一直走到一片草地上，才停下了脚步。这片草地杂乱无章地延伸到河边，一直伸进奔涌不息的河水里。

他在这里停下，静静聆听。

河水低嘶的声音。他自己呼吸的声音。风在潮湿的草茎间穿过的声音。

六年不通音讯之后，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那个下午。那个下午，他们把对方牢牢地嵌进了自己的灵魂里。不管他去哪里，他都没有办法再逃离艾德蒙森县，因为这是她的家所在之处，它一直纠缠着他，蟋蟀的唧唧声，酷暑之夜的气味，干净清凉的池塘——他的感官也是同谋，把他带回这里。

现在，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在这片河边的草地上，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绝望地挣扎着，试图摆脱那副把他和自己并不想要的人生锁在一起的镣铐。她的声音像涓涓细流在他身体里响起，像冰山持续地融化着。

那天看到他时，她有种不同寻常的高兴劲儿，毕竟他们有六年没见了。她还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她看上去并不惊讶，就像那么多年来他就藏在附近什么地方一样。他们开着她的小卡车穿过了整个镇子。镇上的房子都有着破旧的屋顶，小孩子们踢着石头，为了开车，她把鞋子蹬掉了。

离她房子不远处的田间，一阵很浓的粉色大雾把奶牛的腿和树木的树干都淹没了。在尘土飞扬的窄路上开了很多英里之后，他们终于开进了她的车道，把车停在了一个装满了干叶子的四脚浴缸边上。几条狗狂吠着，四爪腾空地冲下门廊，然后绕着卡车跑了起来。

看着她光着脚穿过车道，他跟着她进了屋子。当他踏上门廊的时候，一排猫咪的脑袋出现在纱门后面，不过当狗儿们发出低沉的呜呜声靠近时，它们很快就消失了。

打开纱门时，他发现猫咪们在他面前踮着脚保持着平衡，专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像他在无意间踏上了一个猫剧院的舞台一样。猫咪们懒洋洋地倚在架子和冰箱上，还有楼梯上。它们抬起爪子和转过头的样子就像是某种奇怪的机械玩具似的。那几只猫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地把身子蜷起来，听着它们的女主人在厨房里用一只长调羹在一杯冰茶里搅拌的声音。狗儿们又蹦蹦跳跳地向他跑

来，还一直淌着口水。几只躺着的猫被踩到了，发出了威胁性的嘶嘶声。

她哼着歌搅拌着那杯冰茶。然后当她坐下来开始盘问他的生活，换成了他在搅拌。一直到他们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他还在不停地搅拌着那杯冰茶。就像有什么微妙的东西从那杯子满是砂糖的底部升腾了起来，夺走了他们的语言。

他们俩谁也没结婚，这造成了一种一切都没有改变的幻觉。握着那装在玻璃杯里的冰茶，他几乎招供了一切。

多年以前，他们曾经订过婚，但是有一天他却离开了。

在意识到她有多么难忘之前，他早已不记得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而离开。他们之间的亲密曾经没有极限。

孤零零的书架上跟一堆平装英文小说放在一起的，是一把刻着她祖父姓名缩写“M.L.”的鹤嘴锄。他想象自己坐在那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他，那个他没有离开过六年，那个他一直生活在这里，每天总是在脑子里思索着种的烟草能有多少收成、晾晒它们又需要费多少功夫。

谈话之间他们不时陷入沉默，在沉默中他隐藏起那令人困惑的分裂感。他在想，留下来并把这把椅子变成我的，这多容易啊。她养的那些动物很快就会习惯我的存在。要不了一天时间我就能知道

它们的名字，好呼唤它们来吃晚饭。他瞅着门廊，想着怎么才能把它修得更好一点——并在脑子里记下所需要的工具。

很快就到了该喂狗的时间，他走过去帮忙——作为延续那种日常生活般幻觉的方式。当最大的那条狗从一堆折叠的硬邦邦的毯子上站起身来时，一双被啃过但基本上还算完好的鞋子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他把鞋子捡起来，回想起当初她是如何把它们从商店里挑选出来的。

看见他拿着那双鞋子，她把身子转开。

“这不是同一双鞋了。”她说。

“看上去就是那双——你选的那双。”

“不是那双，亲爱的，”那句话颤抖着从她的嘴里掉下来，“它们再也不是你的了。”

他把脚塞进这双鞋子里，换掉了他来时穿的那双，就像是一个代表公平的姿态。房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他跟随着哼着歌的她来到后院。她站在一棵树旁，两个秋千从同一根枝条上挂下来。

“秋千。”她悲伤地说，湛蓝的眼睛里有亮光闪过。于是他们坐上秋千摇摆起来，像是一生都不会停下。头顶上的树梢就像一根苍老的手指，在薄暮里画着圆圈。

清晨的微光洒上这片草地，景物的形状渐渐浮现。他在心里描

绘出她在那所房子门廊上的摇椅里睡着的样子，一缕缕金色的秀发披散在赤裸的肩头。

它们是同一双鞋，他想，她选的那双。

他凝神细听，风灌满了老旧的矿山。与此同时，在寂静而黑暗的地下深处，土地又再一次变得肥沃，等待着人们笨拙而坚定的双手。

他们躲在哪里是一个谜

母亲的葬礼后，埃德加开始一个人在公园里默默地漫步。当他还是个婴儿时，母亲就经常推着他在公园的小路上散步。在他们共度那些午后时光，她会念书给他听，虽然他那时还不会说话，但是她知道他在听，而且他也一直记得她的声音。她死去，他的童年也在脚下碎裂开了。

埃德加的父亲是一个英俊而严肃的人，身上总是带着烟草和古龙水的味道。他不许埃德加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时候离开公寓，可是，他总是在办公室待到夜里很晚，所以埃德加知道自己一个人溜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躲过门房斯坦的眼睛溜出来一点也不难。斯坦喜欢喝点小酒，每隔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消失十五分钟，那之后他就会坐在门房里，尽可能地装出很清醒的样子，但是那反而让他看上去更醉了。

每次埃德加都会穿过第五大道，走上一条通向树林深处的小路。在去公园的路上，他经常会看见那些让人画肖像的旅游者、弄

火的卖艺人、缓慢的国际象棋棋局、形单影只的秘书，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总是聚在一起大声讨论着天气。

在那棵悬铃木和丁香丛之间，隐蔽着一条长凳，那是他和母亲坐在一起分享秘密的地方。

“没有你，”她有一次这样跟他说，“这个世界就不完整了。”

这条长凳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只是一条小小的木凳而已，在雨中它会变软，颜色显得更深。

埃德加曾偷听到父亲的电话，听到他说他永远也无法从妻子的死亡中恢复过来，但他会试着学习带着这个伤痕活下去。门房斯坦告诉埃德加母亲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埃德加想象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地方比公园更好，尤其春天的时候，丁香花争先恐后地像小炸弹那样迸裂着开放，把它们的香气泼溅到草地上。

长凳的凳脚旁长满了一丛丛的茶玫灌木，母亲把这种花叫作“彼得·潘的玫瑰”，因为它们不肯长得像它们的表兄那样、做柔软的有着一层层花瓣的普通玫瑰。

母亲的病情刚被确诊的时候，她还经常不顾医嘱，带着埃德加偷偷溜出家门，一起在公园里用很慢的速度散步。三个月后，她只能倚着一根藤杖走路了，走起来就像一个疲倦的杂技演员在努力保持平衡。再后来，她的手腕和脚踝的肌肉都萎缩了，她再也不能离开公寓了。埃德加把藤杖用圣诞节的花纸包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

床垫下。因为负担她的体重，那藤杖有点变形了。是被她的爱的分量给压弯的。

母亲死后一个星期，埃德加被父亲清理衣橱的声音给吵醒了。透过卧室那道有裂缝的门，他看见父亲愤怒地把母亲的毛衣、裙子、内衣和袜子胡乱地扔进垃圾袋里。放学后，埃德加一个人走在公园的小路上，清楚地回忆起衣架在衣橱里滑动撞击发出的声音，和他父亲那令他难以呼吸的痛苦——那种被抛下的极大的痛苦。

埃德加对父亲用处理周日旧报的方式来处理母亲的衣物很不满，但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件事交换过任何意见。事实上，除了有关学校和工作的话题，他们再也没有和对方说过话。

父亲把所有东西清理掉的第二天清晨，埃德加解开了一个垃圾袋的绳子，抢救出了一件毛衣。他把毛衣也放到床垫下，跟藤杖放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件他无法打开的生日礼物，上面有一张小卡片，写着：“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

包装纸上还画着彼得·潘的玫瑰。

埃德加跟父亲更疏远了。他们通过像条河一样在他们之间流淌的沉默来交流。在母亲死后的几个月里，这条河越来越宽，直到父亲成了河对岸一个远远的静止不动的小黑点，他穿着皱巴巴的西服，叉着腰站在对岸看着他。

从门房斯坦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沉浸到公园葱茏的绿意中，

对埃德加来说成了唯一重要的事。对他来说，吃饭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到饥饿带来的晕眩，睡觉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在令人忧伤的日常活动中睡着。

学校生活则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梦。上课的时候他集中注意力，也跟其他孩子一起吃午饭，但是他们的笑声只能提醒他母亲的不幸。当其他男孩邀请他去家里玩时，他安静地拒绝。

埃德加在阴影下生活着，那时他真正的自我——就像是纳尼亚王国里的一个石头雕像——一直停留在他逐渐消逝的母亲身边。

圣诞节去了又来。门房斯坦买了一棵树，还帮着埃德加的父亲在树枝上装上了彩灯。很多礼物被送来、打开了。一只火鸡被切开。但是欢乐却退缩进了密密的树林和丁香花沉睡的小炸弹中。

埃德加的父亲弄来一条狗，斯坦答应帮忙遛狗却几乎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就像一台买来用作装饰的钢琴一样，那条狗也有点知道自己的存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欢乐，所以它白天黑夜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有一天它不见了，可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消失。

开始父亲只是在隔周的星期六上班，后来每个星期六他都要工作了。他们的公寓开始在灰尘下陷入沉睡。生活变得像一个潮湿的周日下午那样沉寂而规律。在冬天过去、泥土开始变得松软之前，埃德加和父亲之间的沉默之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但是那并不让人难受，潮水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改变。海面下有无可言说的

一些东西在涌动。

在母亲一周年忌日的那天，父亲在埃德加醒来前就离开了公寓。在校车到来之前的一个小时里，埃德加给自己煮了麦片，然后把母亲的毛衣从床垫下拽了出来。他把毛衣折叠好，把背包里的家庭作业和历史课本拿出来，给毛衣腾出了地方。毛衣上的香气几乎要把他逼疯，课间休息时，他在洗手间里找到一个空的小隔间，打开书包，深深呼吸着毛衣上吸附着的那一点点属于她的生命气息。

放学后，就像平常一样，他穿过第五大道，朝着他的长凳走去。在公园的主干道上，一个游客一边摆着姿势画像一边笑得不能自持。他的女朋友也在大笑，他们亲吻了起来。以前，埃德加总觉得让人画像的游客都很愚蠢，不过在母亲死后，他意识到回忆也是需要各种帮助的，那些能帮他回忆的东西有些时候就像钥匙一样。

当埃德加抵达遮蔽着长凳的小树林时，在丁香花的香气裹挟之下他加快了脚步。但他很快又停了下来，因为长凳上坐着一个闭着眼睛的男人。

那是个印度人，头上缠着头巾，穿着一身棕色的西装和布满了雨渍的僵硬雨衣。

印度人的头巾跟他的西装差不多是一个颜色，有很多线头悬挂在头巾上，就像有些台灯灯罩下面挂着的珠串一样。

当埃德加走近的时候，那男人睁开了眼睛瞧着他。

“我很抱歉，”埃德加居高临下地说，“不过你不能坐在这里。”

那人轻轻地扶了扶他的头巾。他的一只眼睛开始滑向眼眶的一边，就像它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一样。

“我不能坐在这里？”他说。

“我不知道还会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埃德加说着，回头看了看他来时的路。

“哦，我还以为这里很受欢迎呢，”那人说，“这里很可爱。”

埃德加感觉到印度人并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愿，就爬上长凳，坐在了他的旁边。

“既然这是个这么秘密的地方，你又是怎么发现它的呢？”印度人把鼻子凑近一朵紫色的丁香花，深深地闻了一下。

“我母亲以前曾经带我来过这里。”埃德加说。

“哦？”那人这回有点惊讶了，“她今天没来这儿吗？”

“她死了。”埃德加说。

印度人大笑起来，跳下了长凳。

“你一定是疯了！”他说，又扶了扶他头上的头巾，“人是不会死的！”他再度笑起来，一点都没有嘲弄之意，而是特别绝对的不可置信。

他那只斜眼又滚到了眼眶的边上，同时听话的那只眼睛则一直

紧紧盯着埃德加。

“你一定是疯了。”他又说了一次，坐回到了长凳上。埃德加向后缩了缩身子，抬头看着树丛中的一小处空隙。那里变得模糊不清，围绕在他身边的植物增多了。

“你不怕我吧？怕吗？”那人问他。

“不，我不怕。”埃德加回答说。他不怕是因为他觉得人生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

“那就好，不要担心我的这只可怕的眼睛。”那人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如果它想看清楚的话它什么都能看得见。”

“但是她死的时候我跟她在一起。”埃德加说。

“别说疯话啦。”印度人这么坚持着，这让埃德加哭了起来。

天忽然暗了下来，一阵柔和的风吹过，摇晃着丁香树粗大的树枝末梢。

“你不觉得你妈妈可能现在就在这里吗？跟我们在一起？”印度人温柔地问，“你的眼泪就这样落到她的小手里。”他说着，跪到埃德加脚边，拿起一片湿润的茶玫瑰叶子在他手里摇动着，“就是这样，感觉到了没？”

埃德加往下看了看，想象着玫瑰花丛的香气，那香气在夏日里会萦绕在整条长凳的周围。他回忆起母亲对小东西的沉迷。

“这只是一朵‘彼得·潘的玫瑰’。”埃德加说。

印度人笑了，那只眼睛又滑开了。“我猜你认为那阵风也只是空气而已，并不是那个爱笑的人的一阵笑声？”

“我真希望我能相信你。”埃德加说。

“真可怕。”印度人摇着头说。

“我没法理解她怎么能离我们而去。”埃德加说。

“我知道，那很可怕。”

“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埃德加问他。

“她只是换了身衣服。”

埃德加想象着把这些话重复给父亲听会怎么样——随之而来的是叹息，然后是父亲安静离开时喀哒的关门声。

“如果你认为她是永远离开了，那你就搞错了，我的朋友。”印度人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橙子，开始用指甲剥橙子皮。

“我自己的妻子，”他嚼着橙子说，“是暮夏一缕氤氲的光，透过薄霭中的树丛，照着一个个被风吹落的、柔软的小拳头似的苹果。你要吃点橙子吗？”

“不用了，谢谢。”

“你应该吃点儿，很难吃上这么甜的橙子，”印度人说，“我敢说你从来没吃到过。”

埃德加在凳子上移动了一下。

“你妈妈会同意的吧？”他从橙子上掰了一瓣递给埃德加。他们

头顶上的云散开了，树林间回荡着鸟鸣。

埃德加和他一起安静地咀嚼着橙子。

“我觉得非常遗憾。”当他们吃完橙子的时候印度人说。

“我父亲把她的衣服全都扔了。”

“那也是很寻常的事。”

“为什么？”埃德加问。

印度人转向埃德加：“他大概也没跟你说过太多，对吧？”

“嗯，他一个劲儿地工作，如果他在我上床之前回家我们就一起吃个饭，然后他看看报纸，我就回自己的房间。”

“我猜你觉得他不爱你，是吗？”

埃德加点点头。

“麻烦大了。”印度人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那是什么意思？”埃德加好奇地问。

“这么说吧，他太爱你们两个了，那让他筋疲力尽。”那人那只斜眼又开始转动，“当有人先下了飞机——或者说，如果你喜欢换个说法的话，有人去了另一个房间——有时候那些留下的人就会试着不再去爱——但这是不对的，因为就算在人生中你只爱过一次，你也已经这么糟糕了，所以干吗不继续爱呢？”

埃德加在心里描摹出他父亲那悲伤而扭曲的样子。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她了。我不知道她是谁，

但是我知道她是存在的，我心里有一把火为她燃烧着。现在她成了天上的星星，我还是一样爱着她，不过我们现在就是用另一种语言交流而已。”

“她也死了吗？”埃德加问。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什么呀？”

“对不起。”

“没事，我不怪你，但是别再冒傻气啦。”

一只鸟儿扎进了树林，找到一根枝条作为休憩之处。

“你得帮帮你父亲。”

埃德加眼前浮现出父亲在办公室里忙碌的样子，眼睛下面挂着深深的黑眼圈。他的冷漠中有一种美。

在母亲生病的初期，埃德加曾经无意中看到父亲跪在浴室排水口的旁边捡拾着母亲的一团团头发。那时他们谁也不相信最坏的结果会发生。埃德加的父亲想挽留住一切，他把母亲的头发藏在一只枕头套里。

“来吧，”印度人说，“坐在这里很愉快，不过，让我们起来走吧。”

埃德加没有动。

“带我去看以前她带你去的那些地方，让我们坐上地铁，唱起她最心爱的歌！”

埃德加想不出来该说什么。母亲曾经告诉他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我知道你有点儿害怕——我刚说的东西有点难以置信，但是继续去爱是有可能的，如果你知道怎么做的话。”

埃德加想到了自己背包里的毛衣。

“你饿了吧，我也是。”印度人说着，摩挲着他的下巴，就好像那个部分是刚出现在他脸上似的，他一边整理着他的头巾一边说，“好吧，我有个好主意。你把你妈妈最喜欢的吃饭的地方告诉我，我呢，就去那个地方好好吃一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自己过来找我。”

埃德加把下东区那边一个中国餐馆的地址给了他，看着他走向了小树林的尽头，然后不见了。

整整一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以前的这天，她闭上了双眼。她的手，那双到最后萎缩得跟埃德加差不多大的手，松开了她心爱的儿子的手。她的灵魂，就像生死两扇门之间一缕婉转流淌的清泉，在那扇门开启的时候升上了未知的天堂。

学校里有个男生跟他说，没有灵魂这回事，人跟机器没什么两样。虽然那个男生并没有什么恶意，他说的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但埃德加还是感觉到有些东西人们没有告诉他，不光是这个男生，每个人都在瞒着他点什么。

埃德加记得，母亲死前不久有一阵忽然精神了一下。有那么几分钟，她的眼睛大大地睁开了，甚至还想坐起来。她环视房间，然后眼光停在了父亲的脸上，他那时正坐在她的床尾，被自己的疑虑冻结在那里一动不动。

周年纪念既美丽又悲伤。雪还没落到地上就马上变成了雨。

埃德加推开了那家中餐馆的门，贴在门上的广告招贴像翅膀一样飘扬着。

他跌坐进那个印度人对面的卡座，印度人的那只松散的眼珠正盯着侍者一路走进厨房。

埃德加坐下的时候，一个中国女人从珠帘后面走了出来。

“埃德加，你好久没有过来了。”

“是啊。”埃德加说，心里暖暖地开始感觉到母亲的存在。

印度人把他的手盖在埃德加的肩上。

埃德加把母亲喜欢的所有的菜式都点了一遍。木须肉，肉末炒饭，酸辣汤，广东脆皮鸭，宫保鸡丁。

他们的卡座对面有一个水族箱，埃德加很好奇那些鱼是不是还记得他。

品尝妈妈喜欢的菜肴对他来说有种奇怪的感觉。脆皮鸭的香味，汤的柔滑厚重，对他来说像是有种魔力。

他好像能看见桌子上她那细长的手指，偶尔那手指会把一勺热

气腾腾的食物舀到他的盘子里。她把自己金红色的头发挽到耳后，每吃一口她都会睁大眼睛。他们谈论着学校的事、营养的重要性，还有在八月纽约变得不可忍受的湿热时，他们该去哪里度假。

桌子对面的陌生人默默地吃着饭，一句话也没有说。

饭后，印度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捧硬币付账，中国女人在吧台上数着那些硬币，发出很大的声响。

埃德加打开了他的幸运饼干，他弄碎了那不怎么新鲜的饼皮，默默念着字条上的话：

“长长的根系会用爱把我们系在一起。”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切尔西区的一家自助洗衣店，坐在正搅拌着的洗衣机旁的橙色塑料椅上。已经很晚了，但是埃德加知道父亲也还没有回家。

“虽然有人帮我们洗衣服，”埃德加说，“妈妈还是喜欢带我到这里来，因为这里很有意思。”

印度人点了点头。几个波兰女人在他们边上折叠着洗好烘干的毛巾。

“以前妈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外婆也曾经带她到这里来，她们老在这里聊天。”

“你跟你妈妈在这里也聊得很开心吗？”印度人问。

“是啊，”埃德加说，“她教我每种不同的云叫什么，还有怎样

预测各种天气。”

这时在外面，大雨从乌云中骤然倾泻。雨来得那么猛，街上的人都像小孩子一样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兴奋地大叫，他们两个也都笑了。

印度人说：“现在我们好像被装在洗衣机里大洗特洗一样。”

埃德加点点头说：“以前我们总是坐在那边。”他指着那几个叠毛巾的女人那边，“妈妈老是在手提包里装着好多糖，然后我们会在自动贩卖机上买苏打水，这样就可以来一个糖果野餐。”回想的时候他止不住地笑起来，“她叫我不要告诉爸爸，可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的手提包从桌子上掉下去了，糖果撒了一地，爸爸惊讶地看着她，我觉得他以前见过的所有的糖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

印度人也笑了起来，然后他用吃饭剩下的硬币从自动贩卖机上给埃德加买了一罐苏打水和一些糖。

埃德加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有几颗糖果从他的嘴里掉了出来，不过那个印度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在乎。

在热烘烘的洗衣房里，埃德加几乎能闻见母亲手腕上的香水味。那台洗衣粉贩卖机上一个个色彩艳丽的洗衣粉盒子，让埃德加想起自己床边架子上的那个欢乐小盒子。母亲给了他两个两毛五的硬币去买那个盒子，当时她说：

“我会永远给你带来欢乐。”

他们离开了洗衣房，朝着第十四街的地铁站走去。当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睡在地铁排风口上时，他们同时停下了脚步。

“他一度也是个小男孩啊。”印度人悲伤地说。

那个流浪汉睡在潮湿的纸板箱上，身上盖着几条破毯子。他稀疏的头发乱蓬蓬的，皮肤脏得看不出底色，他的鞋子有他的脚三倍那么大，而且没有鞋带。

“他现在也还是个小男孩，在等着有人来爱他。”

埃德加把母亲的毛衣从背包里拿了出来。

“你要干什么？”印度人问道。

“用另一个方式去爱我母亲。”埃德加回答。

他把毛衣放在流浪汉的手边，他这样做的时候，流浪汉冰凉肮脏的手指感觉到了毛衣的柔软触感，并伸手来摸索。在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写得很糟糕的标语，上面写着：

“有时我们都需要帮助”。

“你那样做真好。”印度人说。

“其实也不算什么。”埃德加说。

“是不算什么，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一切。”印度人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埃德加问。

“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一阵清凉的风吹过地铁的站台，埃德加努力想去记住印度人曾

经说过的话。这不是风，而是爱笑的人的笑声。

地铁长声呼啸着停下了，埃德加抓住印度人的手跟他一起上了车，坐在一个男孩和他的母亲旁边。那个母亲正剥着开心果的壳，然后把开心果放进一个袋子里。男孩膝头上放着一只篮球，一直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

男孩的母亲正怀着孩子。

“所有的秘密都在那里。”印度人指着她的腹部说。埃德加凝视着那臃肿的身体。有一度他也曾住在那样温暖的地方。

他们到了要去的那一站，离开地铁站时，天已经黑了，有那么一会儿埃德加和印度人都被夜晚的天空镇住了。

“我们离开一个子宫，又住进另一个。”印度人笑着说。

虽然星星们看上去很近，但其实它们是在几千万英里之外。

“星星的光线要经过如此之长的距离才能抵达我们这里，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看见一颗星星的时候，它已经消亡了。”印度人说。

“这么说有些星星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东西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死去，埃德加，”印度人说，“也许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它们是如此的美丽，不管它们是醒着还是睡去了。”

他们走着穿过了公园，天太黑了，虽然身边围绕着树和灌木，但他们完全看不见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彼此的

存在。

当他们接近第五大道时，月亮清冷地升上了树梢，埃德加知道父亲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家了。当他们站在街边的时候，印度人的眼睛看上去更明亮了，那光线照在埃德加的脸上。

他扶了扶头巾，一句话也没说地转过身去，朝着公园走了回去，一次也没有回头。埃德加看着看着，觉得他那忧伤的缓慢步伐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神圣感，看上去他变得有树那么高。他的轮廓变得明亮起来。

埃德加的目光越过了大街，越过了街上的建筑，一直穿过云层看向宇宙深处。

没有任何坚固的物体能让他和无穷分开。

埃德加和父亲之间相隔的那片大海开始渐渐消逝，远远地，那个男人守在火堆旁，等待着他心目中曾经的小男孩来拯救他。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几个小时之前，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了一架飞机，脚上没有穿袜子。明天黎明之前，我就应该在雅典的果树林下漫步了。

上个星期，我收到了住在希腊的萨曼莎写来的一封信。她告诉我她就要和她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结婚了。五年前，我们在一起只度过了几周的时间，但是当你最终遇到那个你在白日梦中曾经想象过其模样的人时，透明的时间变成了头发的颜色，无形的岁月变成了嘴唇的形状。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被分配到固定数量的爱——只有在最初遇见时才够用——初遇时候的一种千金难买的笨拙。而当这份爱离我别往，一切就开始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得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过去，面对我们自己。

因为酗酒，我离开萨曼莎的时候情形有点混乱。

那时候我喝酒喝得那么凶，以至于我皮肤的颜色都变了。我记得最后一次从百叶窗的窗缝里看着萨曼莎蹦蹦跳跳地跑上我公寓大

楼的台阶，她的包在身后飞舞着。我曾认为我会永远跟她一起住在希腊。但有时候，当面对某种神秘莫测的美好事物时，围绕我们的牢笼的铁条就会震颤起来。所以我只好逃开来保护自己，继续当自己的囚徒。

我有种感觉，我在大西洋之上。往下，我能看进黑暗，想象着一个个荒寂无人的小岛星罗棋布的样子。在萨曼莎和我分开的那些年里，我变成了栗色的。一直以来，我被困在下面那些想象出来的小岛中的一座上。直到现在，我终于登上一具用恐惧和解脱的藤蔓扎起来的木筏，漂离了那座荒岛。

收到萨曼莎的信的几天后，我再也睡不着，就起了床。我决定沿着日落大道走一走。那时很安静。黎明扫过街道。我看到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在等公车。她一屁股坐到木头长椅上。她的婚纱包围了她整个人，还越过了长椅，把一张西班牙语的广告给遮盖住了。她的脚悬垂在路阶以上一英寸的地方。

面纱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在颤抖。唇膏看上去已经弄花了。我突然意识到，自从离开萨曼莎，一部分的自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悲伤。这些日子以来，我也不是为了萨曼莎而惊醒啜泣，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这么多年来把我从她身边推开的这种无可救药的冷漠。就像一条船，我在大海的中央抛下了我的锚。我已经选择了安静地腐烂。

一个穿牛仔褲的男人在婚紗女子身邊彎下了腰。他是在垃圾堆里尋找易拉罐。我對他臉上的那種專注印象深刻。他是這條街上非官方的考古學家。我覺得我若要跟他換個位置，那可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

忽然間我意識到這個穿婚紗的女人是我不認識的人，這讓我決定馬上去買下一班到希臘的機票。我回家找出護照，叫了一輛出租車去了機場。

我很想知道薩曼莎現在是不是快樂，還有她和她的青梅竹馬已經拍下了多少張甜蜜的照片。

我回想起她的嗓音。

眼前好像又看見了她父母家的房子，從高處俯瞰著整個城市，白色的石牆矗立在被曬焦的土地上，在蔚藍的天空下有著空曠而涼爽的輪廓。她父親在陽台上下西洋雙陸棋。他的胡須一翹一翹的。電視上正播放著足球賽。

日落大道上，流浪漢在垃圾堆里越翻越深，穿婚紗的女人開始哭泣，我能看到面紗下那张久已熟識的臉。但是我並沒有叫著她的名字衝過去，而只是站在路邊沒有動。

穿著婚紗坐在那里等公車的女人是黛安娜，多年前我們曾住在同一棟公寓大樓里。那時她是一個正在受訓的護士，而我在修讀古代歷史專業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她住在走廊對面，我們有時會一

起喝杯洋甘菊茶，有时她会谈论起医院里各种手术的情形，另外有些时候，我会磕磕巴巴地描述古希腊的历史或者解释古代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有时我们会没有理由地拉着手，或者同时去抚摩她的猫。我那时计划飞去雅典住段时间以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在我搬走的前一晚，我和黛安娜一起吃了一顿告别晚餐。伴着红酒重温往事，我们吃了一顿长长的晚饭，最后我们给了彼此一个承诺。当时我把胳膊肘架在厨房的桌子上，而她的手指在塑胶桌布上滑来滑去，我们达成一致，如果到四十岁我们各自都还没有找到另一半，那我们俩就结婚算了。之后我们就上了床。当时我一直想知道，黛安娜身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洛杉矶是一个噩梦与幻想之地。

飞机上的每个人看上去都睡着了。我周围有几百个梦正在发生。

遇到萨曼莎的时候，已经是我在雅典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我把在雅典的时间分配给了喝酒和为我的论文研究古代方言。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公寓的楼顶；周围是空调发出的唧唧唧唧声，头顶缀满繁星的橙色天空轻柔地铺开。爱情让看上去没有价值的东西都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一双鞋子，一只空了的红酒杯，一只打开的抽屉和大街上的裂缝。

从希腊回国后，我就不再喝酒了。

我不是为了延长生命而停止喝酒，而是因为这种对酒的禁绝可以让我继续去爱她，就好像通过戒酒我证明了我是配得上她的。

我的记忆就像沼泽上散布的小水洼一样杂乱无章——在“当下”的时刻里乱扔了一地。头脑所记住的那些片断，看上去很随机，但我知道不是的。

把萨曼莎留在雅典之后的那些年里，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不只是因为我们弄丢了彼此，而是因为想起我们的亲吻时，我只能感觉到酒精的味道。而她的青梅竹马，将成为她丈夫的那个人，知道她现在尝起来是什么滋味的。这是他的特权。

穿婚纱的女人开始哭泣，在垃圾堆里翻找铝罐的流浪汉站直了身子，把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他们中间放着一个塞满了压瘪的易拉罐的塑料袋。那袋子里至少有两百只罐子。每只都曾经碰触过某个人的嘴唇。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经常很好奇，经过那么多痛苦，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种族生存下来的。答案已经显示出来：与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潜力。

飞机在伯罗奔尼撒山脉上空盘旋，慢慢地朝着雅典国际机场降落了。海水爱抚沁润着大地。旅客们开始骚动，我想象着老妇人们把床单挂出来，切开柠檬。萨曼莎一定仍在睡梦中。

机场外有个香水广告牌。上面是一对年轻美丽的情侣，写着：你觉得她闻起来怎么样？

睡意朦胧中，我幻想着广告牌上的那两人是我和萨曼莎。我没有直接坐上去萨曼莎家的大巴，她家的庭院里一定又开满了鸢尾花，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反方向的比利亚斯港驶去。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水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船主，雇他开船带我去西南方向三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在我们出海途中，他给了我一片“斯帕纳科皮塔”——一种用菠菜和菲特羊奶酪做的派。多年前，萨曼莎也做过这个，那时她的脸颊和额头总是沾满了面粉。

接近那个小岛时，一阵南风吹了过来，于是我问船主可不可以停靠到北边的沙滩上。他看上去有点迷惑不解，但只是耸了耸肩答应了下来。当我要求他等我三个小时的时候，他再度耸耸肩，点起了一支烟。从他的收音机里我听到了一首歌，歌里有 agapi-mou 的字眼，那是“我的爱”的意思。

我慢慢地找着路往岛的最高点爬。我能感觉到后脖颈上的皮肤正被阳光灼伤。我很渴，汗水沿着我的背脊流下去，一路印出盐花。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岛攀爬过，还在鲜花环绕中啜饮过红酒。

我蹚过一片紫色的水仙花和罂粟。一簇簇的仙客来点着头，敦促着我爬上岛的最高点。我曾经告诉过萨曼莎，古希腊人是如何把仙客来归于龟类的，因为它们的块茎很像海龟。她亲吻着我，说：

“世界，在花丛中微笑。”

抵达顶峰的时候，我的脖子和胳膊上的皮肤已经被晒出了水泡。我已经处在这个岛能到达的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鲜花让路给了枯黄的干草，泥土变成了血红的尘土。

我弯曲膝盖趴到地上，下巴嵌进了红色的泥土里。这时，我看到山坡上的鲜花像地毯一样，颜色逐渐浅淡下去。

我闭上眼睛，风——轻轻掠过海洋、剥落了新鲜盐味的风——在野花中间迅速上升，又好像因为收集了花束的重量一样渐渐慢下来。这风最终吹到了我的身上，像冰一样地停在了我的衬衫里，我深深地呼吸着对萨曼莎的回忆。

如果我不去见萨曼莎，现在就搭飞机回家，那么在我的航班抵达洛杉矶之前，她就会已经结完婚；穿着婚纱的黛安娜，应该已经坐上了她等的那班车，而那个流浪汉也已经卖掉了那些易拉罐。

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虽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恐惧。但我感到解脱，我放下了所有的负担，我正在攀登。

黑暗中的绽放

自从亲眼目睹了几个月前发生在火车站的一起暴力事件后，萨朋内再也没有画过素描。他不再去画那些在博物馆屋檐下聚集的鸽子，也不再拖着脚步走去博物馆旁边，那是他以前最喜欢坐着观看过往人群的地方，比起画画，他其实更喜欢这样坐在那里看着一切。几个月来，萨朋内一直忍受着他目睹的那起暴力事件带来的厌恶感，因为焦虑而几乎不能呼吸，就好像他才是那起几乎回忆不起来的可怕罪行的制造者一样。

萨朋内总能在小事上发现真正的快乐。母亲过世前，他一直跟着母亲住在巴黎一个低调而不招摇的郊区。失去母亲之后，萨朋内认为离开旧居、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最好的选择。从那以后，他就退回到了一种无始无终的、成年人的阴暗存在里。

这些年来，他的素描手艺变得相当娴熟。随着年岁增长，萨朋内意识到他就像他的素描一样——活着，但是同时并不存在。这是有可能的。

萨朋内在母亲死后搬去了一个小公寓，俯瞰着一个小小的喷泉。泉水从一个儿童雕像的嘴里冒着泡泡涌出来。萨朋内的夜晚很宁静，能打破这宁静的，只有冬天里炉火的哔剥爆裂声和他的手指翻动书页的声音。然而，在他母亲死后不久，一种狂野而不受控制的渴望在他心里滋生起来。

他希望他能偶然地——也许是在他长长的漫步途中——遇上——一位和他有着相同境遇的年轻女士，他和她可以一起度过周日的下午，或者下班后在喧闹的多赫提·白兰歇大街上一起分享一顿丰盛的冷盘晚餐。

但是这种与某个年轻女士邂逅的渴望——总是伴随着一种同样强烈的、不协调的感情，把他拽到大街上的咖啡馆的渴望——给他阴暗的存在带来了宽解，又逐渐地消解于平庸，就像某种珍稀的鸟类渐渐杂处混迹于普通鸟群一样。

他的生活又回复到正常的节奏中，直到差不多十年后的这一天，作为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个普通职员，他亲眼见证了一件发生在那里的暴力事件。这种渴望的感觉突然又回来了，很快，萨朋内的眼睛就为那个他在上班路上看见的站在商店橱窗里的女孩燃烧起来。她长得非常漂亮，萨朋内觉得自己肯定曾经在清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见到过她很多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过她。

除了对这个女孩突如其来的激情，萨朋内还发现自己开始做起一些奇怪的事，比如对鸟儿说话，比如无论何时经过花园的雕像都会摘下自己的帽子。

一天又一天，他在脑海里保存着这个女孩的模样，就像小心翼翼捧着易碎的鸡蛋般带着这幻想到处行走，只有回到家逃避进孕育幻想的睡眠中，他才能解脱自己。

但是，萨朋内并没有保持始终如一的小心翼翼，他开始陷入白日梦中。自从母亲死后，他的白日梦开始有了声音，萨朋内得出结论，那只是堕落颓废的潜意识在脑子里的对话重放而已。

有些白日梦好像想要在白天就把他淹没。在白天它们像野马一样跟随着他，在他梦里生活的平原上漫步徘徊，它们总是跟着他，直到他几乎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为止。

在衣柜上层的抽屉里，萨朋内收藏着他认为自己画得还不错的素描。他一共保留了两张画，一张画的是一扇有着复杂锈蚀的铰链门，另一张画的是他曾亲眼看见的一只从排水沟里盯着大街的猫。

每个星期五，橱窗里的女孩都会换上一套新的衣服和一种新的站姿。

火车站的小售票亭里，萨朋内仍然经常会在短暂休息的时候做着白日梦。

“先生！”只有在旅客大叫的时候，萨朋内才会突然意识到，这

只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并不是埃及国王，也没有被错误地卖作奴隶。

橱窗里的女孩完全占据了萨朋内的意识，但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她是木头做的，她没有一颗人类的心。但是，在一段距离之外，她很容易会被错认为是个真人。从她用玻璃眼珠凝视街道的那副样子，萨朋内断定她就是女孩，因为他相信只有女孩才会有这种渴望的凝视眼神，女孩都有自己的秘密。

每天，萨朋内都在火车站卖票，然后回家，小小的公寓房对两个人来说空间就不够了，但是萨朋内想，如果她能跟他一起回家的话，他肯定能给她找个坐的地方的（如果她愿意坐下来的话）。

萨朋内的脸上长着一个苍白的鼻子，两旁是黑漆漆的充满孩子气的眼睛。他是那种会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杖去戳戳路旁某样东西的人。

在开始注意到那个橱窗里的女孩之前，萨朋内见证了火车站里的一起暴力事件。他整夜都为这事做梦，然后再筋疲力尽地醒来。

那天，一整个上午，萨朋内都昏昏欲睡，以至于他几乎无法透过售票亭冰凉的玻璃窗看清楚外面的时间表，那上面有一些因为糟糕的天气预报而做出的细微调整。带着一种梦境般的唐突感，累坏

了的萨朋内开始画起素描来，为一个买完票就一直安静地坐在售票亭不远处的女人画画。

笔在纸上滑动着，萨朋内用最细微的线条描绘着她。很快，线条开始像一个人，再添上几笔之后越来越像他面前的那个女人，就好像他使了个什么花招把她的灵魂给弄进去了一样。他很欣赏这次自己的作品，在把它扔进废纸篓之前，将它细心折叠了好几次，仿佛那是一张包过无味面包的油纸一样。

阳光从车站的玻璃屋顶洒下来包裹住她，萨朋内微笑起来，可他的嘴角却连一点微笑的痕迹也找不到。

十二点还差几分的时候，一个穿着体面的矮小男人走近了那个女人，他并没有坐下来。他们开始聊天，萨朋内很想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那女人的老熟人，他在跟她说着什么能填补他们从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的空白的故事呢？

可就像这个男人的出现一样突然，亭子外一阵响声令萨朋内瞬间从他的梦中惊醒，那矮小的男人握紧了拳头，就这么笔直地打在了那女人的鼻子上。男人把领带弄弄直，看上去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周围的人都因为突然发生的一切站了起来，所以他只好安静而迅速地离开了。那女人一声也没吭，只是挣扎着想用一条蕾丝手帕止住流出的鼻血，手帕很快就被染成了深红色。人们都瞪着她看，一个老头还叫来了警察。

萨朋内开始发抖。他想离开售票亭，可如果他离开，预先设定好的门锁就会让他无法再回到亭子里。如果他叫她过来让她躲进售票亭，就会有被人看见而被解雇的危险——萨朋内还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被解雇过，也从来没有怒冲冲地说过话甚至提高过他的嗓音。

血止住了，她的眼睛因为哭泣而肿胀，鼻子已经变成了李子色。

离一点还差十五分，她站起身来离开了火车站，手帕依然压在脸上。萨朋内竭尽全力想在女人转过街角消失不见前抓住对她的最后印象。从她带着的行李来看，她只是个普通女人。萨朋内甚至有些怀疑她是否识字。

顾不上回答一个带着助听器的老太太关于她是否能离开巴黎一个月又在同样的钟点回来的问题，萨朋内在他桌子底下的废纸篓里翻找并捡出了那个女人的素描。不带有任何的情绪波动，他把那张纸滑进了自己的口袋，就好像那是一个他牵涉在内却一点都不记得的罪行的证据一样。

他向老太太解释，她可以搭乘一点五十二分从巴黎出发的那班火车，但是不可能在一个月后以同样的钟点回到巴黎。

“不可能！”老太太冲着排在她后面的长队大声重复着，就好像她也一直是那么怀疑的一样。

暴力事件发生后的两周以来，橱窗里的女孩在萨朋内大多数的白日梦里都有一个位置，关于那件事的记忆有点像一场梦——但它比梦更沉重，并且以某种方式固着在萨朋内的身上。之后，萨朋内常常以为自己在火车站又看见了那个挨打的女人。也许，因为他画过她，所以他们的影子就被联结到了一起——就像两个中间没有白天的黑夜一样。

路过多赫提·白兰歇大街上的橱窗女孩成了萨朋内所盼望的事——甚至是比画鸽子和在喷泉旁边吃晚饭都更加令他盼望——这时，他开始有点害怕了，于是萨朋内找了另一条由街心花园到火车站的路。他并不想完全失去自我。没有了她每天早晚透过玻璃对他的凝视，他就能有点时间来决定自己该干点什么。可是，萨朋内又开始在夜里时不时地醒来，开始想她，就像公园里某些只在黑暗中绽放的花。

萨朋内只有一个朋友，那人就住在他楼下的公寓。他的名字叫安叟，他的块头太大了，几乎不能从自己公寓那已经加大两倍的门里穿过。萨朋内从来没见过安叟冒险接近过那个喷泉。安叟常在夜里辛酸地啜泣，仿佛他巨大的腰围里藏着一个羞耻的旋涡。

萨朋内和安叟每年都互赠圣诞卡，也经常给对方留下一张提醒

注意天气变化的条子。

安叟总是穿着宽松而闪亮的睡衣和天鹅绒的拖鞋，拖鞋上都绣着一个金色的“安”字。对于他们的友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萨朋内能给他带回一些没卖掉或者用过的火车票，安叟喜欢把这些票整齐地排列在一本布面的精装册子里。

安叟很用心地记住了火车时刻表，那让萨朋内觉得，如果安叟能离开公寓的话，一定会是一个比他强得多的售票员。

潮湿的周日午后，在吃完了一顿冷餐肉和啤酒的午餐后，安叟抽起了雪茄，开始仔细琢磨起萨朋内对商店里那个女孩不能释怀的窘境。最后，伴随着打在窗户上千只眼睛般的雨滴的声音，安叟感性地说：“你得走进那商店，萨朋内，你可以有礼貌地去问问这事。”

走进那家商店的念头让萨朋内的内心立刻充满了巨大的恐惧，以至于和安叟吃完午饭后，他马上就回房上床逃到了梦境中去，就像一片从枝头飘落的叶子掉进缓缓流淌的河一样。

清晨他在很早的时候醒来，虽然外面的天还很黑，可房间却被街上和冒着烟的屋顶积满的雪花给照亮了。

萨朋内披上睡袍，蹒跚地走近窗户。

窗下的庭院和喷泉都还在沉睡中，萨朋内想象着带她回到自己公寓的情形。他想象着带着她穿过覆盖着巴黎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

雪，来到公寓前她看见喷泉时脸上的神情。

这天早晨，这座灰色的城市完全被大雪覆盖了。当萨朋内走近商店的大门，把一路走来积在脚上的雪踢掉时，门铃大声地响了起来。

店里有一排排的礼服。装饰着羽毛、挂在墙上的帽子就像是许许多多奇异的鸟。店铺里寂静无声。

萨朋内想走到橱窗那儿去找那个女孩，这时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挂着一排皮草的货架那里。

一个小小的战栗着的生物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萨朋内不太确定这是个女人还是个画出来的洋娃娃，眼前的女人涂着血红的嘴唇，皮肤极为苍白。

“是的，”这女人说，就像她在回答一个问题，她举起手杖指着萨朋内，“你以前来看过皮草，对吗？”

店铺的后面飘来煮咖啡的香味。

“那么，好，”她说，“看上什么喜欢的东西了吗？”

她嘴唇嚅动的时候，一大团厚厚的化妆品糊糊也在动着。

“每天早晨上班的路上，我都注意到橱窗里有个女孩，女士。”

萨朋内回答。

“我敢打赌你注意到了，”她大声说，“你可不是第一个进来礼

貌地问起这事的小伙子。”她大口喘着气，“她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人了，啊？”

一片死寂中，萨朋内颤抖的嘴唇仿佛泄露了他是多么寂寞的这个秘密，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这个秘密。萨朋内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谁？那个女孩？”他用变了调的嗓音说。

他们一起转向橱窗，看着雪无声地落到地上。

“怎么办啊？”那女人评论道，“每年这时候都没法去公园了，一团糟。”

“您知道有些花会在黑暗中绽放吗？”萨朋内问道。

“可谁会晚上去公园啊？”她不耐烦地说。

萨朋内感觉到怒气在他全身扩散，但他还是平静地说：“我没指望谁会去。”

从商店走出来时，一个脚步不稳，萨朋内把头磕在了橱窗的边角上。一些血滴洒在了雪地上。萨朋内惊惧地弯下腰，他的血就在自己面前。这血曾在他的身体里存在了将近四十年，在他身体里流淌，给他的白日梦提供着动力。他渴望的那个物体在几步台阶上的橱窗里冷酷地凝视着他。越来越多的血滴流到雪地上，萨朋内无力地跪倒在地，手指摸到了自己头上那深长的伤口。他的额头由疼痛

转为麻木，每走几步萨朋内都会回头看看雪地上那些鲜红的血滴，就像看着他灵魂的眼睛。

十三年来萨朋内第一次迟到了，当他来到售票亭时，票务部的头头从眼镜上方审视地看着他。萨朋内感觉到一道血线正温暖地流过面颊。

“亲爱的小伙子，你流血了。”

夜里，火车站差不多已经空了，快吃晚餐的时候一个男人走到了萨朋内的售票窗口前，说想买一张去“随便哪儿”的票。

“您到底要去哪里呢？”萨朋内问。

“我也不知道。”那男人安静漠然地说。

那晚，萨朋内在床上思索着这个男人的话。

差不多快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萨朋内坐起身，走向窗户。月亮皎洁而明亮，但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穿好衣服出门，走向了街心花园。

月光下，雕像们的眼睛像在移动并闪闪发亮。萨朋内不确信自己是否醒着，但是他很好奇自己以前为什么从来没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漫游过，还有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无所适从后他忽然好像找到了

自己的家——也许他也是巴黎梦境中的一个角色吧。

公园里大多数的植物都在负担着积雪的小小分量。萨朋内知道现在是冬天，他不会看到任何正在开花的植物，他意识到他之前弄错了，那些花朵并不是在黑暗中绽放，而是在月光下盛开。

他挖了一点未经破坏的积雪，咀嚼着它。然后他笑了起来。他会爱上一个塑料模特儿是多么愚蠢啊。真蠢，他想，但是考虑到他的境遇，又是可以理解的。

路变宽了，萨朋内注意到有人坐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他停下了脚步。

然后他认出了她是谁，回想起她那条被血浸透的手帕和她穿过火车站走向月台时身后一连串的血点——那是她的灵魂的眼睛。

她的出现让萨朋内相信自己一定是在做梦，因为她看上去如此的惨白。他走近时，她大睁着的眼睛并没有因他而转动。

他伸手去够她，她还是没有动。他用手指轻碰她的脸，包括她惨白而不带任何生气的鼻子，她已经完全冻僵了。落在她头发上的片片雪花几乎完好无损。

他跪倒在雪地上她的脚边，回忆起他自己的血滴在商店门外的情形。

他支撑着起来，坐到长椅上。他用胳膊搂着她，把她移向自己。他使劲抱紧她，直到感觉到她衣服下面的骨头。然后他平静下

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在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找到了给她画的那张素描，打开它，随即又再度搂住她，希冀着他遇见过的每个人都能以某种方式看见他现在的样子。

在他们被运走之前，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遥远的船

这些日子我常常想起里奥，这晚当我给一辆要去伦敦的货车分类打包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仓库里很冷，我们呼出的水汽像胡子一样绕在嘴边。办公室上周发来了一箱手套，但我喜欢用我老硬皴裂的手抱着纸板箱的感觉。我已经为皇家邮政工作了快三十年。二十年前我开始不再说话的时候，曾以为他们会让我走，但他们对我很好，十年后我就能退休了，那时我会得到一笔国家养老金，和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我挺喜欢我的工作，除了去海滩漫步，它是我离开房子的唯一原因。

每个包裹都有它要去的地方，而它们的内容是个谜。偶尔我会发现一两个盒子的地址是小孩写的。我喜欢把这些盒子放到一边，在我当的班结束之前先不发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笔迹，把它们跟里奥的笔迹做个比较。小孩子的笔迹让文字变成了使人疼痛和扭曲的媒介。自从失去了里奥，这些包裹对我来说都成了玻璃的碎片。

仓库被分成好几个区域。这里没有窗户，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是在奥斯陆、孟买或者鹿特丹。外面，湿淋淋的威尔士山坡向一个方向延展开去，像苔藓毯子下躲着的古老巨人。在另一个方向，陆地好像惊醒一般戛然而止。陆地停止的地方别的东西又开始了，大海一直向北方延伸着，直到开始封冻的地方为止，它像孩子抱着母亲那样依附着陆地。

泥迹斑斑的小型货车从乡村一路开进山谷。包裹会在最近的城市分好类，由这些货车运来卸货。每两天，笨重的拖船会从这个仓库轧轧地开向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和彭赞斯。

每个清晨当我在黑暗中走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象着拖船的头灯射进夜的深处的画面。我爱那些包裹上的城镇的名字，就像我爱那些在我家大门口分叉的地方盲目长出地表的不同种类的野草一样。

几百年前，这个村子的人只靠打渔为生。在我的起居室里有一本图画书，其中一幅画上画着穿围裙的年轻女子们站在悬崖上，看着一艘船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画的前景，一道阳光照射在海水的表面。我没法告诉你这画是谁画的，但是我能理解那道长长的光柱的含义是什么，我能理解那种令画出这些细节成为必须的悲痛。现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极少数人还在打渔。

尽管货仓运输比渔业提供的收入更稳定，可村里的所有男孩还

是做梦都想着出海。他们大开着窗户，梦见自己的祖先坐在那种现在只能在瓶子上看见的船上。

有时我会沿着村子下面那怪石嶙峋的海滩走上一段。墨绿色的海水打上岸，我随着巨浪抽打岩石的咆哮声大声地叫着。我花几个小时盯着看石头缝隙间小水洼里的鱼和螃蟹。我很好奇它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切断了后路。我喜欢坐在冰凉的石头上，直到潮水没过我的鞋子，袜子吸满了水，就像某种歇斯底里地拉着我的脚趾的生物。

清晨来临，我结束当班，把自己卸货的卡车数量记录下来。三十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弄错过，因为对我来说，每辆车都像一个人一样。就像小男孩一样，我认为车子都是有面孔的。

我打好表，在休息室里找到我的外套。桌子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无上装美女的日历挂在一个更衣柜的外面。那些女人看上去都很冷。她们的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照片也许能假装出欢乐，但是却从不能装出悲痛来。

仓库距离村子有半个小时的脚程，首先得穿过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然后要穿过一堵厚厚的灌木篱墙，路过的时候有很多鸟儿会从它们筑在篱墙上的窝里向外瞧，最后再爬上山坡就能到村子了。夏日里，野生的莓果便会取代鸟儿们的黑眼睛点缀在那里。

再过几个小时，黎明就会淹没整个世界。我停下了脚步，靠在

一根路灯的柱子上。我的左腿总是很痛，在冬天情况会更糟。圣诞节这会儿一切都很糟。

路灯的光线照在我的手上，把它们变成了彩色玻璃那样的颜色。村子里的教堂就有一扇壮丽的彩色玻璃窗。有时我会跪在那窗下，沉浸在那颜色中。当腿上的疼痛变成了模糊的抽动感，我便继续走了起来。一路上靴子底的小石子刮擦着混凝土地面。我想念秋天——当夏天承受着对自己必将逝去的宿命的回忆。之后是冬天。然后便是这奇迹的季节，一切又会无畏地新生。

回家的路总是走得很慢，一排排石板瓦的房子闪烁着灯光。它们黑色的前额被明天的呼吸弄白了。窗帘从里面拉上，挡住了外人的眼睛。

一只鸟儿在路灯杆下单脚跳跃着，嘴里衔着条圆胖的虫子。我走近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我走过了街角的小酒馆。即使违反法律的规定，村里的酒馆还老是开着，那少数几个坚持下来的渔夫会在黎明前的一小时左右回到这里，带着一种漂浮在不能饮用的水上而生的干渴。光线和欢笑声一起泼溅到街上。我闻到了啤酒的味道，自动点唱机模糊的撞击声让我想到了我的腿，而那让我又想起了里奥。

雾气笼罩了整个村子，白色的胳膊在街道上伸展开。狗儿们在厨房的后门叫了起来。

我以前总会进酒馆去喝一两个品脱。可现在我已经六年没进去过了。这些酒精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

二十年前，杰妮把里奥的东西都带去了美国，我感觉到一种释放。房子是如此宁静，出于某种理由我开始想起我的母亲，她在六十八岁那年死去。那是我和杰妮结婚的同一年。我母亲在冰上滑倒，摔断了髌骨，然后没有任何预警地就在医院里死去，就像一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读完的书的结局。

上个周日我一直在看渔船轧轧地开回码头，船体被一网网银色的鱼覆盖着，变厚了。

二十年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不过曾经有段时间我是个无法闭嘴的人。没有语言的痛苦，我过了如此之久。我的人生就是一封没有投递地址的信。

如果你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观察我，你会注意到我的手一直在动。它们总是在碰触彼此，就像盲眼的兄弟姐妹那样。

我喜欢观察那些渔船。每条船的抵达都会被鸟儿们的哄散所庆祝。远远看过去，海鸥就像浪花上漂流的眼睛一样。上个星期，年轻船长中的一个问我是不是需要工作。我摇了摇头。他是个挺帅的小伙子，里奥如果活着的话应该就是他那般年纪。我想知道是谁继承了里奥留下的生命。

我住在我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父母的房间还是原来的那间。其实那只是间客房，但我们唯一的客人就只有梦中那些在门前车道上飘浮的幽灵而已。

村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已经太老了，老得不会再觉得我的悲哀是与众不同的。

杰妮跟我是一样的年纪，但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村子里，伴随着潮湿的鞋子和周日的赞美诗，我在我爱的某个人死去的时候老去了。然后整个周日的时光就被用来观看光线的移动，它从又小又热的房间里穿过花园，闻上去像有人在熨烫衣物一样。

杰妮生活在洛杉矶。我们还是两口子，虽然自从里奥的事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人们在洛杉矶拍过很多电影，也许她的人生就是一支漫长的幻想曲。

有时我会在山脚下的小学外徘徊。每年的这个时候，圣诞节的装饰都已经挂在了窗户上。学校的另一边是满布着星星点点羊群的山脉，还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拖拉机的零星灯光。我有时会计算好自己的步行时间，在学校打三点的铃声时抵达那里。这时，孩子们像热水一样涌到操场，冲进他们父母的怀抱。我愿意用任何东西——甚至是我的回忆，特别是我的回忆——去交换把里奥拥进怀里的那一瞬间。他不在我怀里，那缺失的重量，是整个世界的重量。

那起意外发生后我很快就不再说话，希望那样就能让我在回忆

里留住里奥柔软的、咬着舌头说话的声音。有时候我用手捧着里奥的某个字眼，手抖得就像一只颤抖的鸟儿。意外发生之后，医生说我只几个月可活了。杰妮回到了美国，而我在自己的家里等着那死亡的旅程。那感觉就像你要打包一个箱子，但却不知道该往里面放些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再也不去看医生。他们只相信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他们就像牧师一样——被某种宗教的神性弄得盲目了。

如果杰妮能看到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的没有希望和暗淡凄凉，她会很震惊的，现在除了汽车被允许开到市场上来，还有一条卡车可以通行的公路通到山上，这村子没有任何变化。当我认为我在那个事故之后不久也将死去的时候，我开始写一本书，然后再也没有停下来过。它的名字叫作：《梦想是童年丢失的城市》。

二十年来我并不是每天都写。在我死去之前我是不会完成它的。我在写的这本书是终结其他所有书的那一本。我的死将会是结局的那一章。我也画了书里所有的插图。这本书是关于我和里奥还有杰妮在一起的生活的。我没办法把我自己画出来，所以我在画上用个“X”代表我自己。有时当我阅读之前写的章节时，我会突然置身于旧日时光之中——就像置身于有人用你的人生搭建的剧院布景里。回忆就像由演员来扮演的人生。

杰妮总在阳光中醒来。她总是喝着橙汁。就算在一年中的这

那个时候，洛杉矶依然很温暖。在美国，有些人是在沙滩上过圣诞节的。在澳洲也是。而我总是在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中醒来，那声音就像一百个威尔士母亲的唠叨。每个雨点都是微小锈迹的一个记号。

杰妮是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气候的。在班戈^①有一个大学。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观测云朵。我还记得她对那一大团白色的、缓慢地打着旋儿扩大的东西是多么的吃惊。我给了她一纸杯的鸟蛤。以前你可以从运货马车上买到这些东西，但那些鸟蛤都已经死了很久了。这里是以前的人们相遇和谈论战争的地方。杰妮的口音非常柔滑和浓郁。我以前总希望我的祖先也去了美国。也许那样的话一切就都不一样了。也许我们会在剧院相遇，在车辆入口处。也许里奥和我就可以一起组装出一部老破车——就是那种人们会在车库里鼓捣出来的车。

二十年前，我开着车冲下了悬崖。我只是想转向里奥冲他做鬼脸，好让他高兴地笑起来而已。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里奥的尸体在汽车残骸的半英里外被找到。他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只是他的内脏都碎了。我愿意认为他是从车里被那些弥尔顿和布莱克书里写着的、我一直相信存在的天使给接走了。他们是在

① 威尔士班戈大学（Bangor），威尔士国立大学三个分院之一。

同样也照耀着我们的村子的月亮下写下那些书的。月亮，看见了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告诉我，我是那起意外的幸存者。

现在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的黑暗很少被人记得。大多数人正要醒来。我站在自家大门外的一边，那并不真的是一道大门，而是通向悲哀的另一条道路。天开始下起蒙蒙的细雨。雾气消散开，缓缓地升上黑暗的山头。火点起来了。威尔士的早晨是充满了煎鸡蛋和木头生火的烟味的。孩子们在温暖的床上打着滚。他们很快会从梦的怀抱中挣开。所有的怀抱都是上帝的使者。这里现在还是夜晚，但在别的地方已经是白天，日夜的交替轮回以某种方式一直在继续，继续，不管我们是否置身其中。

突然之间天空充满了雨，雨点有拇指那么大。很快就是圣诞节了。学校里的孩子们在排演一出戏，他们还自己做了戏服。夜是悬挂着的破旧的面纱。现在是满月，但是有时它也会有盈缺。里奥的脸在每一面镜子里等待着我。梦是我们的灵魂未完成的羽翼。

最好的礼物

地铁公园那站的上面，地面交通陷于停滞。一个穿着紧身衣的胖女人用推车推着一对双胞胎，双胞胎的眼睛随着地铁列车移动着。那列车叹息着滑进了车站。

加布里尔看着双胞胎，看着他们被推来的这一路。他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表，拖着脚步走进了糕饼店后的一条小路。他的包裹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一扇钢制的门打开，把漆成白色的字也分开了。两只颤抖的手出现了，抓着一个用细绳扎着的盒子，其中一只手上有一个鸟的文身。加布里尔把他的手分别放到了盒子的顶部和底部，另外那两只手在感觉到重量已经转移到加布里尔手上时才松开，消失在钢门之后。加布里尔拍了两次手，并向四处张望。

当加布里尔穿过小路往地铁站走的时候，他在一辆躺倒在路边的摩托车旁暂停了一会儿。他被打开手中盒子、迅速偷窥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的念头诱惑着。

两个等地铁的人打量着加布里尔。他们的裤子很宽松，让加布里尔想起了船帆。他们眼神表明他们想知道加布里尔拿着的是什么，为什么他如此小心翼翼地拿着它。他们看着他球鞋上的洞。他们看着他脸上的疤。他曾经遇上一场火灾。那场火灾里死了好几个人。疤痕横过他的脸颊，消失在他的耳朵下方。人们会注意到那疤痕是因为跟他脸上的其他部分比起来，它是一种更浅的棕色。他的嘴唇总是张着，这个习惯让他看上去心不在焉，他的妻子却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当他凝视着正在开来的列车车灯照出来的轨道时，他琢磨着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又想起了母亲。列车卷起了一股冷风，让站台上那两个人一下子忘了加布里尔。

银色的门滑动开。报站系统吐出模糊不清的信息。车厢里站满了球鞋上沾着油漆的小个子墨西哥人。他们挤作一团，但是互相并不交谈。他们中的一个人正在读一本破破烂烂的儿童书籍，想借此提高他的英语水平。加布里尔注意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只有七八岁大。他们的祖父——卷曲的胡子从他脸颊的两边垂下来——张着嘴睡着了。那男孩被这情形迷住了。那个读儿童书的墨西哥人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那个女孩靠在他身上，不出声地念着那些他正在琢磨的词。

列车穿过了一条不明显的边界，进入了布鲁克林区。加布里尔

观察着其他的旅客，不过只有一个穿黑衣的老妇人在看着他。当他盯着她看时，她的眼神落到了那个盒子上，然后转过了身子冲着车门的玻璃站着。加布里尔的母亲有次曾经告诉他，如果你一直认为有谁死了，你就会召唤他们。

当列车冲进光亮中并慢了下来，加布里尔可以看见谁可能会进入他所在的车厢了。他看到了一个便衣警察，那便衣警察在站台上没移动，很快就消失在西装男人和长大衣长头发女人所组成的人潮后。加布里尔把盒子移到大腿上，用腿的力量支撑它。当他把外套的下摆拉过来盖住盒子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看上去有多脏，他的球鞋上有个洞，而且他的外套被他在各处染上了黑色的污渍。他看着那些刚上车的旅客是多么干净，然后想起了星期天晚上刚烫好的衬衫的那种好闻的味道。自从他的婚礼之后，他再也没穿过那样的衬衫。那时他的母亲还活着，还把纸做的蝴蝶放在他的新娘的发间。

加布里尔周围的人们站得很不舒服。他藏着某样东西，他们都知道。他想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来，但是这个盒子必须被完好无损地运送到。他咳嗽起来，周围的人都把头埋到领子里。他的妻子想让他去看医生，但那是要花钱的，他告诉她。

一个穿着粉色雨衣、留着短短黑发的女人对着自己笑起来。这女人让加布里尔想起他那住在哈瓦那郊区的姐姐，她总是因为她爱的人是个酒鬼而感到很绝望。

一些游客盯着加布里尔。他知道他们不属于这个城市，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抓着地图，女人们的发型既不时髦也不凌乱。他们就像旁边的墨西哥人一样挤作一团，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男人们冷漠地盯着地板和加布里尔衣服下的凸起。

车厢一直很满，因为每当有人下车，其他的人就会填补进来。加布里尔想知道每天会有多少人会坐上同一个座位，如果那座位能记录下每个占领者的思想，那它对人类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又停了一次车，一个年轻的盲人在一个漂白了头发的女孩帮助下上了车。她轻轻地托着他的肘部。一个穿西装的人马上站了起来，年轻的盲人坐了下去，对每一个善意的行为感激地点着头。每个人都看着盲人，因为他不能回以同样的眼光。他知道人们在看他，便坐得一动不动，只是稍微调整了下他的白色手杖，好让它靠住他的大腿。

加布里尔闭上了眼睛，想象着成为盲人是什么感觉。黑暗中他感觉到盒子的分量并紧紧地抓住它，确保它依然只是他外套下的一个突起。当他睁开眼睛，列车停了，盲人已经不见。车门开着，这是他该下车的站台。加布里尔穿过正在上车的人群冲下车，又摸了摸衣服下盒子所在的位置，然后走向站台一端的楼梯。

斜靠着楼梯的钢梁，加布里尔向下凝视着铁轨。就在上个星期，有人跳了下去。

一个中国女人在吹竹笛。天气很冷，但是她光着脚。她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粉色的围巾。加布里尔听着每个音节，这是一首节奏很慢的曲子，不知道为什么加布里尔觉得这曲子跟粉色的围巾有某种关联。她并没有摆出一个盒子或者帽子来要钱，他就在她的脚边放了一枚两毛五的硬币。

加布里尔上了另一列地铁空空的车厢，坐在一个眼部激光手术的广告招贴下。他很小心地把盒子举到鼻子边闻了闻。从闻到的味道，他尝试着想象出里面可能有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的妻子会怎么想。

加布里尔站了起来，往对面另一列车里看了看，他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脑袋沉重地倒向一边。她抓着一只鞋子无助地哭泣着，加布里尔没法分辨出她有什么特征，因为车门上的玻璃都被涂鸦写满了。

加布里尔想起了住在哈瓦那的姐姐的照片，那是她来看他的时候在康尼岛上拍的，照片上她用胳膊环绕着加布里尔的妻子。那是加布里尔最心爱的一张照片，因为那是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梦想的生活的样子。

他记得他们是如何一边欢笑，一边吃着热狗，番茄酱顺着热狗的面包淌下来。

加布里尔下了车，在走到地面上之前，他等待着地铁列车消失

在黑暗中，把站台和铁轨划分开的黄色狭长地带，有一些被打破的玻璃瓶。加布里尔费了更大的劲来掩藏住他的盒子。

走在冰冷的街上，他的脚步回响着。他经过一个加油站，看到两个胖子一边在看电视里的足球赛，一边还抽着烟。走得更远时，他经过了一个对着付费电话大喊大叫的男人，他注意到那个听筒都没有跟电话机连在一起。

这里的房子都有白色的栅栏，用来把玻璃窗和街道分隔开，但是透过栅栏加布里尔能看见屋里的人在吃东西，看电视，或者吵架。在一个公寓里，一个男孩独自坐着，吃着一只橙子。

加布里尔走上了一条街，那里以前是一排破败的房子。不过它们现在被人买下了，很快会被拆掉。他走到了一栋老旧的工厂建筑前，用颤抖的手指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把它塞进一扇厚厚的钢门里。他跨过了一个空的手提箱，开始往上面一层攀爬。

他的手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他开始担心会弄坏盒子里的东西。他让自己消除疑虑，盒子很快会离开他的手。抵达这建筑的顶部后，他从一扇没有玻璃的窗子向外凝视着曼哈顿，帝王车站的建筑被浓雾掩盖着。也许有一天它也会被陈列展览出来，就像古代的方尖碑那样。窗户下面有个女人尖叫了一声。

加布里尔在门上敲了好几下，然后把钥匙插进锁眼中。他推开了门，轻轻地掩门后进去。房间的一角有台画面黯淡的电视。凹陷

的沙发旁有一张床，上面堆满了破烂的玩具。

沙发上睡着一个刚满三岁的男孩。加布里尔跪倒在他的前面，他的妻子从一个帘子后出现了。

“裘斯把这个从后门偷了出来，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的妻子问道。加布里尔点了点头。

电视发出的光芒在男孩的脸上闪烁着，加布里尔摸了摸他的膝盖，然后颤抖着解开了盒子上的绳子。当男孩揉着眼睛坐起来时，加布里尔向他献上盒子，打开了盖子。

“惊喜！”加布里尔和他妻子一起叫道。

男孩盯着蛋糕看着，上面用熟练的手法写着“3”，蛋糕上厚厚的糖霜让它看上去像个皇冠，中间是丰厚的奶油。男孩没有去碰蛋糕，而是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从他小小的手指后面窥视着它。

雪落下又消失

我的妻子是个聋子。她曾经问过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声音，我骗她说是的。到今天我们结婚已经十二年了，而我决定要离开她。

她现在正在街角的面包房里，那里很暖和，人们也都认识她。她会在一小时后回到我们的公寓，带着满满一盒子为今天这个纪念日特别定制的小蛋糕。她会回到家，把她的钥匙扔进那个陶质的烟灰缸。她会把蛋糕放进她存放了许多罐头食品的冰箱。她会诅咒我的迟到。几个小时之后如果我还是没有回家，她会变得更聋。

沙发上有一处很小的撕裂，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过，一片羽毛像舌头一样伸了出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裂口，但它毁了整个沙发，使整个公寓陷于一片混乱。烟灰缸空空如也，诱惑着我抽上一支烟。我的肺也空空如也，渴望着那分量的回归。

她每天都拉小提琴，而我现在要把它带走。它是一七八三年在布拉格制作的。我的包和小提琴一起放在床上，互相倚靠着取得平

衡，它们都在等我带着它们开始流亡生涯。无论何时，只要这把小提琴到了新的环境中，它就会跑调，好像它在演出前失去了自信一样。她告诉我她的一部分秘密地生存在它那黑暗的躯体之中，在那枫木的琴脊之间游走，被谐谑曲和快板所喂养。我就是为这个要把小提琴带走。它正在床上斜靠着我的包。在它的内部，我妻子的一部分就像尘土那么安静。等待着复活。

我习惯于在梦与梦之间醒来时继续安静地躺着，街上没有什么车，非常冷，冷得房子和车上都结上了一层苍白粗糙的冰。我躺在她的身边，想象着血液的循环在她耳朵里回荡着的震动，对无可挽回的失聪的倒数计秒。

她现在正在看着胖胖的面包师在小蛋糕上把糖霜挤成我们熟知的心形，那些蛋糕本打算在明天晚上跟我们那些肤浅的朋友一起分享。她并不肤浅，但她是个聋子而且很放肆。她曾经告诉我，她爱我是因为我是她唯一能听见的东西。她能感觉到她的小提琴上每一根弦在雕刻好的琴柱上的颤动，但是我不一样，我就在她里面。我是浸透她秘密身体的每一根骨头的一首歌，在那里整个世界都不会徘徊和迷失。

面包师正在把小蛋糕装进一个粉色的盒子里，然后他会用一条粉色的丝带把盒子扎起来。面包师知道她的名字，他有一本挺好的便笺本和一支笔，能把这一包东西的价钱写下来给她看，并表达他

的感激之情。我得在她离开面包房之前离开，否则我就会跟她碰个正着，这样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得在她的钥匙从她的手里掉到陶质烟灰缸里之前踏上去机场的路，带着她的小提琴和我的衣服。

我已经把所有的照片都烧了，它们燃烧时发出细小的爆裂声，引得烟雾探测器鸣叫起来，我马上就把它给砸了。她不会需要这玩意儿的，因为她是个聋子，而且这玩意儿也就震动个一分钟就完事了。

我要带走她最心爱的一件礼服，我知道这会是个错误。我记得在我沉入梦乡的时候，看着她在明日蜿蜒的触须之间轻舞那件霓裳的样子。那衣裙幻化成了连通当下与未来的一座桥梁。然后我们就一起无助地漂浮到了睡眠之中——冰在地板的裂缝间渐渐融化。

我写下了我离开的所有原因，我被对这世界的一种悲哀的力量所压倒，因为我整天都没有人可说话。我向孤独的臣服是一个海洋，在那海洋下面我才能呼吸。

我们是在明尼苏达相遇的，就在高速公路旁的假日宾馆的大堂里。我坐在她的对面。当侍者用一个托盘给她端上咖啡的时候，我意识到她是个聋子，她听不到杯子碰撞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总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在炉子上汤锅和平底锅产生的蒸汽间滑行。多年后她过世了，我卖掉了她的房子，注意到她的椅子在油毡地板上留下的沟槽，那是一种只有我能明白的盲文——一个

母亲的几何学。

我订了一张去明尼苏达的机票，我要租一辆车，开到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宾馆去。我要坐在那同一个位置上，而且要读同一本书的同一段文字。在那里我会等待她再次来找到我，这样我们就能走上那个被我们留在身后并且已经遗忘了的方向。那是一幅还没有被回忆染上颜色的画布。

我的母亲在柏林被一个纳粹用枪击中了腿部，成了残疾人。四十年后，作为对油毡地板的一种回应，我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并且偶然地发现了一张射伤她的那个纳粹军官的照片。他的名字叫汉斯。

最近，我在浴室的窗户上挂了一张挂毯，把灯泡拧了下来。这是一次次看到我妻子的牙刷的那个画面所引发的一个奇怪举动。那把牙刷放置在一个铬做的台子上，每次当我洗手或淋浴的时候，它总静静地盯着我看，挑战着我那畏畏缩缩的勇气。

如果某人在某天消失于从面包房回家的路上，牙刷就会变成希望的一种象征。

我会在夜里醒来，摸摸刷毛，检查下它是不是湿的。如果我能看见它黄色的背面，我就不得不再等一年。我想象着面包房和蛋糕的画面，几乎能闻到黄油的味道，尝到那一口热乎乎的滋味。

那个导致我母亲残疾的纳粹士兵名叫汉斯，他是我的父亲，他们是一对恋人。她能活下来并最终来到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她怀着我。我是她的保护神，一个微小的被禁止的开端。我有一张他的照片，但从来没拿给我妻子看过，因为我想她大概没法理解为什么我对此很骄傲。我继承了他的禁欲主义，我继承了他爱的能力。我们通过失去，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连续响起劈啪的枪声。头颅们冲着湿漉漉的鹅卵石地面倒了下去。人们的鞋子都掉了。

我的父亲。他闭上了眼睛。一轮又一轮的处决，男人，女人，孩子。然后理性瞬间抓住了他。他足够快地睁开眼睛，放低了他的枪。

虽然这是事实：我父亲把一颗子弹打进了我母亲的身体；我还是喜欢这么认为：因为对她的爱，所以那颗子弹凭直觉偏离了她的

心脏。

人群变成了无法被辨认的尸体，我父亲抓住了我的母亲，把她带到一个犹太聚居区，找到了一个全家正在挨饿的大夫。大夫给我母亲止了血，把从我父亲枪里射出的那颗子弹弄了出来，连一个苹果都没有索要。在我开始想象聋是什么感觉之前，醒着的我总是躺着想象母亲在一列疾驰的火车上穿过严寒的德国时是什么心情——那里的山上满布穿着深色制服的士兵，抽着烟，思念着他们的妻

子。我能想象出边境的警卫细细察看她的文件，然后用轮椅把她推到冰凉月台上的画面，装满了肉食、水果和红酒的货车阴郁地从那些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弄得麻木的人群面前开过。母亲把一张她母亲在花园里的照片塞在了裙子下面，那裙子将我和一片被撕裂的大陆分隔开来。

她在利物浦上船去纽约的那天，下着雪。那就是我怎么知道我会娶一个正喝着咖啡的女人——一个问我雪落下的时候是不是有声音的女人的原因。她把这个问题写在她的一只手掌上问我。

还有一些其他的谎言，在合适的情形下，也会是唯一的真实。

那一夜我们在宾馆里赤裸相拥而眠，肢体纠缠着肢体，出于恐惧和新鲜感，肌肉和骨头紧紧凑在一起。虽然我知道她也可能会邀请那个侍者到她的房间，然后那人就会坐在我现在坐的地方，像我看着她这样地凝视着她，可我不在乎。我想一直伸展手臂到她的背脊，让她的背部变得完整，就像泉水在岩石的缝隙间结冰。第二天清晨下起了雪，她问了我那个问题。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回答说“有”。我想把她的失聪从那个餐厅里带走，让雪中的奇迹成真。那一夜我去看她的演出。我听她演奏了巴赫第一及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想象着我母亲在爱利斯岛^①改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挣扎着

① 进入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走向我的出生之地。

我学会了妻子用的手语。我们管它叫“手指的芭蕾”。直到她在带着一盒蛋糕走回家的路上失踪那天，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一天。我想知道那些蛋糕后来怎么样了，它们有没有被吃掉？谁吃的？那些蛋糕折磨着我。现在那家面包房又开张了，它的灯光从孩子们卧室的窗户下面一直照进冰冷的街道。

我父亲在一九四三年秋天被一个十七岁的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了。他死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我母亲从来不说太多关于欧洲的事，虽然我能从她的故事里描摹出她父亲的样子，在他的店被强行关掉之前，他是个卖自行车的。有一次，我把一个学校里的朋友带回家。他是在瑞士出生的，会说很流利的德语。我记得我把他介绍给母亲，当他的嘴唇吐出那种语言，母亲就哭了，他才刚开始说就停下了。

有些时候，语言是渴望的声音。小型的波音飞机会是我从利物浦出发的轮船。小提琴是我的出境证件。

电梯在抵达大堂楼层时慢了下来，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在这栋公寓里住了六十年的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俄国女人，她叫艾达。她把手放在我的袖子上，一副很担心我的样子。她想知道我最近应付得怎么样，我带着小提琴是要去哪里。她想知道，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消息。我告诉她我的妻子在面包房里买那

些有着心形糖霜装饰的小蛋糕，而我不得不在她回来之前坐车去机场。我告诉她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而我正要离开她。艾达哭了起来，放手让我走，这给了我力量——父亲的那种力量，他在冰冷的雨中抱着我母亲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在阴冷高大、满布一行行枪眼的房子中间穿行，在噩梦中跌跌撞撞地穿行。他的脸上有一道道血的痕迹，他的心脏因为耻辱而燃烧着。我能想象出他们是如何紧紧抓着彼此，虽然最后，他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彼此。我能看见那犹太医生急躁地找着母亲腿上的子弹时他脸上的表情。我能想象出她离开的那夜，此后空虚感便一路跟随着他。我想象着他关于母亲的回忆、她倒下的躯体、她湿发的香气，以及那一路穿过犹太聚居区鲜血留下的痕迹、雪花的飘落。

岩石上的牧羊人

我一直被有关天堂的想法所吸引，这也是为什么对我来说，约翰·肯尼迪机场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地方，可以用来熬过我剩余的人生。

你可以分辨出他们，那些用一个方便的袋子或者特殊的钱包来装护照的人是经常旅行的，而那些很少旅行的人总是会到处翻找他们的护照，磨磨蹭蹭地拖拉着很多行李，站在一行行队伍组成的矩阵之中。每当有一列队伍移动，就会有新的人不断加入进来。

我想象我眼前看见的都是些已死的人在为进入天堂做准备，尽管我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但是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在人们都还活着的时候，用天堂来奖励好人，用地狱来惩罚坏人。

我无家可归，因为我疯了，我害怕承担责任。当我能短暂地逃离这些可怕的情绪时，就整日整夜地待在机场，有时我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大厅的塑料椅子上，余下的时间我就在餐厅里转来转去。当

这些可怕的情绪回来时——它们从我的脊柱底端开始，像鬼魂一样蔓延到全身——我就赶紧离开航站楼，溜到货坪去，那里永远被充足的灯光照得好像白日。

我躲进一个巨大的生锈大铁箱，裹上毯子，缩在箱子角落，这样才能让我感到安全。躲在盖子底下，我看着斑斑锈迹在铁箱上蔓延，就像一汪缓缓的秋水。

突然间我就陷入了失忆状态，记不起任何事情，中午吃了什么（如果我吃过的话），上一支烟是什么时候抽的？我的四肢开始轻轻发抖，上下牙撞在一起，发出磕碰的声音（想象一下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橱柜里的盘子发出的声音，对的，就是那种声音）。

这种难以控制的抖动通常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后困在我身体里的鬼魂会找到那扇进入我记忆的小门，如此两天两夜，我会被蒙着眼睛从一条小路进入自己的身体，被迫重温生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想象一下，你，正被迫进入你自己的身体。

在我第一次发疯的那个早上，我和父亲在一个很冷的池塘里游泳，母亲在一边屏住呼吸看着我们。她的裙子被风吹了起来，像一双白色的翅膀在风中飘动。下午，我回到了都柏林的神学院，红衣主教一边猛烈地和我握手，一边给了我学位证书。

现在我把自已藏起来，不伤害任何人。当疯狂过去，就像孩

子们惧怕的恐怖之夜终于离去之后，我醒了过来，我渴极了，几乎不能走路——我大便在了衣服上，这让我非常不舒服，附近有个难民庇护所，离这里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我可以上那儿去洗个热水澡，把衣服洗干净。有个在那工作的年轻波多黎各女人总是会给我一点钱和一些吃的，有时她会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你打算改变，佩地，就告诉我。”她叫我佩地，因为她不知道我的真名，只知道我是个爱尔兰人。她时常跟我说起她的生活，却从来不问我的生活。我很高兴她这样，所以我明明看到她戴了一个金色十字架却不告诉她我曾经是一个神父，信仰是一种平衡。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不存在——只是我自己不再相信他，我就像一个犯了太多错的儿子，让母亲被迫放弃了他），我希望上帝能帮助她找到生命中的真爱，她是一个好女孩，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而不是一串差劲的男朋友。我在机场遇到过几个男孩，很适合她，可是这些人飞走之后就不知道能不能还会回来。我洗干净自己，迈着轻快的步子焕然一新地走在回机场的路上，身下不再冒着臭气，我为她祈祷。这之后我能在两星期里都安然无恙，不会遭受疯狂的袭击，但是，我整个人仍然还活在它的阴影底下。

让我当一个神父是母亲的意愿，但是我对人们的爱让我相信她

的选择是正确的。跟那个时候在都柏林的其他学生一样，我和在神学院认识的朋友，从来没有在晚上去过酒馆，也从来没有在利菲河边的长椅上向女孩求过爱。我们只会坐在一起听无线电，喝茶吃吐司，或者，在大雨或人们因降雪而骚动的夜里，谈论上帝的爱，和他性格中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很多方面。

我对音乐有很好的鉴赏力，我记得自己敬仰伏尔泰，他对上帝的信仰仅次于他对自己的怜悯。他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发明他是有必要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我不当神父之后没多久，就遇上了那个可能成为我妻子的女人，那时我在公园里喂鸽子。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住在机场，我了解所有的航站楼，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注视航班到达和离开的提示屏上，我能告诉你下一班飞机会什么时候准备起飞、将飞向哪里。

看见一架飞机安全地飞走又飞回让我感觉很好，看着航班号你就能知道这点。看着人们在登机柜台前排队的时候，我会默默地为他们祈祷，我想和那些孩子们的眼睛对视，他们的眼睛就像深深的池塘，我会把我的祈祷投注到他们的眼睛里，就像把银币扔进许愿池一样。

你可能会说，既然你已经不相信上帝，那么祈祷就毫无意义。让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吧，为某个人祈祷，是一种不需要认识他们就

可以爱他们的方式。

我同情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当鬼魂在我身体里号叫、在我骨头里扭扯他们的肢体、让我不停地发抖时，我已经不是我了。疯狂时候的我曾经杀死过一条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连着好几天都在为那条狗的灵魂哭泣。

那些鬼魂总是能发现我藏身的地方，他们陪同我度过了整个孩童时期。他们严阵以待，等着我过去的角色出现在舞台上。我的台词已经写好，并且永不改变，我的角色就只有这一个，唯一的观众就是我自己。

我尽量不去跟机场里的任何人讲话（因为他们会想了解我，可我觉得向他们隐瞒一些事情就是欺骗），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在喋喋不休，有时我也被牵扯进和那些正在等待着上帝召唤的人的讨论，那是我们唯一共同的东西。

我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故事，一个年轻的怀孕女人告诉我她是怎么遇到她丈夫的，我不太记得她还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她肚子上的，是一个完整的未知的灵魂，它寄身的容器像一条面包那样大。我经常疑惑为什么灵魂会居住在细胞里，我猜想，灵魂就是一盏灯，等所有的事情都到位，它就打开了。但是不要问我是谁打开它的，因为我不想说。

看着人们穿过一道道门离开，进入一个阳光灿烂的走廊里，我

感到无比的享受。

门上写着字：仅限持票乘客。

试想想，天堂就在那里，而且轻易就能抵达。你通过邮件收到票，然后经过身份验证，付一点钱，然后你就能上路了。

被诅咒的人只能停留在地面，陷入永无休止的怀疑之中。

每当一架飞机飞入云层，就可能是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但是，人们总是很难对他们所爱的人说再见。我记得有一个印度男人，在他拿着几塑料袋的衣服准备上飞机时，来送他的小孩一直不停地哭。他飞走后，留下来的小孩便使劲地看着天上的那个小黑点。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那么多人总是希望能再多看他们的爱人一眼，机场的员工不得不时常出面干涉。

也许你会奇怪为什么我不自杀，因为，生活在疯狂之中，或者说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活在疯狂之中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不要以为我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我真打算这么做，那么一定是在我开始失忆并且发抖之前。我会去货坪，爬上油桶，然后把自己扔进里边。我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完美的埋葬方式——有一场仪式，所以我可能会试着找到一枚狮币^①，还有那些感到不得不尽地主之谊的能量——它们又怎会得知我已失去信仰？

① 荷兰在18世纪初发行的硬币，上有骑士和雄狮。

在我年轻的时候，在都柏林，我被弗朗兹·舒伯特的那首《岩石上的牧羊人》给迷住了，也许你也曾经听过这首曲子。我躺在床上，在半睡半醒之间放起音乐，就这样看着时间慢慢地从我的房间里流逝。这首曲子讲的是一个跟羊群一起生活在山里的牧羊人的故事。如果离开了他的羊群，他就等于完全孤独地生活在这世上，当想起遥远的爱时（我总是想象着那是一个遥远的、烛光摇曳的小村庄），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悲伤。看上去一切都在明白无误地显示，他再也不能这么继续下去的时候，有些东西在歌曲里诞生了——希望和美好在他所在的山头缓慢蔓延开来，他突然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喜悦给填满了。就像岩石上的牧羊人一样，虽然无数次我都谋划好了死亡，但是，当我在空荡荡的候机厅里漂泊，或是在休息室里读一本过期杂志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幸福的感觉，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和妻子。

如果那个可怕的鬼魂能在星期天带我去公园，那么我就能像以前那样和我的儿子一起踢球，或者坐在暖和的厨房里，在肩膀上围上毛巾，让我的妻子帮我理发。

如果真的有天堂，我想知道我在那里是否能再见到他们，我的悲伤是不是还会继续留在尘世，就像游泳前我们在泳池边扔下的一堆衣服一样。

在候机厅，曾经有一家人坐在我旁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们。他们准备从明尼苏达去伦敦，只有母亲以前离开过这个国家。他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父亲、母亲，还有一个男子。

那个男子已有三十岁出头，戴着一个特殊的定型头枕，他的脸被疼痛折磨得扭曲了，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紧紧地按在胸口。但是他的眼神一点都不神经质，也一点都不邪恶，他的眼神像一个平缓、柔软的绿色小山坡，他已经被困在那里数十年。

我们一直互相看着对方，直到他瘦骨嶙峋的四肢开始痉挛，他的母亲对我说：“他想跟你说话——有什么话他想告诉你。”

就像那个岩石上的牧羊人，我想。

我不知道，到了天堂他的手指是否能自如地展开，让他能摸一摸母亲柔软的鬓发。我不知道，到了天堂他是否就能和他父亲一起高兴地随意散步，说上一大堆的话。我一直在想着那个大男孩，有时我还会梦到他在一个漆黑光滑的地下洞穴里，浑身赤裸，但是很美丽，他在努力寻找着能看见光的出路。

两个星期之前，我路过了一座教堂，它看上去很像我以前做弥撒的地方，那时，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我一直在害怕的不是上帝、魔鬼或者死亡，而是万事万物在继续但终有一天我们都不将存在的事实。我坐在教堂的台阶上，听着里边传出来的歌声，那是一种无数声音合和为一的力量。鸟儿猛地俯冲而下，叼上食物又飞走了。

昨晚，我一整夜都站在航站楼的一个宁静的角落里，看着雪花落在跑道上。

各种尺寸的卡车有条不紊地在柏油路上来回奔跑，就像在跳一支机械的芭蕾舞。雪下得越来越大，安静地堆积着，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能从遥远的地方看见我的样子，而如果她真的看见了我，我又该多么羞愧。

跑道上的积雪就算一直不被清除，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某天它就会自己主动消失。而消失之后，它也总会有回来的那天，也许是被风，也许是被寂静，也许是被推雪橇的小孩那兴奋的声音，陪伴着，回来。

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我一个人站在离家不远的路上。黄昏时分，每栋房子都像是被塞进一袋植物中。仅有的几辆车都停着，被低矮的树枝挡着几乎看不见，那些树枝就像悬在房屋和汽车上方的手。

妻子先回我们的那幢老木屋了——木屋已经如此疲惫不堪。当我们在屋里走动的时候，它经常会发出嘎嘎吱吱的声音，似乎在说它已经不堪重负。

某种感觉席卷而至，我几乎一步都走不动了——那是一种同时让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又变得完美的伤感。我知道生命中很亲近的一个人死去了，梅达死了。

妻子一直都在嫉妒梅达，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走到和我隔了几户人家的一幢房子跟前，停了下来。前院里停了一辆旧车，车门很重，轮胎瘪瘪的，车窗上落满花粉，塑料车篷已经被风吹到了地上，暴风雨就要来了。

雨刷僵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中间，沾满了花粉，像两只从汽车前

盖里伸出来的手。幽魂们在后座亲吻。记忆从车窗玻璃的裂缝中涌出，融进草之间的泥地里，然后化身野花被推回地面。在这条街的某个地方，有一扇纱门豁然打开了。

梅达离开带来的哀伤情绪充斥了我全身，关于我们的回忆涌上心头。

一只塑料袋挂在了车前的一根树枝上，被风吹得鼓胀起来。

七岁那年，父亲从波兰的克拉科夫收养了梅达，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了我和父亲，梅达从来没有见过她。梅达长得很高，头发剪得很短，参差不齐，非常的不规整。她的左手没有了，小手臂到手肘处就戛然而止。

在康沃的那所小房子里，我和梅达共享一个阁楼。星期天早上我们总是起得很早，然后给父亲做早饭。父亲喜欢冲浪，即使在冬天，他也会穿过冰冷薄雾进入深深的水中。

有些清晨，天色还是乌黑一片，风大极了，我们只好点上蜡烛，假装生活在一个洞里。

父亲是从母亲决定离开我们——她和她的老板还有老板的儿子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的那天，开始在暴风雨的天气出去冲浪的。那时我才两岁，我几乎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尽管我还是爱着她的幽魂。

我和梅达把面包擦成砖墙，把煎蛋摆成鸟巢的样子，然后就坐

在台阶上一直朝着外边看。当看到父亲那辆老路虎的车灯光出现在泥泞的车道时，我们就会跳下台阶，把门打开。这已经成为周末的一个仪式。我们走进温暖的厨房，父亲看到我们点上蜡烛就会笑出来，然后他会用他带着海水咸味的手揉揉我的头，接着他会把湿外套递给梅达。梅达会用她唯一完好的那只手把外套拖进浴室，在地毯上留下一溜沙子和海水的印迹。

吃完早饭，父亲就开始跟我们讲大海，老是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被海水冲上岸来。有一次，还曾有一架“二战”中的美国飞机因为可怕的风暴坠落在岩石丛生的海边，父亲就在吃完早餐后带我们去看。那天雨很大，梅达和我只好一起罩在一个大垃圾袋里，我们把垃圾袋剪了一个洞，好让头伸出来。我们被翻倒在地的机身迷住了，两杆机枪从机舱的玻璃顶上戳了出来。父亲说机翼可能是被暴雨敲断的，梅达和我想进到机舱里面去看看，但是父亲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拒绝了。梅达说，我们可以对着大海祈祷。父亲说，他可不希望有这么敏感的一个女儿。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早晨。

在父亲吃着热的面包和鸡蛋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海水就会从他的鼻子里慢慢滴落下来。

梅达刚从波兰来的时候，只能用眼神来跟我们交流。我们常常

一起在村子里走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在同一个地方停下，坐在同一把长椅子上，看老人们打草地保龄球。当她学会讲英语的时候，就在这草地旁边的长椅上，她告诉了我她的波兰名字，niebo，在英语里，这是天堂的意思。

夏天的夜晚，当余晖变红、最终消失，我常常陷入沉思，事物是如何和我们保持同步。这是多么幸运、多么奇妙的一致性啊，那些毫无灵魂的事物不仅同时出现，而且以同样的速度从我们身上消失，好像万物都一直站在最高的浪尖上，冲向未知的未来。

后来，我们都同时十八岁了，在同一条长椅上，我告诉梅达这个神迹，没有灵魂的事物会一直跟着我们，但也会以同样的速度离开我们。她笑了起来，用一种充满智慧的口吻告诉我，有时正是因为那些过去的我们才支撑着回忆，这就是为什么，她说，她喜欢看老人们玩保龄球，因为他们从时间滑落，一直盘旋在过去的上空。

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分离。

当我们坐在长椅上时，就像十二年来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知道有些事情将在我们之间发生。我们都即将跨入成人的世界，我要离开家去美国——我得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的冲浪奖学金——而她，要去华沙一所很有名的大学。

我一直凭着大学里她给我写的信来想象波兰——鸛鸟在房顶筑巢，繁茂的马郁兰散发出几乎让人窒息的薄荷味，而葛缕子强烈的

气味吹过了科尔巴山脉。

我们坐在保龄球草地旁的长椅上，在那片沉默中，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梅达了，或者即使我们再见面，也无法恢复到过去那样的亲密无间。谁都没有说话，这是我们前行的唯一方式。但是，她的离开会一直让我不能释怀，就像母亲离开父亲，梅达失去的左手离开她一样。

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和我的妻子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可我始终觉得，一个你所爱的人从你的生活里缺席，就好像你住在一座山前，那个人——遥远山坡上的一个小点——一直在向你挥手。

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站在悬崖，对着自己的影子挥手。

我记得，我们一起坐在长椅上，共喝一瓶热可乐，我们两人正准备开始投入各自的人生，可是到底要多久我们才能够抵达尽头？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时，我读到《奥德赛》，它打动我的地方不是海洋，而是爱与认知。我的父亲就是奥德赛那样的人，我的母亲应该也是。所有的人都是奥德赛。所有的海洋都能到达这个或者那个家，所有的路都是正确的那条。可现在，梅达从地球上消失了。

现在，我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秋天到了，这是想念的季节。车斜停在路边，它也在时光中迷了路，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它只有“车”这个称呼，但事实上，它是一声叹息。

天开始变黑了，我能想象出妻子在我们的老木屋里打盹的样

子。屋子里的灯光从厨房的窗里透出来，照亮了窗下的花坛。

多年前，我和父亲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梅达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光头洋娃娃。父亲没有预料到出现在他面前的会是这样一个骨瘦如柴、又没有了左手的女孩。他把她抱起来，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在我们沿着峭壁返家的路上，梅达看看窗外的这个陌生的英格兰，然后再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好像是我向她编造了这所有的事情。

在我长成大人后，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梅达有多么的害怕。她还是一个孩子，却来到了一个她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陌生地方。还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恐惧消失变成了信任，我们成了一家人。当一个人被爱着的时候，她便能拥有整个海洋的力量。

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那个抛弃了她的家，和她在那里曾遭受过怎样的暴力，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后她居然又回到了那里。她承受过很深的创伤，但是最后爱把这些痛苦变成了河流。对有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而对另外一些人，生活是在为自己建起一座座的围墙。曾有一次，父亲发现梅达在离家很远的一棵老橡树旁哭泣，身边放着她的儿童手提箱，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散落开来。父亲把她抱回了家，但她仍一直哭了很久。

那天夜里，她承认了她是想逃跑，因为她担心如果我的父亲被淹死了，我也死了，她就会一无所有，而她如果自己独自跑开的话，至少还能知道她会被我们担心和怀念。

几天以后，父亲带着梅达去了伦敦，他说他要把梅达介绍给在伦敦的亲戚们，这样她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了。当天，他们连夜开了五个小时的车赶回了家。我和梅达一起躺在床上，中间放着她那个没有头发的洋娃娃，她用糟糕的英语告诉我，父亲带她去了伦敦动物园看猴子，然后向那些亲戚介绍说：“这是不可战胜的梅达。”

躺在床上，她跟我说她能感觉到她手臂缺失的那部分——有时她如何能有对一只手的感知——我们是有可能感知到那些实际并不存在的事物的。

或许，爱就是这样存在着的吧，而我们都是一个巨大无形的躯干上的肢体。后来，梅达睡着了，我看着枕上她那头剪得乱糟糟的短发，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左臂。

夜能安抚这么多的感受，在夜晚安睡，就是一个疏解痛苦的过程。

黑夜拆解了白天，第一次重新创造它。

我们在时间面前什么都不是，但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我们就是国王和王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野性而仁慈的花园，充满了偶遇和无

法解释的分离。

一个早晨，父亲用一种世界快要裂开般的紧急口气把我们叫醒，那天早上他几乎淹死在了风暴里，那个早晨以后，梅达就对父亲出去冲浪一直担心不已。她和我在父亲的船甲板上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写下了我们俩的名字。当我们画完回房接着睡觉时——雨中传来了老路虎车咆哮一般的轰响——卧室门底透出来的光就像一条脐带，把整个世界都联结在了一起。

梅达去了波兰后，整整两年，她每个星期都会给父亲写一封信，直到我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她的皮肤晒黑了，她出现在大门口，就这么站在父亲的面前，嘴里点着一支烟。母亲回来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就让她进了家门。母亲离开了十八年，当她重新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我离开了。我已经长大了。

母亲也从来没有见过梅达，我知道她和我的妻子一样，对梅达有着同样的嫉妒——一种奇怪的轻视，不过我和父亲都能忍受。

当我在暮色中打开这辆废弃的旧车车门时，铰链发出摩擦的声音，就像是梅达在对着我歌唱。我坐进车里，就好像我一直坐在那长椅上，坐在梅达的身旁，看着她把热乎乎的鸡蛋从壳里剥了出来。

梅达回波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从早年她写给我的信来看，她似乎过得很快乐。有一次，她还在信封上画了一只鸛。

我知道她也一直思念着我们，我和父亲给了她重新面对生活的能力，我们帮她解开了一个结。

现在，她死了。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凌晨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难过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出现，改变了我梦中情人的样子。

这一生，我邂逅过数以千计的人，他们给我和其他所有人都留下了某种记忆，就像是海滩上的沙砾，给现实的世界围了一道边。

快要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沐浴在月光里，能闻见雨云聚集在天上的味道，就快要下雨了。我能看到妻子就坐在走廊的秋千上，她在抽着烟，烟雾从她的嘴里吐出来，旋转着上升、消散，滑过屋顶，飞过那被人遗忘的旧车和野花，继续上升、盘旋，最后把自己投向无尽的未知之中。

我回到了家。开始下雨了。妻子用母亲看父亲的那种眼神看着我，她拍了拍身旁的坐垫，我坐了下去，然后我们俩开始大笑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同时意识到，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个美丽的小骗局。

死于星期天地震的法国艺术家

玛丽·弗朗科西斯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被压在成吨重的碎石下面。

刚吃下去的鱼还在嘴里。

眼睛无法睁开。

她能意识到那包裹住她的黑暗，但她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仿佛因为坍塌，她的灵魂溜了出去，正等在一旁，等着从这个世界消失的确切时刻悄悄来临。

生命，像块已经裂开的云。她正一动不动地躺在云上，随着那块云变成雨，淅淅沥沥地下下来。

小时候祖父母家有部绿色的电话，紧挨着一株植物。

她还记得塑料听筒的那种凉意，把它夹在耳朵下边的那种感觉。从话筒里，她能听见线路另一头的声音，后来意识到那是她自己的声音。

那一天，她帮母亲把鞋拿进卧室，她感受到了它们的分量。

她意识到，终究有一天她也会长大，她也会穿上这样的高跟鞋。

之后，偶然，遇见一个朋友。

时间，流逝。

她生命的雨停了，黑暗之中，她的心脏正在慢慢地推挤着她的肋骨。心跳的声音沉闷而清晰，就好像她在水里一样。

雨又开始下起来，直到她被生命中一件件只有自己知道的细节给淋透，雨才停了下来。

窗外的晨光。

教室的味道。

一杯牛奶。

对拥有一个父亲的渴望。想象他的臂弯拥住她时的压力。

清晨，她把头放在新男友凉凉的后背上。曾经她这么做过两次，那是她生命中和出生同等重要的事。

祖父母又出现了，不过他们上演的是自己的故事——他们光脚走在积雪的泥地上，不计前嫌地一起一步步地向前走。

战争的终结。

法国的一个小屋。

一个女儿。

一个孙女。

母亲的眉毛是棕色的，就像她拥有的那辆老雷诺的棕色。

玛丽·弗朗科西斯无法感觉到躯体的存在，也不能大声地喊叫出来。

四周一片寂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弹，但是在她的脑海里，无声的电影正在不断上演。

她对自己即将死去的意识并不如觉察到自己仍然活着的意识强烈。如果她还有更多的时间，那么她还有可能让自己萌生获救的希望，但是，渗出的回忆将她包围。

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将熄未熄。终于小火苗被微弱的呼吸给吹灭，只留下烟雾的香味。

大厅里响起了脚步声，她光着脚爬进厨房，在桌子边发现了死去的祖父，冰箱的门打开着。

一只鸡蛋碎在了地板上。

祖母在尖叫。

这段记忆，现在对她来说已经一点都不痛苦了。她的生命像一扇打开的窗户，而她，是一只蝴蝶。

如果不是时不时被拉回现实的黑暗——她的肉体还在坚持着活下去——此刻的她就好像是在度假，她在水里游着泳，在冰冷的水中，胳膊每划一次，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

她闻见了祖母外套的味道，外套一直挂在厨房的门背后，旁边

还挂着一只袋子，里边装着更多的袋子，还有一把扫帚。

她开始怀疑，她是否是在这幢倒塌的建筑里度过了整个人生，或者，她的人生只是一个她从不知道的某人的想象而已。

在这将死的时刻，她迅速地爱上了黑暗和生命最后还剩下的八秒钟——每一秒，就像满满一口的食物，对一个饥饿的人而言。

苹果

天刚一擦黑，布鲁克林街上“塞吉修鞋店”的霓虹灯招牌马上就亮了起来，一直从傍晚亮到次日凌晨。无论是在路上慢慢散步的人，还是在路灯下徘徊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块散发出让人眼花缭乱光芒的招牌。霓虹灯气在灯管里低声咆哮，看上去就像鲜血在字母形状的血管里奔腾，似乎是在郑重地对那些经过它的人许下一个诺言——生命中有些东西永远不会不需要修理。

在霓虹灯招牌下边，是塞吉修鞋店的展示区，上面摆着很多双鞋，这些鞋的主人永远都不会回来取它们了。塞吉花了不少心思来修复这些鞋，将它们变成原先那个自己的阴郁模型。

店里的一面墙上装了一个书架，上面摆着几本落满灰尘的俄罗斯杂志。书架下放着一把破破烂烂的椅子，来修鞋的客人就坐在这椅子上，等着塞吉给他们的鞋钉钉、上胶、缝线。胶水的味道很大，但对那些穿着袜子等得几乎昏昏睡去的客人来说，也能称得上是一种浓厚的香味。

这把烂椅子看上去似乎早已不能承受任何人的重量了，但神奇的是它却一直在坚持着它的职责。它有一种古老的美感，一条椅子腿离地毯有一英寸的距离，它好像永远都不会放下那条腿，永远不会结束那个一直要走下去的梦想。

塞吉是一个高大的俄罗斯人，脸看上去像一张很老很旧的皮革，眼睛因为生活的折腾已经变得晦暗又呆滞。年轻的时候，他倒是有一双毛茸茸的手臂，身体也强壮得像一只猛兽，经常会激发起那些喜欢挑衅斗殴的人的斗志，想跟他打上一架。但塞吉总是躲开这些醉汉各种挑衅的行径，那些醉汉觉得他不过是个笨蛋或者懦夫。其实，塞吉既不笨也不软弱。

塞吉用一种很慢的节奏去学习英语，就像一个老人慢慢游进大海那么慢。他很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每一个含义诡异或者发音古怪的词语背后，都隐藏着太多秘密。

当新单词像蝴蝶一样从塞吉的嘴里飞出来，挥着翅膀在整个班的同学头顶上空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总是仰慕地看着他。

塞吉参加了一个设在当地东正大教堂里的英语补习班，那教堂是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著名的远亲设计的。塞吉时常无意中听到邻居家的小孩讨论关于这个教堂的传言：这教堂的一部分可是由巧克力建成的。

有天晚上上课时，老师问过每个学生的职业之后，一边用眼神

看着塞吉，一边对着整个班级的人说，为什么“鞋底”这个词和表示一个人的灵魂的词，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呢？

那天晚上，塞吉睁着眼睛看着天上的满月，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夜。月光透过象牙色的方窗，把他那颓唐的房间染成了白色，所有的家具看上去就像是陈旧的结婚蛋糕。

塞吉一直重复念着课堂上刚学到的那个单词，他躺在枕头的凹陷里，大声地一次又一次地念着这个单词。黑夜过去了，但黎明还没有到来。

三个星期后，塞吉结束了他的英语课，自从那晚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最后一堂课那天，他早早地就去了，对老师解释说，大概是他店里粘鞋胶水的关系，他现在没办法安然入睡。她对塞吉的离开似乎有些伤感，但也只是说建议他以后多读些英文报纸。其他学生陆陆续续进来了，才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塞吉就在课堂上昏沉沉地睡着了，而且很快，他就出现在自己的梦里了。他回到了俄罗斯，轻柔的风吹在他身上，他走进了自己的家，一群鸟从门里呼啦啦飞了出来，飞过他的身旁，它们的翅膀噗哧噗哧地拍着，扇到了他的头。

当他的同学在练习发音试图用英语描述他们心中的希望时，梦中的塞吉走上了他老家的台阶。这所房子在他祖父年轻时重修过，曾经是这个村子的中心，塞吉的祖父总是在这里举行各种令人兴奋

的聚会，有蛋糕，有苹果啤酒，在壁炉上方还挂着捆得结实而干燥的香料。

离房子不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塞吉的祖父就在一天晚上死在了河边。当时他正在画一只鸟，他让那只鸟告别了飞翔。当时塞吉从会客厅的窗子里注视着他，但是，他就和村里其他几个果园跑来跑去的小孩一样，天真地以为祖父只是想躺下来打个盹而已。

塞吉和他的妻子在那幢房子里度过了极为快乐的两年。他的妻子是一个黑头发的女裁缝，出生在山头另一边的小村子里，那个地方的水一年四季都在结冰。

祖父死后一年，塞吉的妻子也因为难产去世了。女儿的出生，成为他生命中最快乐也最悲伤的一件事。

这幢老房子很快地就衰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整幢房子只剩几间屋子还能让人住得舒服一点。唯一到访的客人是各种各样的动物，他们通常在黄昏的时候慢慢爬上房子的后门。塞吉弄了一些厨余，分成几堆放在后门，以免那些动物互相之间发生纠纷。然后把女儿举到厨房的窗前，这样她就可以看到那些傍晚的来客。

当塞吉那些大多数来自俄罗斯的同学正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连锁信的时候，塞吉继续做着他的梦。他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房子的顶层，房子已经用木板牢牢地封住，空无一物。他听到女儿的哭声从一楼大厅里传来，他想往她那儿走去，但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却让

他不由自主地停留在原地。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塞吉清楚地知道女儿的各种痛苦的细微不同，以及所有可能让她哭泣的东西。这个梦——幻觉中的天才之举——只是让她的尿布湿了。

塞吉常常整夜整夜地趴在女儿沉睡的小床边，他一动不动，看上去像一座奇形怪状的雕像。他总是在担心最坏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在希腊神话里，死亡和睡眠是紧连在一起的兄弟。

要是没有女儿的哭声在梦里出现，塞吉就有可能会害怕，而这个梦就会变成一个噩梦——塞吉很爱“噩梦”这个词，他觉得黑夜像一匹马，正哭泣着穿越记忆的森林。

正当塞吉托住门把手进了房间时，楼下大厅里的哭声突然停止了。在黑暗中，他看见他的祖父坐在那把修鞋店里的烂椅子上。

他走向那个栩栩如生的人影，老人把他的左脚从一堆灰尘里抬起来，他的眼睛像两个小月亮那样闪闪发亮，他的鞋底脱线了。

在梦境的魔力之下，塞吉在老人面前跪了下来，仔细地观察着鞋子的破损。他的工具出现了。

在塞吉的人生中，他只修过一次那承担着双脚重量的鞋底。他的祖父曾经承认说，修补鞋底需要很高超的缝线技巧和一双稳定的手，它是一种只有被别人信任的时候才会做的尝试——这让塞吉想起了照料耶稣双脚的农民们。

塞吉的祖父不仅修鞋，还会用那些味道刺鼻的皮革或者小片的

橡木做鞋。

一九〇三年一个下雪的早晨，罗曼诺夫王朝公主的一个卫兵骑着马进了村子，他的双腿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在他的肩膀上有个黑袋子，里边装了几千卢布和那年仅六岁的公主的脚模，袋口用线缝得密密实实。

卫兵疲倦地下了马，面对聚集起来站在他跟前的村民们，大声地讲述他们本地鞋匠的名字是如何在皇家宫殿里那些宏伟的镀金墙壁间回荡。塞吉的祖父立即就被村民从小镇边上他那间呛人的小屋里传唤来了。他刚一到，卫兵马上就跪在他面前，请求他一定要为他的主人做鞋，他必须要带着鞋回去。祖父先把他从湿乎乎的泥坑中扶起来，然后才仔细地听卫兵解释，他带着一个装满了钱的袋子来到这里，并且再要活着把主人的鞋带回到皇宫，这一切是多么的艰难；而如果万一他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将会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

善良的祖父答应了卫兵的请求，还说在他做鞋的时候，卫兵可以住在他的家里。这个来自皇宫的卫兵就和鞋匠在他的小屋里一起生活了两个月。在蒸土豆的过程中，他给祖父讲了很多勇敢的故事，还有俄罗斯前线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的遗言。

当塞吉正在为他祖父的幽灵缝鞋底的时候，老人消失了，只在地板上留下了一点泥屑。但是塞吉的梦并没有被打断，还在继

续。他能听见老人在往楼上走去，他身后拖着那把椅子，叩响每级台阶。

当塞吉醒来的时候，英语课已经快结束了。这个梦从他的记忆中悄悄地溜走，就像一颗小卵石被卷进大海里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最后一节英语课上入梦的几个个月后，塞吉安静地坐在 B63 路巴士上，看着车窗外各式各样的人按部就班地投入他们新一天的工作。巴士摇晃着避开地面上的凹坑，塞吉努力让放在他膝盖上的那盒精美的午餐保持平衡，这是他昨晚从他家那个街区位于街角的波兰餐馆里订的。今天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他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他最好的一套西服，仔细地用纸包好了，还用细绳小心地打了个结。

尽管今天很暖和，但天上还是出现了几朵乌云，停留在河的上方，好像要对着河水里的倒影欣赏自己。这种暖和的天一直是冬天塞吉最期待的好日子，于是在开店之后，他打开夜里的投件箱，开始修补第一双鞋——除了抬起头来用不寻常的热情招呼客人。

那天是布鲁克林的苹果节，所有的街区，每一间形状大小各异的公寓房里，孩子们都正在把水桶洗得干干净净，在自己衣服的口袋里塞满袋子，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各种准备。那些衣着褴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了街角，懒洋洋地看着那些忙着上班的人流消

失在地铁进口，时不时问他们其中的一人要根烟。

中午刚过不久，雨就下下来了。雨非常大，店里的空气变得湿乎乎的，尤其当那些修鞋的机器开足马力时，湿气更重了。空气里夹杂了太多的水分，给鞋上胶也得比平时多费些工夫，因为胶水没有平时粘得那么牢了。塞吉用围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数了数那些还剩下的准备要修的鞋，然后分类摆好，将修补量最大的鞋摆在了最前面。

每双修好的鞋都用一块白色棉布包起来，然后挂在那面坑坑洼洼的后墙上，那里钉了三十颗钉子。

一个叫欧马的小男孩，住在附近的贫民窟，他经常到塞吉的店里玩。欧马和阿姨以及她的几个孩子住在一间潮湿的公寓里，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了什么地方，要一直等到他十八岁，他的阿姨才会告诉他。欧马曾经跟塞吉说，他店里那面钉着钉子的后墙，很适合做一个“让蜘蛛享受大餐”的隐秘之地。

塞吉让欧马挑一个他看着觉得最可疑的袋子，欧马挑了挂在最远最高的那颗钉子，一个看上去凹凸不平的白色包裹。塞吉嘟嘟囔囔地踩上脚凳，把袋子从钉子上拽了下来。他把它放到欧马跟前，解开布料，欧马马上捂住鼻子下了论断，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一只苍蝇，或者说最丑陋的一双靴子。

塞吉几乎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欧马到他的店里来而没有恳求他，

请他教他如何开个修鞋店。至少，他会恳求塞吉允许他能把手放在抛光机上摸一摸。

“鞋，”有一次欧马很正经地宣告出他的想法，“是心灵的信使。”

塞吉笑起来，让欧马滚开。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把这个句子写一些装鞋的棉布上，在家里那间老浴室的镜子上，也照样写下了这句话。

从七月十四日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欧马再也没有来过店里。塞吉能如此清楚地知道这时间，是因为每个欧马来店里的日子，他都会在日历上画一对圆脸：一个小小的头有张笑脸，那个大大的头上嘴被画成一条直线。

塞吉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瞎眼烟草商，他不被妻子殴打时，就用手风琴演奏过时的军歌。

塞吉正在为一只溜冰鞋缝上最后几针，他专注和投入的样子就好像他正在拉一把小提琴。剪断线，打好最后一个结，塞吉把溜冰鞋举到光线充足的地方，仔细观察他缝下的每一针。溜冰鞋上的一只滑轮滚动起来，塞吉陷入了想象。他置身于滑轮之上，轻快地滑过生活，穿越过时间，但是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似乎还在昨天，小片小片的雪花静静地飘落在修鞋店的窗子上；似乎还在昨天，他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煮着女儿的尿布。如

果没有记忆，时间对人类来说一无用处，塞吉想。

很多年前，祖父曾给他买过一双溜冰鞋，告诉他等河水结冰了他就可以穿上这鞋溜冰了。那个下雪的午后，他和祖父站在雪中，祖父说，这是天空快乐的眼泪，化成了雪片落下来。

塞吉几乎能感受到祖父呼吸在他脸颊上的那股热乎乎的、混杂着烟味的气息，看见冬天俄罗斯家里的那个苹果园的景色。每棵苹果树的根部都落满了雪，像围上了白色的桌布；一些动物从雪堆上走过，留下一个个小小的脚印，一只猫头鹰的空洞的叫声透过正在落下的白雪传来。

修鞋店的门后有一张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海报，上面画着一只巨型的鞋悬在几个修鞋匠头上，他们指着鞋底，面露惊异的神情。年轻的时候，塞吉的梦想是到美国去，买一辆华丽又气派的凯迪拉克或者林肯，就像黑手党特别喜欢的那种。在刚结婚的那段时间，塞吉经常在夏日的午后，在苹果园里靠着一棵树，做各种各样的白日梦。苹果树上停了很多小鸟，塞吉就在它们夜晚的合奏中睡去，而此时，他的妻子正光着脚整理着花坛。

他梦想着他能开着车在第五大街上兜风，身前的汽车仪表盘闪闪发光，孩子们则坐在后座读着美国杂志。他们脚上穿的，当然是极其合脚的用最好的意大利皮革做的鞋子。他们的笑声轻盈而明亮，充满了希望。

可妻子在生下他们的女儿后没几个月就死了，六个月零一周后，邻城的医生告诉塞吉，他女儿的心脏上全是洞，她不可能活过这个夏天了。医生说只有两样东西能救他女儿的命，一样是上帝，另一样就是钱。塞吉立即把房子挂牌出售，可等到房子卖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塞吉用剃刀使劲地把一块粘在溜冰鞋上的口香糖刮下来，他使劲地咬着嘴唇，结果咬出血来，血顺着他的下颚流下，流到下巴，滴到一堆鞋带上。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为自己当年想用全部的钱去换一辆车的想法而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感让他的脸颊发热。

在七月一个无风的日子，塞吉的女儿被埋在了苹果园里。一个白色的十字架正好立在她头上方的土地上，上面写上了金色的字，告诉任何有可能会路过这个小小十字架的人，她是她父亲唯一的女儿，她很爱动物。在她脚边，放了一个盒子，塞吉把家里的各种工具装了进去，他希望能由她转交给他的祖父，让他们在等待他到来的时间里有事可做。

塞吉把这双刚修好的溜冰鞋挂在了那颗最长、最扭曲的钉子上。

门外，鸟儿在不停地歌唱。

早上的乌云散开了，留下一片白云轻染的晴空。

把溜冰鞋挂好之后，外边的街上也热闹了起来。塞吉决定关门去看看苹果丰收节的活动。

他一丝不苟地换好衣服，对着那面黄色的浴室镜梳理好白色的头发，为自己的皮鞋上光，洗手。

水槽下边放着一把银质蛋糕刀，用白色的棉布仔细包裹着。这是他们家传下来的，曾经有过两双手共同握着它切开婚礼的蛋糕。

塞吉把蛋糕刀放进口袋，关掉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店外的霓虹灯招牌却整夜都会闪烁着，几个红色的字：修理各类鞋底^①。

他锁好门，朝街道走去。

塞吉希望能遇上彼得，那个瞎眼烟草商，或者欧马——因为他们的存在，塞吉才不至于只和那些鬼魂相依为伴。一些孩子用绳子把水桶捆在背上，在街上横冲直撞，另外一些孩子则被迫和父母一起慢慢地走着，脸上露出刚被父母公开责骂过的尴尬不满的表情。

还有一群孩子，像一阵强风从塞吉身边跑过去，把他的衣角吹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夜晚，方圆十几里，都弥漫着苹果成熟时散发出来的强烈香味，这香味就像阳光一样，洒进每个家庭。

塞吉住在格林威治区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他的房东住在楼

① 作者在这里用 ALL SOLES FIXED HERE 呼应上文在英语课上，老师故意迷惑塞吉 Sole（鞋底）和 Soul（灵魂）发音一样的段落。

上，是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每次当他听贝多芬的时候，就会用扫帚敲地板。他是一个鳏夫，也是他们家族里唯一一个从纳粹毒气室里逃脱出来的幸存者。他们谁都无力承担各自的悲伤合并起来的重量，于是他们的关系就维持在见面时礼貌地点头示意的程度。

塞吉床边的桌子上有一棵小苹果树，塞吉每天都非常尽心地照顾它，好像它是他的一个曾经濒临垂死的同伴。他买了最贵的植物养料，确保这棵小树能长得旺旺盛盛。它已经几乎有一个足球那么高了，以一种世界都在围绕着它的极其自信的态度成长着，根基也越长越深厚。

接下来的三个月都会是好天气，趁着这个好时机，塞吉想偷偷溜进那块曾经被废弃的土地，用铁锹把沥青地面锹开，把这棵小苹果树栽在自从一九七四年他来布鲁克林后每年种下的那些苹果树的旁边。三十年后，这块地变成了苹果园，并且开始举行纽约市里唯一的苹果节。

还没走到苹果园，塞吉就听到了苹果园里传来的人群声音，有那么多人。他想知道果园里还有没有空地能给他放他那把折叠椅。

当他走到最后一个街角，他那双一直干涸的眼睛突然湿润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哭了出来。塞吉没有停下来掏出手帕，继续用他缓慢轻摆的步调往前走着。他相信没有人会看他那么长时间，发现他在哭的秘密。

塞吉离开他出生的俄罗斯小村庄的前一晚，他站在苹果园里抽着烟，看着工人用厚木板把他的家封了起来，他们的妻子在房子里干活，用白色的厚床单把家具盖起来，就像轻轻蒙上它们的眼睛。

当工人用钉子封住前门之后，塞吉提着他的手提箱坐在了草地上。天色渐暗，流经房子的河水湍急地流淌着，岸边的树在河水里投下了柔软的黑色影子。

所有的河水都在流逝，正如人一样。

塞吉用从岳母那借的几块毯子在草地上铺了一张床，六英尺高的草丛下边，是他的孩子。

拂晓时分，清凉的露珠滴落在塞吉的皮肤和衣服上，他起身去亲吻墓碑，最后一次。夜里，一个成熟的苹果沉甸甸地从枝条垂下来，正好垂在墓碑的顶部。塞吉屏住呼吸带着疯狂和感激把它摘下，这样树枝就能回到头上那些纠缠的枝团里去。塞吉郑重地把这个苹果收到手提箱里。去美国的路上，整整六天都饥渴交加，但是塞吉从来没有想过要吃掉它。

此刻，塞吉走进了眼前的这个苹果园，他又一次面对着女儿的遗赠，数百棵已经长成的、来自俄罗斯的苹果树向他点头，好像认出他来。

树上结满了苹果，压得树枝都弯了下来。孩子们很喜欢这些树

枝，他们大声地笑着，倒挂在上边玩耍。

塞吉把他的折叠椅放在苹果园边，坐下来，听着苹果被扔进水桶里的声音。有人买了烤架，直接就把摘下来的苹果用铝箔包起来烤着吃。

这样的热闹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塞吉用那把银的蛋糕刀切下最后一片苹果，然后仔细地把刀用棉布包好。人们也开始陆续回家了，孩子们四散开来，他们小小的脊背被装着苹果的水桶压弯了。一个苹果跟一颗人类的心脏几乎同样大小、重量相等，他们背着那些苹果，就像背着那些还未曾降生和那些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心灵。

天气越来越冷，塞吉也打算回家了，他不想拿他有关节炎的手冒险。到明早之前，他的夜间投件箱里肯定装满了折断的鞋底和穿坏了的鞋跟。

他刚想起身，欧马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他的口袋里装满了苹果，以至于他都不能直着腿跑步。

“鞋匠！”他大声地说，“我一晚上都在找你。”

街区的尽头，一支烟花正好点燃，欧马咧着嘴笑起来。

“你又要玩什么老花样了，嗯？”塞吉说。

“我给你拿了一个烤苹果，但是我把它掉地上了，然后就被狗吃了。”欧马一边说一边把苹果塞进他的裤子里。

“纽约市长也在这儿，你看见他了吗？”欧马问。

塞吉说没有。

“有人朝他扔苹果。”欧马说完大笑起来。

“我希望不是你。”塞吉咕哝了一句。

“不，不是我。不过他说市里买下了这块地，准备把这个苹果园送给纽约市的孩子。”欧马突然冲向塞吉的凳子，一个苹果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滚到了塞吉的椅子边。

“你觉得是谁种了这些树，欧马？”塞吉问，“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是谁开始做这件事的吗？”

欧马正在地上摸索那个掉出来的苹果，不过他还是设法回答了塞吉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是谁种的。市长说这是这个城市的一个伟大的奇迹。”

“但是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人会想到做这么一件事吗？”塞吉问。

“因为他们爱苹果。”欧马说。

塞吉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是时候回家睡觉了。

欧马终于在椅子底下找到了那个苹果，然后他脱下一只袜子，撕成了两半。

“你在底下干什么？”塞吉厉声说。

一双小手突然脱掉了塞吉的鞋，动作有力而有分寸。欧马往袜

子上吐了一些唾沫，然后开始擦塞吉的鞋跟。一开始塞吉试图站起来摆脱这个小混蛋，但是欧马已经开始弄另一只鞋了。塞吉坐回了椅子上，闭上了双眼。

日常生活

醒来好一会儿了，托马斯唯一模糊的意识他还活着。然后，好像身体淋到冷水一个激灵，托马斯记起昨天夜里妻子的姐姐给他打过电话，他们简短地聊了几句话，但什么事情也没解决。

他掀开身上的毯子，蹒跚地穿过那道从窗子里透进来的灰色晨光，走进房间。他犹疑地看了看那台电话，然后给自己泡了一壶茶。茶在泡着，他坐到床上，努力地回忆起昨天晚上的梦。他试图把那些零星的碎片拼凑到一起，可就像他昨天夜里参加了为他准备的庆功宴，但早上却只带着一些残渣醒来一样徒劳。他又一次看了看电话。

他听着雨水落在窗子上的声音，决定开始写辞职信。他坐到桌子旁边，扫了一眼放在一边的账单和他永远都不会完成的报告，从打印机那儿抽了一张干净的白纸出来放到跟前。喝完一杯茶之后，他开始写了。他能感觉到牙齿上被糊了一层糖。写完地址后，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像一只小小的、垂死的动物。

他把头转向了电话，但其实眼睛里什么也没看见。

他听到外边的马路上开始变得繁忙。人们都开始准备去上班了，卧室里的收音机正在报时，咖啡正滴进玻璃罐里，浴缸正放着水。他突然觉得有些尴尬，紧紧抓住茶壶的把手，给自己再倒了一杯茶。

他能想象出来他那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妻子，一具毫无生气的、被白色床单盖住的仿佛蜿蜒的山脉的躯体。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护士穿着白色的鞋，而妻子的两只光脚则在医院的床单下无力地分开着。

几个小时以前，她姐姐给他打过电话，但是他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每当他想到说句什么话的时候，话语就像个气泡一样，噗地裂开，变得支离破碎，他没有办法把它完整地推出牙齿送到电话那头去。他想到了医院的走廊，彩色的塑料椅子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像条长河。他能感觉到内心的紧张，在姐姐跟他转述医生告诉她的所有细节时。但是他脑海里一直盘旋的念头只是：伤员鉴别这个词是多么的美妙。

他穿上了衣服。房间里清冷而安静。他给自己又倒了一些茶喝下去，也不在意茶水已经变凉了。把手臂伸进夹克袖子时，他瞥见了她的靴子。他突然想伸手去摸摸靴子，穿过黑色的皮制鞋口，伸进那曾经包裹着她的脚的鞋肚里去。

他试着给她的姐姐打电话，但是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听。他挂上了听筒。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生活会变得如此混乱。

他看了看表，以前这个时候，他应该正开着车去上班，然后在办公室里听新闻，小口小口地喝咖啡。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既羞愧又天真的想法，如果他能让自己的大脑倒退回去，那么他就能经得起各种突发的事件，他会是另外一个版本，更强大，也更聪明。

穿好鞋之后，他去壁橱里找他的雨衣。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猛地把雨衣从衣架上拽下来，而是轻柔地抬手去拿。他感觉自己的手开始在衣橱中游走，掠过不同的衣料，它碰到了那件她最喜欢的外套。那是一件长驼毛外套，系着一根粗腰带。他的手指徐徐滑进了外套的口袋，在硬币、便条纸和薄荷糖之间游弋。这是手的秘密。

他开车去了医院。那只伸进过她衣服口袋的手还残留着一股轻微的香水味。他想到了她的美容院，脑子里描绘出她桌子上放着那些小瓶瓶罐罐的架子的画面，每一瓶都是一种蒸馏出来的花朵精油，每一瓶都是一种嗅觉的指纹。

他记得她的顾客的脸，她们把衣服挂起来，然后从桌子擦得高高的杂志上拿起最上边一本。他记得她们的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杂志的每一页，等待着脸上涂上温暖的、散发着芳香的精油，还有他妻子双手的抚慰。

去医院的路变得又窄又直，像一张灰色书签在森林里延伸，而

落叶——就像那些易碎的词——用自己脆弱的叶尖弹跳着穿过高速公路。

他试图把她的样子保留在脑子里，但是他又不能同时想起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又一次想到了她桌子上的那些小瓶子。

在医院里，站在她的床前，他听到窗台上鸟儿的鸣叫声、机器的运转声。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仔细地研究她的手指，它们修长而平滑。她的手腕上，有一块塑料牌子，上边用电脑打印着她的名字，这让他感到非常生气。他歪下身子，把头放在了她的手上。手很温暖，当他的呼吸被她的皮肤反推回来的时候，他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他觉得浑身发麻，不能动弹，就像夜里他全身注满石膏一样。他很想知道她的脑子里现在都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花园，有很多鸟儿，在叽叽喳喳鸣叫。

手术那天是最糟糕的时刻，而现在纯然就是一个等待的游戏了。她的姐姐说。

小睡片刻后醒来，他看到妻子的身上有个人的身影。

“早上好，托马斯。”护士说。

他向她点了点头表示回答，然后问他妻子的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护士看了看她手中的表格，回答说没有任何变化。

“你想给她洗洗脸吗？”护士问。他转头看着他沉睡的妻子，想

象着用一块潮湿的布擦过她纤细的沟壑、她的脸颊。他觉得有点尴尬，他的手开始发麻了。

“我给你拿一些温水过来。”护士说。

没多久她就回来了，把一只碗和一些棉球放在他妻子的床边。托马斯拿起一团棉球放到温水里蘸湿了，再把水挤干。他沿着她的额头开始轻轻地擦。她一动不动。等全部擦完了，他再把一条柔软的毛巾轻轻盖在她的脸上，非常仔细地避开她的鼻子和嘴唇，然后轻轻地拍干脸。

手术一直持续了六个小时零十二分钟。手术期间，托马斯离开医院，走到公园里坐在一把长椅上放声大哭了好几分钟。他点了一支烟，看着两个小男孩互相扔足球。那是十二月的一个黄昏，一条狗在远处吠叫。等到公园渐渐被夜色吞没，他又走回了医院，他为他离开了一阵而感到羞愧，不知道她姐姐会不会为此而生气。

他在医院的自动门前边站了一会儿，然后才走进门去。

在向她的房间走去的路，他想起了那两个在公园里玩足球的小男孩。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的一年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化，会更好，或者更坏。

护士过来拿走了碗和棉球，托马斯想起几年前妻子说的话，她想去看看法国的薰衣草地。

明年肯定，他想，等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就去。

手术后第四天，所有来看望她的人都说她瘦了很多，好像这是一种问候的方式。那是一个不怎么暖和的下午，托马斯决定再去公园走走。走在路上，他觉得舒服多了。他尝试着去回想那些正在裂开的玻璃、爆炸了的气囊、她的脸和她扭曲的身体。

公园就在前边，他放慢了脚步。他努力想去看清楚那些开车从他身边经过的人的脸，他们的眼睛扫过他的脸，然后又飞速离去。

一阵突如其来的厌恶充满了他全身。

他找了一张空的长椅坐了下来，努力控制住那种强烈的冲动，他想马上冲回医院，把她从病床上抱下来，回到他们的家里，锁上所有的门。

就在那个时候，托马斯意识到他已经变了，他不再是那个他，而是像其他的人一样，被一场介乎必然和偶然的交通事故影响，一模一样的反应。

一个垂头丧气的老女人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叹了口气。

“这晚上的天气真是越来越冷了。”她说。她递给他一条紫罗兰口香糖，他放进嘴里开始嚼起来。他们就这么坐着，大部分时候都沉默着。

“明年的这个时候，”托马斯突然对那个女人说，“我妻子和我会去法国。”

“哦，那真好，亲爱的。”老女人似乎很高兴，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托马斯。她说：“我先生和我总是说要一起去欧洲。”

“他们种了很多薰衣草，当你在乡村里漫步的时候，空气里都是薰衣草的香味。”托马斯说。

“真希望当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了，”她说，“但生活就是这样把你慢慢就给耗光了，是不是？用日常生活把你给耗光了。”

那天晚上在医院，托马斯坚持要和他的妻子待在一起。他握着她的手，点上她最喜欢的精油。

“大部分人都回家的，睡个好觉，然后第二天一早再赶过来。”护士一边把毛巾折起来一边说。

“我不是大部分人。”托马斯说。护士一句话都没说，离开了房间。

假 如

我坐在餐桌旁。房间里没有开灯，红色的石地板上撒着很多玻璃碎片。后门大大地敞开着，可以看到月光透过树丛洒满了后门外的小路。我就这么坐在黑暗之中，喝着茶；我的妻子，她正在我们屋后无垠的田野的某处。我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茶杯，好像在做着神圣的祈祷。我能想象出她的双脚一定已经完全陷进泥地里了，她的眼镜会被雨水弄得模糊不清，她的头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肩膀上，像黑色的海洋。

当我回到家看到满地的碎玻璃和敞开的后门，就知道她已从医生那里得到消息了。餐桌上，一张白纸时不时被微风轻轻吹起，像条白色的舌头在舞动，那是一封信，也许会证实她最害怕的东西，我没有勇气去看。黑暗中，我只能大概看到一串串的字符布满整张纸，像一具具小小的尸体，朝我们俯过身来。

我不知道是她故意摔碎了这些杯子，还是当她弯下背扭动四肢时拐杖把酒杯碰倒在了地上。当她走向清冷月光下空旷的牧场时，

她的拐杖就好像一双巨大的筷子。

她的腿很畸形，会让人以为那是某种橡胶。我第一次触摸到它们是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晚，在那个山里的小酒店，离山脚只有八英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我们的小屋背后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家小酒店。我清楚地记得那张床和那整洁的黄色床单，我想知道有多少人曾在上边睡过，那枕头就像一个小剧院，有无数的梦曾经在那里登台演出。黄昏的时候，我站在小酒店的花园里抽烟，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和天上繁星的光芒交相辉映，提醒我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抚摸着对方，从皮肤上传递过来的柔软，深深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就像把手臂伸进河水，我们能感觉得到每一块石头的重量。

妻子的双腿呈现着一种极其不自然的扭曲状态，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同学总会当着她的面说昨晚他们做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梦，梦见他们的双腿变成两条白色的死蛇缠绕成一团，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叫她的名字，这叫声像利箭一样狠狠地刺中了她。每天晚上她都带着悲痛入睡，梦想着某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能发现自己的双腿变得像小树一样又直又强壮，然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双长着粉红色手指的小手会来按她家的门铃——这意味着一道序幕被无声地拉开，有人来邀请她出去玩了。

我的父亲是个矿工，而她的父亲是专门修理升降井钢架的焊

工。她梦想当她的腿变好的那天，她的父亲就会拿着焊接枪把她的拐杖改成一辆前面有个小篮子的自行车，就是那种其他女孩都会有的自行车，她们骑着它去买一包热热的鱼薯条，或是去装用木棍从树上打下来的野苹果。

有一次，她把她的拐杖向学校操场旁边的一棵梨树上扔去，它们被卡在了上面，而这时，催促学生回到他们冰冷课桌的铃声响了起来，于是她只能不知所措地坐在树底下，浑身发抖，直到一个老师从栅栏后看到她远远的身影。老师让门卫和他的傻儿子去帮她，那傻儿子拖着一把梯子穿过操场，把脸凑到每一扇他经过的教室的窗上。

此时，我的妻子正在外面的某片田野里，在雾气笼罩的山脉的阴影里。也许她会靠在篱笆的墙上，看着别人赶牛回家，那些牛的眼睛如同潭水一样，黑色，静止。

我们住的村子到处都是泥地，各家的母亲和永远无法干燥的土地展开了徒劳的抗争。村庄上空的天上，堆满了厚厚的雨云，就像一些好奇的动物，伺机潜入一切事物和人们背负的生活——慢慢让他们溺亡。

星期天，单身和丧偶的人都会聚到山里的城堡酒馆里亲吻和打闹。那些没有去酒馆的人，还有在地里的人，会伸开四肢躺在小屋前燃烧着的火堆旁，那些火堆就像悲伤的装饰，散发出的烟雾沿着

山坡慢慢上升，然后消散开去。孩子们在厨房里看着黑白电视，他们的父亲一边剁去鱼头一边抽烟，凝视着后花园，直到天黑，像一个悲伤的陌生人撕掉了他白天的伪装。

我手中的茶已经冷却。月亮，那些胃里翻腾着酒精、从酒馆回家的被遗弃的灵魂寄予希望和愿望的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

妻子和我曾经坐着一辆锈迹斑斑的卡车去过莱克斯汉姆医院，当他们把一根钢针刺进她的脊椎时，我就像是被闪电撕成两半。

我一直无法鼓足勇气去阅读那封摊在桌上的信。

自从父亲搭乘那个突然降落的升降井被摔得粉身碎骨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要一个儿子。

那天，还是个小男孩的我，就在这间厨房里，也是在黑暗之中，坐在桌子边等着父亲回来带我去义卖市场。我一心记挂着想得到一条金鱼，他们会把它装在一小塑料袋里大方地分发给每一个孩子。

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生气极了，画了一张他的画像，然后拿铅笔对着那张纸不停地戳。在我的画里，他和他的工友们坐在酒馆里，他在卷着烟，脸上全是煤渣的黑色污迹。

终于，一个邻居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来，她拿着一只塑料

热水瓶，里边装满了汤。她坐在我面前，跟我解释我的父亲是怎样被卡在矿井里，她说电视上应该会报道的。我想着那幅画，哭了起来。

母亲一直坐在矿井的入口等着，整整三天。我睡在邻居的家里，头的上方有一个用衣服架子做的十字架。我想象着我在一片长满了草的山坡上，用那只经常戳父亲画像的铅笔不停地在地上挖着，直到我的父亲从地里伸出他的手来，拿着一袋金鱼。

我的妻子就是邻居家的女儿。在父亲去世之前，我只能在星期天的下午见到她，她歪歪斜斜地在屋前的花园里漫步，像一个破烂的玩具。

当我得知父亲的尸体可能已经被数吨重的黑土砸得粉碎之后，她告诉我，尸体只是一种伪装。她轻轻地说，每一个灵魂都是一条河，在寻找他们回到海洋的路。

父亲发生事故之后，我就想要一个孩子。我要在他生命终止的地方继续生活，我希望我就是那个关键的衔接。等我把那封信可能会带来的失望情绪一点点平复后，我会出门去田地里找我的妻子，把她带回家。我从来不想让她知道成为一个父亲是我此生最伟大的抱负，我不想让她觉得好像是她让我失望；是的，曾经是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我在想，假如我收拾行李然后逃离这个地方，会发生什么。也许我会去伦敦，在那里的市场找个工作；或者去苏格兰，在

深水中捕捞鳗鱼。去想象我们会如何伤害最亲近的人这个想法是很诱人，因为它会提醒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有多么深。

就是在这间小厨房里，母亲跟我讲着父亲去世前的故事。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开车去甜面包山，听着那滋滋作响的收音机，腿上盖着毯子，天上下着小雨，她告诉我。我能想象当时不断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它们就像数千双眼眸，映出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快乐瞬间。她告诉我，他们的第一个周末去的是黑湖，他们带着啤酒，还有用报纸包着的热乎乎的辣香肠，在码头上钓螃蟹。她告诉我，爱，就是一个人让你第一次能够认识到自己。

自从父亲死后，我就把邻居家的残疾女儿想象成了自己的爱人。我想象着我用自行车带着她，去甜面包山，我轻轻地抚摸她的腿，然后在雪花中带着羞涩的心情轻轻地亲吻它们。我想象着我在操场上为她而战斗，如果我的同学有人胆敢说她丑陋，那我就用拳头狠狠地打断他坚韧的鼻子，就像我在家里对着一个枕头练习的那样。

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开始给美国的医生写信，咨询他们如果把我妻子的腿拉直需要花多少钱。他们每一个都回信来要表格、个人信息，还有最重要的，照片。妻子唯一的一张照片是我趁她睡着以后偷偷摸摸拍的。我把这些东西全都寄给了医生，但是他们全都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科技每天都在进步，所以我应该跟他们保持

联系，当然，这是秘密进行着的。每个圣诞节，全美有十二位医生都会收到从威尔士寄来的一包茶叶。

假如她是健全的，她的双腿是对称的，那么我就不用每天都要把她从浴室里抬进抬出，也就不用开车送她去图书馆，她在那儿负责盖书戳、招募新会员。这些因为和她结婚而带来的例行公事，已经让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我幻想着假如她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那么我们就能从开往甜面包山的卡车上跳下来，互相追逐，这样奔跑会让我们显得年轻十岁。所有的夫妻都应该奔跑着互相追逐，然后抱成一团倒在地上。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像了解我父亲那样了解我。每当我妻子从火炉里取出一些煤，在我脸上抹上一点煤灰的时候，她都说我看上去很像我的父亲——我们的眼睛是同一种颜色。死亡终结了一段生命，但是无法终结一段关系。

我把红色石地板上的碎玻璃渣扫干净，穿上橡胶雨靴。她还没有吃饭，我要去把她扛回家来，再把她放进放满热水的浴缸。她会哭，而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已经快半夜了，风夹带细雨吹着我们的小屋，打得窗户噼啪作响，水泥路也被雨水浸软了。前门的地已经被牛蹄踩得一团糟，泥坑很深，像个水桶一样。

当我走到一段硬一点的路面时，我听到一阵某种动物发出的狂

叫声。牧场上空空荡荡的，一头牛也没有，牧场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那样闪闪发光。我走进牧场，注意到正中间的一个白色影子，我这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声音，是妻子发出的笑声。

我朝着她的方向加快脚步走过去，一路上气喘吁吁。雨滴被月光映衬得莹光闪闪，穿过我呼出来的白气，像群星骤然落下。

妻子就这么站着，没有拄拐杖。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奇迹发生了。但当我走近了才看到，她是笔直地跪在泥地里，拐杖已经被她出于某种激情扔得很远很远，也是这种激情，让她发出了刚才的那阵笑声。

在我准备去抱她之前，我转过身向身后看去。雾气已经吞没了房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片白色的土地，我们这两个颤抖着的人，栖息于这个世界。

我跪在她面前，去摸她那挺得像雕塑一样笔直的身体。我感觉到她的手指紧紧地按在我的头皮上。她的声音轻盈，充满力量。

“那封信。”她说。我试着把她从泥地上拉起来，但是泥地紧紧地卡住了她，就像卡住从它里边开出的第一朵花。

“你读过那封信了吗？”她再次问我。

“我再也不在意那些事情了。”我说，但是我的话被风吹走了。她又大声地笑了起来，朝着天空伸直了她的双臂，好像要引导一股强大的力量穿过她的身体。

得到和你失去的一样多

杰拉德离开办公室时雪已经停了，街灯已亮，但是天还没有暗下来。在每个路口的尽头，人行道都消失在一池暗淡的雪水当中。

杰拉德看见了某个人在雪中留下的脚印，曼哈顿曾经是一片森林，他想象着这是一个印第安人回家的脚印，他的肩头扛着一具温暖的动物尸体，尸体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

杰拉德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它们多久后会消失？他对着这个世界呼出一口气，热气很快就消失在冰冷的空气里。他想起了里尔克的诗：我们在空气中漂浮着，就像一盘滚烫的食物散出的蒸汽。他弄不清楚，他的人生会不会是比较特别的那一类。

杰拉德回忆他在英语预科学学校时参加的那次寒冷的越城跑比赛，裸露在空气中的大腿沾满了溅起的泥点，他的心因奔跑怦怦地跳着。

他想起了海斯廷顿，那个物理课老师，长着一个坚硬的下颚，还有可爱的蓝眼睛——眼里似乎时时渴望着看见孩子们畅饮胜利的

荣耀。海斯廷顿参加过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还得过一枚奖牌。希特勒观看了这场比赛。当十几岁的海斯廷顿跑过终点线时，数百万人即将被杀害。而若干年以后，当那些孩子从家里经过一段长途跋涉后走进毒气室时，他们全都吓坏了，但仍然全身心地相信自己的父母会好好照顾自己。

想到这里，杰拉德的心里泛起对女儿的爱，这爱让他的心像被针扎了似的，带给他一阵疼痛。他穿过第五十三街，女儿的名字叫露西，今年八岁。她有着一头棕色的短发，一只 Hello Kitty 的发夹将短发整整齐齐地别在头上。杰拉德曾经遇到过一个犹太传教士，当时他正坐在开往南安普敦的火车上，传教士就坐在他隔壁。传教士刚从英格兰回来，正在做一个关于战争的纪录片。

“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纪录片了。”杰拉德对他说。

走在第五大道上，他开始痛恨自己当时说出了那么愚蠢的话，他肯定认为我和其他那些人一样，杰拉德想着。我真的和其他人一样吗，杰拉德问自己。当时，那个犹太传教士只是把他的手放在了杰拉德的袖口上，只停留了一小会儿。

雪突然又下了起来。

在这个飘雪的黄昏，黄色的出租车似乎都已经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只有商场橱窗里透出来的明亮灯光吸引着行人的注意。杰拉德看到橱窗里的那些时装模特，它们非常安静，绝对的安静，它

们在谈论一些它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它们坐在餐桌前却永远也不会吃下任何一口食物，它们躺在床上，却从不会做梦。

在自己温暖的公寓里，他常常给露西拍照，她会坐在桌子旁，读着大开本的《黑美人》缩写本，双脚在桌子下面专心摇晃着。她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一件事情。

杰拉德长得很帅。他和很多女人上过床，而其中大部分的女人都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爱上她们，所以她们刻意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让自身沾染那种古老的痛苦。杰拉德也曾爱过一个女人，但她并不是露西的妈妈。

露西和保姆英迪拉一起待在家里。英迪拉是个胖胖的女孩，从新德里来，正在巴纳德大学读书，每个周末晚上她会过来给露西做饭，辅导她的家庭作业。杰拉德和露西都很喜欢印度食物，所以英迪拉经常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儿吃饭——头一次留下来吃饭时她是不愿意的。可现在她正在渐渐变成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她的父亲早已经不在了。

白雪已经覆盖了眼前的一切。杰拉德想起了《隐形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部老电影，电影里会不断传出噼啪作响的轻微杂音。露西在《电视导览》上注意到了这个电影的名字，于是那天晚上他就和她一起看了这部电影。那会儿已经很晚了，只看了五分钟露西就沉沉睡去。杰拉德抱着她，感觉到了女儿的心跳，像一颗柔

软的、温暖的岩石。把她抱上床的时候，她醒了，她问杰拉德隐形人后来怎么了，他告诉她，隐形人被抓住了，因为下雪了，他在雪地上留下了他的脚印。那很漂亮，她说，却没有睁开眼睛。

暴风雪来了。

雪花像成块的毛皮，从冬天的背上扯下来。

突然，杰拉德从洒落的雪花中间，看见了罗瑞尔。

已经八年了。

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身后背着包的女人被撞到，咒骂了他一声。

是罗瑞尔，离他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他走到橱窗前，轻轻敲打玻璃。

商店里排队的人听见声音后都转过脸来看着他，他们面无表情，像昏昏欲睡的陪审团。

她的脸依旧棱角分明，就像一幅毕加索的画，但她的眼睛又让整张脸柔和不少，那双眼睛已经沉浸、倒退回记忆之中。

她比以前更漂亮了，他想。她的嘴微张着，就像一颗杏仁。杰拉德不清楚她是否在微笑。

一切都发生在五秒钟之内。

杰拉德不知道他现在的行为是否正确，也许他应该继续向

前走，回到家之后再仔细琢磨，他应该能够重现出看见她在商店排队的那个瞬间，让这小段记忆像一直开着的水龙头那样溢出来。

她正拿着一盒生鱼和一瓶冰茶，在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未曾被一段热烈的感情消耗光——就像一扇门敞开着，但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两个人分开的这几年，只不过是没有了另一个人的生活。

他们在一起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他们在杰拉德的同事举行的晚宴上相识，那天晚上，人们在点着蜡烛的房间里喝着葡萄酒，女士们都穿着美丽的露肩晚礼服。在烛光的映衬下，即使是平时毫无吸引力的女人，也变得美丽动人起来。杰拉德发现他和罗瑞尔之间像是旧友重逢，尽管他们之前从没有遇见过对方。

他走进商店走到排队付账的她身边，杰拉德赶在她付账之前把钱递给了收银员。

罗瑞尔的脸红了。

“我真不敢相信会遇上你。”她说道。

“是啊。”他说着，努力保持和她的眼神接触，后面排队的人从他们身边挤了过去。

“那么，你好吗？”她说。

“挺好的，你呢？”

“我也不错，”她说，“你女儿还好吗？”

“她非常好，非常好。”

“她的妈妈好吗？”

杰拉德沉默了片刻。

“她去世了。”他说。

“啊，真的吗？”

“是的。”

“哦，上帝。”罗瑞尔感到震惊。

“露西刚满六个月，伊西就回洛杉矶了，她一直都想做个真正的演员，没什么能拦住她。”杰拉德说道。

“什么？她就这么不管自己的孩子了？”

“四年后她就死了。”

在罗瑞尔面前提起伊西，他觉得很尴尬。

“我真不敢相信，”罗瑞尔说道，“真的不敢相信。”

“你说她去世吗？”杰拉德问。

“不，我是说一个母亲居然会离开她的孩子。”

“她就这么做了。”

“我知道，但是这太疯狂了。”

“是的。”

“她曾经回来过吗？”

“没有。”

“喔，我感到很抱歉，杰拉德。”

“没事，露西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

“但她毕竟是她的妈妈啊。”

“是的，她是。”

“露西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等她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可能到高中吧。现在我不能让自己用事实去伤害她，这样的事一定会毁了孩子的。”

“你真是个好人。”

“我爱她，我是她的父亲，我要给她最好的。”

“你当年对我也很好。”

“是吗？”杰拉德说道，“我没这么觉得。”

“是的，”她说，“任何事你都做得很好。”

四年前，杰拉德去洛杉矶参加了伊西的葬礼。人们发现她漂在一个游泳池里。她写下了杰拉德的名字，她把他当作自己的至亲。那时的洛杉矶有华氏七十五度，干燥极了，他坐在租来的车里，空气闻起来像糖那样甜腻。伊西曾经在肥皂剧里有过演出的机会，扮演一个巫师。在她葬礼后的自助餐会上，人们忙着互相交换名片。杰拉德告诉露西他是去好莱坞出差，露西当时也想跟着来。杰拉德从洛杉矶回来的时候，给露西带了件礼物，他一开始想买很

多礼物，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他不想让洛杉矶在生活中留下特殊的纪念意义。他也送了件礼物给答应好好照顾露西的英迪拉——一只从洛杉矶当代艺术馆买来的手袋，上边画着一只小鸟，还写了一些法文。最近露西开始问起杰拉德关于她妈妈的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看来他得去咨询一下某位儿童心理学专家了。

杰拉德认识罗瑞尔一个月之后，他遇到了伊西。而十年前，杰拉德还没有遇见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杰拉德模模糊糊地记得爱上罗瑞尔却渴望与伊西做爱的感觉，他知道有一些男人对于在一段稳定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情人的感觉非常享受，一开始他也想这么试试。伊西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人，她将香水洒在大腿上，她无拘无束，也从不会脱下她的高跟鞋，即使是在做爱前后。当杰拉德告诉伊西自己爱上了罗瑞尔的时候，伊西并没有任何沮丧的表情，她笑着，然后她又哭着告诉杰拉德，她怀孕了。杰拉德想这可能是个玩笑，她总是说谎。可突然他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因为她一直在哭泣，他明白，伊西说的都是真的。第二天晚上，他把一切都告诉了罗瑞尔，她说她能够理解。一星期后，罗瑞尔发了一封邮件给他，他们分手了。

之后，杰拉德同意搬去和伊西一块儿住。

杰拉德的床头柜里还保留着罗瑞尔的一块手表。八年前被她遗

留在杰拉德的公寓。奇妙的是，电池还在运转。有时候的晚上，杰拉德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直到他睡着，手表从他的指尖滑落到地上。

罗瑞尔现在已经四十三岁了，是商业图书的资深编辑。她养过一只猫，后来死了。杰拉德买了两杯咖啡，问她是否可以一块儿出去走走。当然，她说，看着窗外的暴风雪，她笑了起来。她穿着伊西经常穿的那种高跟鞋。他们刚走出商店，有辆出租车正好停了下来。

“快！”杰拉德说，他们坐进了车里。

他们在出租车里聊了起来，他们谈到了总统、他们的父母，以及罗瑞尔短暂的婚姻。她现在离婚了，她的前夫和另一个男人现在住在布鲁克林高地。她在笑，但杰拉德能看出她心里的失望。

来到她住的公寓门口时，杰拉德突然流起了鼻血。黑夜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雪仍然没有停下来。

“哦，上帝！”罗瑞尔说道，把杰拉德的头往后抬起。路上的行人都看着他们。

“天哪，跟我进屋吧，好吗？”她对杰拉德说。

“好的。”他答道。

在电梯里时，他们说起了各自的工作。他感觉到鼻子里的血正在凝固。罗瑞尔的睫毛上，沾上了细碎的雪花。

进屋后，杰拉德给英迪拉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他会晚点回家。然后他和罗瑞尔做爱了，先是在厨房，然后在她的床上。她的身体跟他记忆中的已经不一样，更柔软，也更柔韧了。她的脚趾看上去美极了。

她的公寓里，点着昂贵的蜡烛，散发出美妙的香味。做爱之后她给杰拉德煮了咖啡。她的家里都是那种现代风格的、灰色的家具。不知何故他感觉自己在她体内——被她抓着，他像是又回到了自己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跳入夏日的泳池，感受到潜入很深的池底的那种感觉。

回到家，露西从她的椅子上跳起来，钻入了他的怀抱。

杰拉德蹲了下来，她整个人都挂在了他身上。

“怎么还不睡觉，小圆石？”杰拉德问她。

英迪拉出现在门口：“下大雪，学校明天放假，您不用担心她明天起不了床。”

“这样啊，英迪拉，这真是太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爸爸？”她亲着他的脸，每一个角落都亲到了，杰拉德突然想起露西妈妈浮在泳池里的样子。

“我爱你，露西。”他说。

“我也爱你，爸爸。但是你去哪里了？”

“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一块儿吃了晚饭。”露西似乎从他的话里

闻到了撒谎的气味。

“是你老朋友，还是一个老女人？”她问。

“哈哈，你怎么知道的？”杰拉德笑起来。

“我是你的女儿，我就是知道。”她说着跑回桌子旁，笑着，挥舞着她的双手，好像双手将要变成翅膀一样。

英迪拉不愿留下来过夜，所以杰拉德给了她足够的打车钱回家，并感谢她待到这么晚。她在杰拉德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他抱了抱她，英迪拉的头发散发出一股洋葱的味道。

杰拉德讲完睡前故事后，露西问爸爸，她是否可以见一见爸爸的朋友。

“好主意。”杰拉德说道。露西吃了一惊，好像她期待的答案并不是这样。有时候孩子真是很难读懂。

“她喜欢冰激淋吗？”露西问。

“喜欢，她每天都吃冰激淋。”

“你会娶她吗？”

杰拉德停顿了一下：“这要以后才知道了。”

“她有小孩吗？是不是跟我一样大？”

“她没有小孩，你希望她有吗？”

“只要不是男孩就行了。”

她让爸爸坐在她的床边，直到她睡着才可以离开。他总是会说

好，然后总是自己先睡着了。很快，他们都睡着了。

雪花一直吹打着窗户。

街灯的光透过窗户照了进来。

差不多凌晨的时候，杰拉德醒了过来，露西微微张开了眼睛。

“爸爸，熊猫在哪儿？”杰拉德找到了她的充气熊猫，放在她的身边，她很快又睡着了。

杰拉德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他开了灯，检查了一下大门，然后赤脚走进了他的书房。

没有像以往那样拿一本书架上的书看，杰拉德看着窗外，他能一直看到列克星敦大道。雪花像波浪般飘过整个城市。街上几乎没有人。只有一些车灯闪烁。

他知道不久之后罗瑞尔就会搬过来和他们一块儿住，他又想到了伊西。他回忆着她的笑容，她被火化的时候，熊熊燃烧的火焰的怒吼。

突然，他感觉到脊背涌起了一阵寒意，就像冰水泼在后背。苏格兰平脚杯从他的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裂成无数的碎片。杰拉德手足无措，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有什么人正在这里，他发誓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在他和这个世界之间，他只能看见空气，只有空气以及往日和明日的光晕。

他想，生活是多么神秘啊，既有磨光的边缘，又总有第二次机

会。早上，他还觉得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对生活的任何想法，可是现在……杰拉德觉得他好像被跟踪了，被一种他听不到的声音，被窗外雪地里的脚印，就像露西所认为的那样——生活是一连串有导向的微妙的爆发。

安静却不停坠落的城市

我生活在罗马，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会坐在喷水池边相拥而吻。水的声音，就像爱情荡漾在情侣间的声音。

每天早上，公寓外的市场就飘散出一股洋葱的味道。它们的花蕾是如此的肥厚，以至于人们都几乎忘了其实它们也是一种花。洋葱的有些花瓣是红色的，就像脸上泛出的那种潮红，这些坚硬的花瓣，在保护着花蕊。

西红柿看上去就显得精美多了，它们还连着藤，像一个个红色的小拳头，成排地摆放着。

卖大蒜的人从南边来，从来不像其他人一样在拂晓时一起喝一杯咖啡。我从窗口看着他。我也来自南边，知道清晨的那种清淡的寂寞。

上个周末是我堂姐儿子的生日，我送了件礼物给他。最近我无数次想到我的堂姐，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她会对我们撒谎。她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生活在那个叫作摩拉诺·卡拉莫的地

方，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在那个村子里，无数的小石头房子环绕着山峦而建，看上去就像个有着很多口袋的大斗篷。山顶有一座诺曼人的城堡废墟，那些年幼的小孩经常藏进里边，躲开他们的父母。那里总是刮着狂风，孩子躲在里边一边学着抽烟喝啤酒，一边看着在山谷中蜿蜒移动的车灯，谈论要去那不勒斯、罗马或威尼斯的打算。但是他们其中的很多人终究还是会一直待在这个小村子里，生下可爱的孩子，最后，那些小孩子也会飞快地长大，跟在他们的身后祈求着，要一辆脚踏车。

摩拉诺·卡拉莫在罗马的南边，离罗马还有五百公里的路程。那里的春天，经常能看到五六只成群的蝴蝶在天上翩翩起舞，在我小的时候，爸爸告诉我，那些蝴蝶就是落下来的花朵。童年，对我来说是一段艰难的历程，那时我会为每一件事情担心。我担心世界末日、糖尿病、地震、窒息，还有家族中每个陷入昏迷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昏迷过去，好像他们离开都是打算去看望前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八岁的时候，每天早晨我都很准时地早早醒来，然后把手放在熟睡中的哥哥的鼻子下面，看看他是否仍在有规律地呼吸着。

现在我的生活不时有艰难，但至少，我知道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某种病情，而且我不再总是担心最严重的事情。我可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但我不再为我的忧虑而忧虑。我只是忧虑，同时知道这就是

我。如果你们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这应该是件很普遍平常的事，也许你们会知道有人就是处于像我这样的状况的。我给你们讲一个最近的例子吧。

两周前，我在玩具店里给堂姐的孩子买礼物。那里有一盒小羊羔玩具，我选了其中的一只，但是它身上的羊毛看上去很脏，所以我把它放回去换了另外一只，但是重新换的这一只也有这样的状况，我就又再把第二只小羊羔退回去，换回了第一只（我对它心怀歉意），可这时，第二只小羊羔的表情似乎在说，上帝保佑，难道你看不出我也需要爱吗？

商店的售货员看着我：“能决定要哪只了吗，嗯？”他愚蠢地问我。我开始汗流浹背。环顾四周，这些小小的脑袋在各自的货架之上，注目凝视着我，全都在恳求我把它们带回家，把它们从这个缺乏爱的现实世界中拯救出来。我几乎又陷入恐慌症，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就请想象，如果你在黑暗中坠落，就是那种感觉（像爱丽丝那样）。

二十分钟后，售货员说了点其他什么事，我再也不能在他的注视下那样呆呆地站着，于是决定把两只都买走。这是注定的，当我拿到它们的一瞬间，只感觉到一阵狂喜和释放。

但是，还有两只小羊羔留在了盒子里，它们的脸上也都带着同样的表情。其中一只小羊羔少了一只眼睛，于是我把它也拿进了手

里。现在我有三只小羊羔了，只剩下那一只，孤零零地留在了盒子里，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孤独，以至于它都不愿意再看着我。于是我把全部四只小羊羔都放进盒子里一起买走了。用商店光亮的包装纸包好，纸上还有商店的地址。在帮我写寄送地址时，售货员问我摩拉诺·卡拉莫有没有能买到玩具的地方。“当然也有。”我说。你能辨别出来，他是那种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商店的人。

一星期之后，堂姐夫打来了电话，当时他们正在举行生日聚会。这里全都是孩子，他说，他们头上都戴着用各种彩色的纸做的王冠。从背景声音中我能听到宴会的声响，混杂着孩子们温柔短促的声音。想到他们将会一起长大、互相喜爱、互相欺骗、互相哭泣，然后等到了年老的时候在公园里互相搀扶着相聚，那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堂姐夫把电话交到儿子的手里。“我已经三岁了，”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会的。”我说，他在电话里给我一个吻。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以为我就在电话听筒里，个子小小的在摸索着。

电话听筒有时就有如我的肉体。

他的爸爸又接过了电话，他问我为什么会有四只小羊羔。“它们看上去应该一样吧？”他问。“不，它们不一样。”我说。然后我告诉他它们是一套的，这倒不假。“那为什么不做成像步兵那样的一套三个？”他问。“为什么不能是四个呢？”我说，“就像忍者神龟

那样。”“这倒挺有意思的。”他说，刚好那天早晨他陪着大儿子一起看了《忍者神龟》。你看，永远不要对那些没有患上强迫症的人承认你有这个问题，不然他们只会觉得你疯了。

但是，我要说这些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妻子，伊莎贝拉。他以为她是我堂姐，但其实，她不是。我们整个家族还有她的丈夫、孩子，一直都生活在一个最美丽的谎言中。

她的真名不叫伊莎贝拉·法拉利，而是叫乔卡斯特·拉菲兹。她来自纽约的皇后区，她的姓是一条街道的名字。她就是在那条街上被纽约的警察发现的。五年前的冬天，她来到了我们的村子。她说她叫伊莎贝拉，她拿着她的远房亲戚的照片，上边是我奶奶的叔叔卢奇和婶婶路西娜。卢奇是一个金匠，路西娜是个裁缝，她天生就有视力缺陷。一九一七年，路西娜在村口等着卢奇从战场上归来，卢奇的弟弟已经因枪伤死在了他的怀里。卢奇回来后，和路西娜一起走去母亲的家，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母亲正在门外晒衣服，衣服上的水滴落在地上，然后她看到卢奇了，这是她生命中最悲伤也最高兴的一天。

卢奇和路西娜很快就在村子最高的橄榄树林里结婚了……一九二〇年他们离开摩拉诺·卡拉莫去了阿根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任何讯息了。

自从伊莎贝拉离开了北美，她的意大利语在过去那几年里有

了很大的长进。从她的面相上判断，我很确信她的祖先应该是印第安人，但这根本就无关紧要。她来到村子后，跟我们讲了她的奶奶——卢奇和路西娜的女儿——的很多故事，她的奶奶在二战后嫁给了一个加拿大军人，然后搬到了多伦多。

后来，伊莎贝拉和村子里的一个男人结了婚，现在还有了两个孩子。她来这里之后很快就遇到了这个男人，他长得很帅，戴着一副范思哲的眼镜，他在自己的报摊上经营村里的浓缩咖啡机。他穿着时尚，很多游客都以为他来自罗马或米兰。尽管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小村子，但是他却有一种老成的气息，所以村里的人对于他娶了一个陌生人的事，一点都不吃惊。

我猜想，其实当五年前伊莎贝拉第一次来到这村子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知道她在撒谎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奶奶不说出真相来。奶奶是一个安静的女人，爷爷比她要大很多，但是爷爷活着的时候，他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爱着我的奶奶。

奶奶也许只是知道伊莎贝拉不是真正的家族成员这件事而已，可我知道伊莎贝拉真正的名字和她荒凉冷酷的过去。不过，我绝对不会说出来，因为这个家族里的每个人，包括我，都深深地爱着他每一个人。

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每年都会出门度一次假，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就去西西里岛或巴里之类。在圣诞

节，她和她丈夫，会和其他的父亲母亲一起，看着孩子穿着用衣服和旧地毯拼缝的戏服做各种各样的表演。我记得有一年，我也曾站在那舞台上，打扮成了一只小熊的样子，我紧张极了，觉得我就要死了，而且我确信我的戏服里有着无数的跳蚤。表演完之后，爸爸把我搂进了他的臂弯里，霎那间，我感觉好极了。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感觉阳光灿烂，甚至去找了本关于真正的熊的书来看。

如今我明白对于世界而言这是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我生活里的每个美妙的瞬间对于这世界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伊莎贝拉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会讲给她听。我知道身为一个被遗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离开这个村子，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一个同性恋在摩拉诺·卡拉莫这样的小地方生活，太过艰难，尽管这里是如此的美丽，街头弥漫着木头烟雾的香味，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地方并且你决不会被任何人拒绝。可你必须理解，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被承认的问题。时代变化了，在摩拉诺，如果你被爱着，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重要。奶奶知道我爱上了一个来自罗马的男人（这段感情如今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我为了他来到罗马，然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已经四年了。

也许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会搬回这个美丽的小村子，也许我会找一个伴儿共同消磨剩下的时光，一起慢慢地散步。这是一个多么

美丽的地方啊，德国艺术家 M.C. 埃舍尔^① 喜爱摩拉诺。一九三〇年，他秘密地在日本纸上创作了一张摩拉诺的版画，现在它被收藏在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里。

村子的主教堂里，有一幅巴托罗密欧·维瓦里尼^② 画的十五世纪的屏风画。画着村子的风景，古老城堡的尖顶是村子最高的地方；一些古老的房子坐落在山体的岩石上，那是女修道院；在公共花园里有一个大喷泉，孩子们聚在它周围，互相解释着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伊莎贝拉是否在怀疑我已经知道她的真相。我没有勇气说什么，即使我可以同时对她说我仍然爱你。但从此以后我不再认为真实有多么重要，因为真实和谎言一样让人心碎。

五年前伊莎贝拉刚来这里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家里人都死了，在处理奶奶东西的时候她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的地址指引着她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子。

我们与她相遇之前，她其实已经在村子里待了两天了，她是圣诞节前几天来的。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而无比激动，雪整晚地下着。早上，还能闻到从山上一路弥漫下来的树木清香，到中午时，它就被烘焙的热闹气息给取代了，整条街道都被烘

① M.C. 埃舍尔 (M.C.Escher, 1898—1972)，荷兰版画家，因其绘画中的数学性闻名。

② 巴托罗密欧·维瓦里尼 (Bartolomeo Vivarini, 1432—1499)，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圣母与圣婴》《怜悯圣母》等。

焙的糕点香味给遮盖了，香味就像长长的手指拉扯每个人的舌头。人们都已经戴上了他们的装饰品，你能感觉到村子里每个小孩激动的心情，到了晚上，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围成一团在村子里四处游走。

那时，伊莎贝拉坐上一趟夜间火车来了意大利的小城思班扎诺·艾尔巴尼斯。喝过一杯咖啡，吃完一块羊角面包之后，她又搭上了一趟顺风车来到了卡斯特罗维拉里，车主让弟弟送伊莎贝拉来到了摩拉诺·卡拉莫，他刚上完夜班，还得送女儿去上学。“她从美国来，要去那儿找她的家人。”他这么跟他的弟弟说，而这惹恼了他们的奶奶，她在楼上的电话里偷听到了他们的这段对话，晚饭的时候，她愤怒地沉默着，像是嘴里被塞进了一团棉花。

伊莎贝拉来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快被冻僵了，于是走进村子里最大的教堂，上智之座圣母马利亚教堂。她在一条很硬的长椅上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她的旁边。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潭深水，他问伊莎贝拉，为什么她来到了这个地方。

她给他看了卢奇和路西娜的照片，他紧紧地抱住了她，他说他的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已经死了。他说这就好像上帝从他身上咬下一口。

那时伊莎贝拉对意大利语懂得不多，她基本不知道这个男人说

了些什么，但是她也紧紧地回拥了这个男人，他的温柔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伊莎贝拉和这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块儿来到了当地警长的家，他掌管着有关村子的全部记录。他住在一个石头砌成的农舍里，一只粉红色的塑料杯正放在房子的第一层台阶上。

眼神如水的男人敲了敲门，满头白发的警长从楼上的窗户探出了头。“什么事？我正准备看看新闻，可我老婆的头痛病犯了。”他说。眼神如水的男人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等一等。”警长说，然后关上了窗子。

几分钟后，天空开始下雪。然后，这位警长，穿着厚厚的制服（胸前挂满代表着他诸多勇敢功绩的勋章），打开了他家的大门，带着他们走进了存放记录材料的房间。眼神如水的男人指着勋章，讲起警长在六十年代从结冰的池塘中救起两个小孩的事迹。伊莎贝拉问警长那对兄弟的下落。“都在哥斯达黎加，”警长回答说，“我刚刚收到了他们从那儿寄来的圣诞贺卡。”

在凌晨三点左右，警长指着积满灰尘的册子里的一个名字，“我找到你们的家族了，”他说，“天亮之后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然后三个人开始围着暖气喝着葡萄酒，直到天空露出一抹白色。

伊莎贝拉得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亲吻和拥抱，存放公共档案的房子充斥着狂喜。认亲家族的孩子们想知道圣诞节的时候他们

能够送给伊莎贝拉什么喜欢的礼物，而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一直等到最后，才离开了房间回到他自己的家里。

圣诞节之后一天，警长和这个男人却敲响了这个刚刚认亲的家族的大门，警长把他的帽子取下放在了手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不是伊莎贝拉真正的亲人。

在一片愤怒和混乱中，伊莎贝拉从楼上的卧室里给叫了出来。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伤心得哭个不停，这成为了生命中他的第一个记忆。

伊莎贝拉步履蹒跚地回到存放着公共档案的房子，被错认的人家也跟着她一块儿来了。当我的家人从村子的另一头来到这里时，那些一开始被错认为伊莎贝拉亲人的人，用一种充满嫉妒的眼神看着我们。被弄错的那户人家要求让他们自己再亲自查看一遍记录资料，那家人中的一位单身男子向我的父亲指出，既然警长已经出过一次错误，所以他有可能再出第二个错，我的父亲同意了有这种可能。

在水落石出准备和我的家人回家之前，伊莎贝拉向那家被错认的人保证，她会回去看望他们的，然后她善良地说，你永远不知道谁是谁，所以她也会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的。我母亲说，上帝之所以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理由。

认亲这事发生的时候，我去了那不勒斯看望我的一个叔叔，结

果当我回到家后，却发现一个美国女孩睡在了我的床上。尽管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但我还是尝试着告诉她我不会介意的。然后母亲给我讲述了这个混乱的故事，她说，警长现在真是太老了，不应该再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了，可父亲接着说，这个职位是警长的一切，如果他失去了这个职位，那么他的精神就会彻底垮掉的。

伊莎贝拉给我看了那张照片，照片后面写着我奶奶的叔叔的名字、叔叔的妻子的名字，还有这个村子的名字，以及他们离开村子的时间。照片是在一片果树林里拍下的，没有人知道现在照片里的地方是哪儿了。照片中的路西娜带着一脸的微笑。“也许她正怀孕。”我说。奶奶从厨房里看着我，她正拿着一块毛巾擦碗，她的眼睛里写满了悲伤，然后她转头看向了伊莎贝拉。

今天晚上是我和马可的第二次约会，马可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作品的修复者，实际上他是一个雕塑家。我是在康多提大道上遇见他的，我们一起喝了杯咖啡。他有一双非常漂亮的手。

当我脱下衣服的那一瞬间，我的公寓安静极了。我能听到我的未来已经就位，就像在幕布升起之前让演员各就各位一样。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我一直醒着，想象着自己和马可一块儿出去的情景，我的枕头一定已经吸收了成千上万句的对话。我想象着马可被一块通心粉给呛住，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在帮他恢复呼吸——但此时我从半梦半醒间清醒了过来，我充满焦虑，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即使此刻已是凌晨三点，我也必须上网查明白这一切，然后我在镜子面前，对着一只抱枕，练习着如何操作。

今天早上醒过来时，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我喝着绿茶，看着那些在市场里出售当天蔬菜和水果的男人，想起了伊莎贝拉，然后我想起我买给她的孩子的那四只小羊羔。其中的一只还掉了一个眼睛。

伊莎贝拉和我们住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去发掘关于她的更多的秘密，因为当我在我的房间里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从她手提箱里掉出来的一本护照，我翻看了一下，这本护照属于乔卡斯特·拉菲兹。

护照里还夹了张一个社工的名片，我装成一个意大利语专家写信给这社工询问关于乔卡斯特·拉菲兹的事，并把伊莎贝拉的护照作为佐证也一块儿寄了过去。这不是一件很道德的事，我很担心。但伊莎贝拉甚至从来没有发现护照丢了这件事，自从她到了摩拉诺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那个社工在皇后区的一个孤儿院工作，她给我寄来了一份伊莎贝拉的文件，还被翻译成了蹩脚的意大利文，那社工在文件的首页写着：“请好好地照顾她。”

这份文件证明，一九八一年五月，警察在靠近拉菲兹大街的污

水池旁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孩，她在少年时期曾经离开孤儿院流浪了好几次，为了给男朋友买毒品她还曾做过两个月的妓女。然后她的男朋友死了。她挨过很多打。文件上还写着其他很多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

看完伊莎贝拉的这份档案文件，我开始喜欢她了。她到底是谁，我想着这事儿，可她现在可是法拉利家族的一员了，以圣母玛丽亚的名义，我想我们已经把她当作我们的一员了（虽然我自己并不信仰宗教）。

我骑着哥哥的自行车来到山上，把她的档案连同护照放在废弃在路边的洗衣机里烧掉了。那儿到处都是盛开着的野花。

奶奶看见我收到了一只来自美国的包裹，可对此她什么都没有说过。她和我都保守着这个秘密。

此刻，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我正走过整个罗马城去见马可。我经过了大角斗场，马可也许已经在喷泉旁边的诺瓦娜披萨店里等我了。那儿到处都是游人，他们在拍照，我想知道那些照片最后都会有怎样的未来。照片比人长久，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照片里的罗马斗兽场曾经是大屠杀现场，人们看着与自己相同的人类被来自全世界的野兽——狮子、大象、鳄鱼、河马——撕成碎块。罗马人，罗马人，我情不自禁地想，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孩子。

我曾经听见一个导游向一群仔细聆听的游人如此解说：在罗马

帝国覆灭之后，这个斗兽场就被废弃了，然后这里逐渐长满了奇花异草，这些种子被来自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动物的粪便灌溉着，茂盛地生长。

我穿过罗马广场，如果你曾经来过这个伟大的城市，你将会开心地发现一切都是免费的。带上你的孩子，意大利人喜欢孩子，孩子们将会得到比你更好的待遇，每个商店都会有送给孩子们的食物。

一群穿得像角斗士的人在广场上巡游，付他们一点钱，他们就会跟你一起合影。他们非常敬业，就像他们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罗马士兵一样。也许在回家吃过晚饭后，他们会跟妻子说，他们实在是生不逢时。

我想知道，世界上的事是不是总是发生得要么太早要么太迟，如果每件事都精确地发生在恰当的时间，那该是多么的忧伤却又迷人啊。

快走到诺瓦娜披萨店了，我和马可约在那里见面。街道已经被游人们塞满了。我感觉很累，昨天晚上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天空的颜色开始变成像蜜桃那样的粉红，已经是晚上了，但这天空看上去又那么的像早晨。每一刻既是开始又是结束。

伊莎贝拉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知道到他们妈妈的那些悲伤往事，不然这会摧毁他们的，因为伊莎贝拉是他们的母亲，在这个

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母亲。我想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伊莎贝拉会选择来找我们？虽然看上去可以很明显地证明她是一个幸运儿，但我不能确定那时候的她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现在，她的孩子们的笑声总是会从朝着街心的窗子里传出来，她的丈夫也深爱着她。我想知道在他遇到她的时候，他是否轻轻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我挑了条捷径，穿过秘密小巷。小巷里有静静躺着的狗、装满垃圾的包裹、空空的油罐和敞着衣服抽烟的服务生。晚安，他们对我说，因为我对着他们微笑。我想如果没有遭受折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是得体的。

对我来说，今晚离开房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停地检查瓦斯的开关，它们全都关好了，也没有嘶嘶的声音，但我就是情不自禁地要再看看它们。我检查了所有的插座，站在厕所门口一听再听，以确保没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溢出来。最后离开家之前，我转了门把手有数十次，才能确定门已经锁好了。整个门把手都已经变松了，如果我一天要离开公寓三次，那么每星期门的把手都将会被拧二百十一次。也许以后马可以帮我把手弄紧些，我似乎可以看见他轻轻放在门上的两只手，就像两匹马。

我的邻居早已习惯了我不断拧锁的声音。如果说我的家被破门而入，她也绝不会起疑的。我偶尔会给她买瓶葡萄酒。但愿她以后

能够找到一个伴儿。

我想知道伊莎贝拉是不是在纽约的旧货店里发现我们家人的照片的，也或许照片是真正的伊莎贝拉在临死前给她的。

而真正的秘密是，那张照片是如何从阿根廷被带到了纽约。

伊莎贝拉的丈夫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她，同样也是在一瞬间，伊莎贝拉的生母却把她抛弃在了大街上，尔后永远地离去。也许，现在伊莎贝拉的母亲正在期盼着什么，带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就像一座灯塔，她的孩子在这世上下落不明，像一道透过她自身绝望的迷雾发散的光，绝望超过了痛苦。

伊莎贝拉的母亲觉得她自己真正仅存的力量是放弃一切，就像审问耶稣的本丢彼拉多在沸腾的人群之前洗手。但是她的孩子此后却在不停地寻找，最终，在意大利一个寂静的大山里，她找到了等待着她的未来。

我想我们应该让这些拒绝和接受的时候紧密相依。我想我将会一直随身带着它们，就像我们人生曾经计划的那一部分终于破壳而出。

我远远地看见了马可，他手里拿着两个橘子。我在没有遇见他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我停下了脚步，我希望这一刻永不结束，我希望这一刻能一直延续直到世界的末日。

他看见了我，我们同时朝着对方走去。

那个眼神如水的男人现在有时还去看望伊莎贝拉，她总是请他进屋里坐坐，伊莎贝拉的孩子坐在他的膝上，请他吃自己的小饼干。他们想听关于教堂的故事，他们想听关于母亲的故事。他们想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



短经典精选系列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

〔爱尔兰〕克莱尔·吉根 著 马爱农 译

爱，始于冬季

〔英〕西蒙·范·布伊 著 刘文韵 译

爱情半夜餐

〔法〕米歇尔·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隐秘的幸福

〔巴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著 闵雪飞 译

雨后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管舒宁 译

闯入者

〔日〕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

星期天

〔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荭 译

二十一个故事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李晨 张颖 译

我们飞

〔瑞士〕彼得·施塔姆 著 苏晓琴 译

时光匆匆老去

〔意〕安东尼奥·塔布齐 著 沈萼梅 译

不中用的狗

〔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刁承俊 译

俄罗斯套娃

〔阿根廷〕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魏然 译

避暑

〔智利〕何塞·多诺索 著 赵德明 译

四先生

〔葡〕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 著 金文彭 译

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

〔阿尔及利亚〕阿西娅·吉巴尔 著 黄旭颖 译

拳头

〔意〕彼得罗·格罗西 著 陈英 译

烧船

〔日〕宫本辉 著 信誉 译

吃鸟的女孩

〔阿根廷〕萨曼塔·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

幻之光

〔日〕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

家庭纽带

〔巴西〕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著 闵雪飞 译

绕颈之物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著 文敏 译

迷宫

〔俄罗斯〕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著 路雪莹 译

奇山飘香

〔美〕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胡向华 译

大象

〔波兰〕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 著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诗人继续沉默

〔以色列〕亚伯拉罕·耶霍舒亚 著 张洪凌 汪晓涛 译

狂野之夜：关于爱伦·坡、狄金森、马克·吐温、詹姆斯和海明威最后时日的故事（修订本）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樊维娜 译

父亲的眼泪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陈新宇 译

回忆，扑克牌

〔日〕向田邦子 著 姚东敏 译

摸彩

〔美〕雪莉·杰克逊 著 孙仲旭 译

山区光棍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马爱农 译

格来利斯的遗产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终场故事集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

令人反感的幸福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施杰 译

炽焰燃烧

〔美〕罗恩·拉什 著 姚人杰 译

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

〔美〕罗恩·拉什 著 周嘉宁 译

魔桶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著 吕俊 译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智利〕本哈明·拉巴图特 著 施杰 译

海米的公牛

〔美〕拉尔夫·艾里森 著 张军 译

对不起，我在找陌生人

〔英〕缪丽尔·斯帕克 著 李静 译

爱因斯坦的怪兽

〔英〕马丁·艾米斯 著 肖一之 译

基顿小姐和其他野兽

〔安道尔〕特蕾莎·科隆 著 陈超慧 译

在陌生的花园里

〔瑞士〕彼得·施塔姆 著 陈巍 译

初恋总是诀恋

〔摩洛哥〕塔哈尔·本·杰伦 著 马宁 译

美好事物的忧伤

〔英〕西蒙·范·布伊 著 郭浩辰 译

一切破碎，一切成灰

〔美〕威尔斯·陶尔 著 陶立夏 译

纵情生活

〔法〕西尔万·泰松 著 范晓菁 译

命若飘蓬

〔法〕西尔万·泰松 著 周佩琼 译

爱，趁我尚未遗忘

〔海地〕莱昂内尔·特鲁约 著 安宁 译

水最深的地方

〔爱尔兰〕克莱尔·吉根 著 路旦俊 译

石泉城

〔美〕理查德·福特 著 汤伟 译

哥哥回来了

〔韩〕金英夏 著 薛舟 译

他们自在别处

〔日〕小川洋子 著 伏怡琳 译

恋爱者的秘密生活

〔英〕西蒙·范·布伊 著 李露 卫伟 译

在奥德河的这一边

〔德〕尤迪特·海尔曼 著 任国强 戴英杰 译

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

〔美〕内森·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

死水恶波

〔美〕蒂姆·高特罗 著 程应铸 译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美〕大卫·范恩 著 索马里 译